

六二五戰爭 *and* 亞細亞

6·25전쟁과 아시아

새로운 자료와 연구

공동주최



국방부 군사편찬연구소



전쟁기념사업회



국방대학교



육군사관학교

시 간	내 용	진행자
13:00~13:30	사전등록	
13:30~14:00	국민의례	사회: 황수현(군사편찬연구소)
	환영사	오성대(국방부 군사편찬연구소장)
	축사	백승주(전쟁기념사업회장) 박영준(국방대 안보문제연구소장)
14:00~14:20	기념촬영	
세 선	발 표	토 론
사회	허남성(국방대학교 명예교수)	
발표 1 14:30~15:10	중국사 관점에서 본 한국전쟁 -지역 전쟁 동원을 중심으로 천창강(陳傳剛, 중국군사과학원)	한상준(아주대학교)
발표 2 15:10~15:50	아이젠하워 행정부의 정전구상과 동북아 질서 내 한국군의 역할 손경호(국방대학교)	나종남(육군사관학교)

Coffee Break (15:50~16:20)

사회	이완범(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교수)	
발표 3 16:20~17:00	한국전쟁과 일본 외무성의 인식 나가사와 유코(長澤裕子, 와세다대학교)	김유석(전쟁기념사업회)
발표 4 17:00~17:40	ATIS와 중공군 포로신문 이상호(군사편찬연구소)	추 양(楮樣, 중국군사과학원)
17:50	폐 회	

목 차

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朝鲜战争——以地区战争动员为例	9
중국사 관점에서 본 6·25 전쟁: 지역에 대한 전쟁 동원을 중심으로	23
발표 천창강(중국군사과학원) 토론 한상준(아주대학교)	
아이젠하워 행정부의 정전구상과 동북아 질서 내 한국군의 역할	41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Armistice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Armed Forces in Northeast Asian Order	53
발표 손경호(국방대학교) 토론 나종남(육군사관학교)	
朝鮮戦争と日本外務省の認識—休戦の影響を中心に	67
한국전쟁과 일본 외무성의 인식 — 휴전의 영향 중심으로	77
The Korea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ercep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Armistice	89
발표 나가사와 유코(와세다대학교) 토론 김유석(전쟁기념사업회)	
ATIS와 중공군 포로신문	103
ATIS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Korean War	115
발표 이상호(군사편찬연구소) 토론 추 양(중국군사과학원)	

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朝鲜战争——以地区战争动员为例

중국사 관점에서 본 6·25 전쟁
: 지역에 대한 전쟁 동원을 중심으로

발표 | 천창강(중국군사과학원)

토론 | 한상준(아주대학교)

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朝鲜战争

——以地区战争动员为例

近年来，随着对相关文献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充分利用，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朝鲜战争研究日渐呈现出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简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一些传统问题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二是研究范围从早期的军事史研究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人物、国际关系、新闻宣传等诸多领域，专题研究不断深入，学术观点趋向多元化；三是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不断创新，跨学科研究态势明显；四是国内外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出版以及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五是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显著增多，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就具体的研究内容而言，近几年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仍在持续关注既往的一些热点问题，如中国政府作出战争决策的影响因素、过程、意义与价值，停战谈判，战后事宜的处置，战争的影响与评价，等等。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就呼吁和平会商解决问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在其声明中，公然将其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背景下发起的。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为止，中国党和政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先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290余万人赴朝参战。其间，中国党和政府统揽全局，在进行正确战争指导的同时，实施了有力的战争动员，举国开展了抗美援朝战争运

动。当前，研究者们对抗美援朝战争运动、尤其是地区战争动员这一具体问题的关注度正呈不断攀升之势，特别是从史料角度来看，除了国外档案的公开披露，国内研究者们更加注意挖掘、研究国内各地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在全国及地方有关部门的积极组织下，地方档案、报刊、史志、方志等历史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便于研究者使用。因此，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地区战争动员问题越来越受到地方研究者的关注，抗美援朝运动的区域性研究变得十分活跃，以地方为个案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并呈现出地区级别不断下沉、地域范围不断收缩、聚焦的群体越发多样的趋势。

一、战争动员研究的地域持续扩展

总体来看，地区战争动员的研究范围，包括地区、省一级，如辽宁地区、中南区、内蒙古、山东、山西、湖南、湖北、云南、江苏、浙江、广东；大中城市一级，如北京市、上海市、安阳市、开封市、宜昌市；区县一级、乃至乡村，武隆县、海龙县、永修县、东北农村、苏南农村；以及某些特殊区域，如四川藏区、天津港。在此，以辽宁地区、上海和宜昌3地为例。

（一）毗邻战区的辽宁地区

辽宁地区，包括原辽东省^①、辽西省^②以及沈阳市、旅大市^③、抚

^① 辽东省成立于1949年4月，省会为安市（今丹东），辖区包括今辽宁省东部及吉林省通化、白山等地。1954年6月19日，辽东省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与当时的辽西省合并，成立新的辽宁省。

^② 辽西省成立于1949年4月，省会为锦州市，辖区包括今辽宁省西部，包括锦州、阜新、四平（今属吉林省）、山海关（今属河北省）等地。1954年6月19日，辽西省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与当时的辽东省合并，成立新的辽宁省。

^③ 旅大市成立于1950年12月，辖区包括今大连市主城区、旅顺口区、金州区、瓦房店市、长海县等地。

顺市、本溪市，其与朝鲜一江之隔，是抗美援朝战争直接的、短距离的供应基地，在战勤动员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战争期间，辽宁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担架队、专业技术人员和民工，共计战勤动员 2462297 人（次），占当时辽宁地区总人口的 11.7%，占当时辽宁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 52.9%，合计战勤动员担架 11210 副，车辆 189082 台。^①其中，担架队的组织动员主要在农村、县城进行，分为普通担架队和基干担架队，普通担架队负责国内执行短途运输任务，基干担架队负责出国执行战勤任务。基干担架队成员家属参照军属享受相应优抚待遇。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实际战勤需要，在基干担架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半军事化的志愿担架团，长期随军作战。专业技术人员动员主要在城市中进行，包括组织动员汽车驾驶员、技术工人、医务人员、厨师、翻译人员、船员、石工、木工等。组织动员的方式主要采取说服教育与合理报酬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组织动员的原则是先私后公，即优先动员私人、个体户与未就业人员，其次动员私企人员，最后动员机关事业单位与国企员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勤动员对省内国民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对相关技术人员的需求量激增，现有人员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为缓解此矛盾，开始进行紧缺技术人员的技能培训工作。以汽车驾驶员为例，随着战争的深入与装备的大量补充，驾驶员出现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辽东、辽西各市纷纷开办汽车驾驶员学校，从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招录学员进行驾驶技能培训，以满足战事运输工作的需要。民工的组织动员，分为赴朝

1954 年 6 月 19 日，旅大市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划归辽宁省管辖。

^① 数据来源：辽宁省档案馆档案资料《辽宁省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人力动员工作历史资料》《抗美援朝时期战勤统计表》。

战勤民工和后方战勤民工两种类型。赴朝战勤民工的组织动员方式、建制与普通担架队相同。后方战勤民工动员的原则是“保证战事需要，照顾农民生产”。其主要工作包括修建机场、铁路、公路、军用仓库、战备工程等与朝鲜战事相关的国内国防基础设施。对战勤民工实行“雇佣制”，除提供必要酬劳外，对其家庭的农业生产也给予“换工互助”，保证“不误农时”。

（二）经济水平较高的上海市

上海市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比较发达，海陆交通较为便利，是前线吃穿用品和急需物资的重要来源。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动员之下，上海各界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积极捐献物资，助力保障朝鲜战场中朝士兵的吃穿用品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时正值冬季，加之朝鲜气候寒冷，如何解决志愿军寒衣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一困境，在上海市的工商界，上海市铸字制版工业同业公会、上海市簿册装订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机器模型工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板箱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汽车运货商业同业公会等均发起了劝募寒衣运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捐助抗美援朝志愿部队 1000 件羊毛衫。^①上海市部分县区，如龙华区也捐献了大量的寒衣。除了劝募寒衣之外，像上海县^②、新泾区^③、龙华区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还为朝鲜前线捐献了多种急需的物资。如大中华橡胶厂、正泰橡胶厂、义生橡胶厂、大成橡胶厂，从 1950 年 10 月开始，在两年内完成军用胶鞋 1144 万

^①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关于捐助抗美援朝志愿部队羊毛衫 1000 件请照样赶制的函：1950-12-08。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8-2-53-24。

^② 1992 年，上海县与原闵行区合并，成立新的闵行区。

^③ 新泾区于 1949 年设立，1956 年撤销，并入西郊区。

双、夹胶雨布 4.015 万尺及其他大批量军需橡胶制品；上海轻工行业提供了大批量的罐头、饼干、行军灶、风镜、饭具、皮鞋、皮衣等；上海制车厂提供 500 辆手推车，上海电池厂提供雷达牌铁壳手电筒；华东工业部经理处汽车配件委员会试制生产了朝鲜前线急需的汽车配件和零部件；信谊药厂为朝鲜前线提供了大批的瓶装消毒盐水等。^①这些捐赠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宜昌市

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分界处和西陵峡口，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转运码头，因此接待与中转过境部队成为宜昌市的一项重要、艰巨的任务。1950 年 12 月，宜昌市组建支前委员会，成立支前供应站，设供应、招待、交通、宣慰四股和秘书室，工作人员 26 名，由市民政科科长兼任站长。各街道居民小组相应增设支前小组长。同时筹备可容 1.9 万人的住房和 3.8 万余公斤铺草，搭建能拴 600 匹军马的厩棚，组建有 40 张病床的临时医院；又在宜昌至沙洋的途中设置供应站和马厩，为部队陆路去孝感转乘火车提供保障。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9 月期间，宜昌支前供应站接待与中转由西南经宜昌东下、北上的志愿军指战员 327891 人，前后分为四个大的批次，即 1950 年 12 月 19 日至 1951 年 2 月 26 日，为 109216 人；3 月 2 日至 5 月 16 日，为 88202 人；5 月 17 日至 6 月 23 日，为 71329 人；7 月 14 日至 9 月 19 日，为 59144 人。同时转运军马 4385 匹和大量军械、弹药、器材、

^① 数据来源：《上海橡胶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橡胶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 页；上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3、289 页；虹口区志编纂委员会编：《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80 页；《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32 页；《上海汽车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汽车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 页。

车辆、油料、药品以及其他军需物资。^①宜昌人民热情接待过境的志愿军指战员，每次均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欢迎、欢送、联欢和慰问，组成众多浆洗队、缝补组、借物组为志愿军服务。

二、动员视阈下各类群体作用的解析不断深化

通过发掘特定的社会群体、组织、机构与团体在抗美援朝战争动员中的表现，包括少数民族、民主党派、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学、文艺界、红十字会、海内外爱国华侨、台胞、工商业者、新华书店等，作为地区战争动员的补充，不断完善战争动员的全貌。在此，以广州工商界、海内外爱国华侨、少数民族为例。

（一）广州工商界的爱国动员与社会担当

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州全市工业有 1048 家”，“广州市商业团体总数有 131 个单位，从业会员有 12638 家”，工商户共有 13000 余家，工商界在广州的影响可见一斑。^②华南分局密切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情况，遵照中央在不同阶段的指示和要求，从广州的实际和中心任务出发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开展了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①利用工商联机构进行统战工作。广州工商联机构肩负着两大任务：在经济领域，协助政府对在市场管理、处理公私关系、调整工商业等方面对工商界展开经济工作；在政治领域，积极组织工商界参加抗美援朝运动。^②结合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工商界的思想改造。随着抗美援朝宣传的不断深入，广州工商界各行业普遍召开控诉大会，使

^① 数据来源：宜昌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广东卷广州分册编辑组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东卷广州分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25 页。

工商界人士能够“团结本市一切爱国工商业界和人民群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坚固的反侵略统一战线”^①。③动员工商界积极开展完税工作。“工商业繁荣了，又（能）增加了国家的税收”^②，抗美援朝也就有所保障。由此，在华南分局领导下，在广州各民主党派的督促下，广州工商界展开了以缴税、完税为中心任务的工作。④发动工商界参加抗美援朝爱国捐献运动。工商界是捐献运动的主力，仅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6月，工商联、各商号就相继展开“捐献手榴弹运动”^③、劳军捐献运动^④、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献金运动。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以捐献为任务的统战工作进展迅速，数“工商界捐献的数额最大”^⑤。

（二）海内外华侨的多元深度参与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海外华侨、国内归侨侨眷开展了各种支援活动。他们积极参军参战，举行各种集会，通电致函，捐献财物，强烈谴责美国侵略，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决策，积极声援志愿军入朝作战，成为抗美援朝运动重要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①华侨党派谴责美国侵略。中国致公党是代表华侨的政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该党积极活跃，多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侵入中

^① 《广州工商联筹委会响应毛主席号召》，南方日报，1950-12-06(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476页。

^③ 《广州工商界三万余人昨举行抗美援朝祝捷示威大游行》，南方日报，1950-12-13(1)。

^④ 《劳军捐献运动蓬勃发展本市今日开始卖旗》，南方日报，1951-01-20(2)。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60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国台湾的罪行，代表了全体海外华侨、国内归侨侨眷的态度。在中国致公党的带动和影响下，海外华侨及国内归侨侨眷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中。②归侨参军或随军赴朝作战。如 1950 年秋冬，在泰国当小学教师的华侨女青年许玲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回国。因没有身份证明，她和同行的十几名中国人在轮船舱底躲藏了 20 多个小时才出境。在轮船航行途中，她响应祖国抗美援朝的号召，捐出自己带回的一些首饰和瑞士陀牌女式姊妹表中的一块，支持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后毅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前线作战，并留下了在朝鲜前线的战斗手册，其中的一篇《夜间演习记》，记录了她所在的志愿军部队一次夜间实战演习的情况，很有价值。①③开展多种形式声援抗美援朝运动。海外华侨、归侨侨眷声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海外到国内遥相呼应，从中央侨务部门到各地侨乡上下联动，从侨领侨商到一般侨众齐声行动。他们或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侵入中国台湾，或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慰问电，或举行各种集会声援抗美援朝斗争。④为抗美援朝运动捐献财物。如抗日战争期间归国到滇缅公路为中国抗战抢运战略物资的印尼归侨陈寿全，在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并占领后，他辗转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开车，1949 年 11 月他带头开门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冶炼厂，并担任该厂工筹会主任兼组织委员，多次被评为厂、县、市各级先进人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尽管家庭困难，但他仍慷慨捐献出从印尼带回来维持生活的 10 两黄金支援祖国抗美援朝战争。②

① 许玲在朝鲜前线的工作手册原件，收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见王春法主编：《行远同梦——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北京时代华文书店 2019 年版，第 54 页。

② 张国贤、姚盈丽编著：《南侨机工英名录》下册，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23 页。

(三) 少数民族的独特作用与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动员，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人民政权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加速了民族团结与交融，推动了社会整合与治理。①**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动员工作，以民族平等为前提，以民族团结为目标。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甘甲和甲吾两个藏族部落曾为了一座草山发生纠纷，相互仇杀历时 35 年，经过前后 20 多次的调解都毫无效果，抗美援朝开始后，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这一纠纷圆满解决，他们还把草山改名为“团结山”。①在国家大义面前，族群矛盾黯然失色，不仅解决了“小难”，而且为解决国家“大难”添砖加瓦。民族团结进一步推动了动员的成效，如宁夏平罗回、汉农民组织了生产合作社，屡屡打破生产记录，保证了军需民用和增产捐献等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②**结合民族习俗与地域特色**。少数民族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地域性与习俗性上表现突出。内蒙古锡盟东部联合旗举办那达慕大会时进行了捐献活动，“到会的三千多牧民就捐献了近四千头牲畜，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一块银元，五十个元宝和其他很多东西”②。借助那达慕这一传统节日，充分调动了蒙古族同胞的捐献热情。一方面，使抗美援朝“融入”传统，体现了民族地区对于抗美援朝的重视；另一方面，利用节日欢庆引导捐献，更是找准了时机，体现了施政的灵活性。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地区，以“丰畜”为主要增产目标，捐献时又多以畜牧产品等实物为主，相较于汉族地区以粮食、现金等为主要捐献物，更具地域特色。还有诸如宣传时采

①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188 页。

②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140 页。

用藏语、维吾尔语宣传，藏族同胞在和平公约上签藏文名等，均是战争动员与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③与宗教联系紧密。中国少数民族大多都有宗教信仰，在民族地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时，依托宗教活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共中央西北局注重团结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开展少数民族的抗美援朝运动，“通过宗教形式由上而下，先发动本民族中的进步分子和代表性人物出面活动，并经过上层，号召下层”^①。1951年2月11日，为纪念穆罕默德诞辰，兰州市举行了8个民族上万人的抗美援朝游行示威；清水县245个清真寺7万多回民召开座谈会；卓尼自治区天堂寺组织了包含200多名僧人和1900多名群众的游行。^②除了结合宗教活动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少数民族地区抗美援朝与宗教的联系还体现于其它方面，如订立爱国公约、募集捐献等活动常以寺庙为单位开展；在宗教活动（如讲经、礼拜等）之后即刻开展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等。

三、动员宣传的图景多维高效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面临四个方面的社会舆论需求：解释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说服并调动民众支援朝鲜战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引导民众做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工作，应对可能发生的舆论事件。对此，文字宣传、语音宣传和形象宣传，在地区战争动员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其中，标语口号、报纸、漫画、戏剧都是典型形式，以确保群众能看得懂、听得懂并且喜闻乐见，在动员群众支持和参与战争动员中成效明显。

^① 《通过宗教中的上层开展少数民族的抗美援朝运动》，《党内通讯》1951年第69期。

^②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8页。

（一）生动快捷的标语口号

宣传主体作为标语口号动员的“第一个环节”具有重要作用，往往掌握着标语口号的“主导权”。在动员的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类型的标语口号。动员初期的口号往往和相应的大会、活动等相结合，以调动情绪、易于呼喊为主，有时人民群众自身也会喊出表现个人意志的口号，如“为前线贡献一切！”“把敌人消灭干净！”等。随着动员工作的深入，各界结合具体的生产实践提出了不同类型口号。如针织、织染业倡导“生产一定要达到质的坚固，量的增多，节约原料，保护器材”；机制面粉业和粮食业提出“保证充分供应粮食，不套购，不掺假，不投机居奇”等。另外，为了加快传播速度、扩大传播范围，社会各界广泛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物品作为宣传工具。在公共空间，标语和口号被广泛张贴于街道、小巷，以及商店和住宅的显眼位置，直观地传达了民众对美国侵略者的愤慨情绪。此外，各行业人士创造性地利用身边资源传播标语口号。如邮电总局要求各地邮局将宣传口号印制在小纸条分发给寄信人，以便他们将这些口号连同邮票一起粘贴在邮件上。在上海，国际电台工会和国药业的职工们在电报纸和药品包装上印制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宣传标语……这些媒介的使用不仅多样化了宣传形式，也加大了政治信息的传递力度。

（二）动员宣传的主阵地：报纸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众多媒体对战争进展和国内民众支援情况进行了全面报道和大力宣传，报纸成为比较典型的载体，如中央级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文汇报》，以及各地的报纸，如《东北日报》《江西日报》《川北日报》《西康日报》等。其中，《东北日报》是

距离抗美援朝战场最近的一家报纸，也是战争期间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外、唯一向朝鲜战场派驻记者的地方党报，其刊发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独家报道，对当时的宣传动员和舆论引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0年7月至1953年8月战争时期发行的38期《人民画报》中，与抗美援朝相关的图文报道共有70余篇，抗美援朝的新闻往往占据画报的头版与封面，而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图像数量达到了470幅，涉及的类型众多，包括摄影、油画、雕塑、漫画、宣传画等。不同主题的图像发挥着不同的职能，成为战时国家舆论导向、民众动员、内外宣传的有力工具。而为了为农民解答与抗美援朝运动有关的问题，在《川北日报》等报刊上则十分注意报道群众问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答，为读者提供各种案例以便采纳，为了解决农民大多不识字的问题，大量设置读报组，以此增强对农民的宣传动员效果。

（三）视觉动员的利器：漫画

抗美援朝时期，漫画将讽刺与抨击的对象转向美帝侵略者。《人民画报》共刊登了20余幅批判美国的漫画作品，漫画中身着军服与财阀服饰的美国化身往往以滑稽丑陋形象示人。张光宇创作的《把法西斯死路当作前途》、张仃创作的《和死神赌博》等一系列漫画预言了美国发动侵略的不义之举必将遭遇失败的下场。张仃《地狱天堂》与米谷的《如此美国》则旨在揭露美国内部种族歧视、资本剥削、法西斯主义宣传等种种社会现象，美国人民正身处于水深火热的恶劣环境中。创刊初期的《人民画报》还未能实现大规模彩色印刷，但批判美国的政治漫画往往能够享有彩色印刷“特权”。丰富而鲜明的色彩、夸张与滑稽的形象、醒目有力的口号式文字，最大程度地激发起群众

誓与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思想情感。

(四) 喜闻乐见的戏剧

在抗美援朝时期，国内民众喜欢的戏剧曲艺形式较之于此前更加多种多样，评戏、大鼓、相声、歌曲数量增多，但依然以广大群众熟悉的、通俗短小的、易写易演的戏剧为主，主要包括独幕话剧、秧歌剧、小歌舞剧、快板剧、舞台活报剧等。这些剧种在宣传政策、教育民众的同时还在形式上解决了学习民众并改造和提高民众的问题。从存世作品来看，此时的戏剧主题内容可分为六大类：直接描写朝鲜人民反击侵略者；歌颂志愿军，表现中朝人民友谊；鼓励后方青年参军参战；加速工农业生产建设，支援前线；镇压反革命，消除隐患，防敌特破坏；控诉美帝暴行。其中，东北文联（东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工作的决定》，号召学校、工厂、机关单位的文艺团体，村、镇、县、市的文化机构积极开展文艺活动，并建立奖励机制，于很短的时间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一方面表现为集束出版、发表“抗美援朝”戏剧作品。例如，东北文联编辑出版群众文艺丛书 2 批各 10 种（由东北新华书店于 1950 年至 1951 年出版）、东北戏曲新报社出版了《汉城烽火》等戏曲小丛书 10 种、东北军区政治部编辑《抗美援朝戏剧歌曲特辑（第一集）》（内收《过江去》《血肉相连》等剧本 5 部）、旅大文协编辑部编辑抗美援朝文娱小丛书（由大连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等数种，东北文联机关刊物《群众文艺》除大量发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主题文艺作品外，还专门开辟“文娱材料”栏目发表同一主体的戏剧、曲艺作品；另一方面，城乡演出活动也异常频繁，有的一个厂矿就拥有业余剧团 17

个，“演员共有436名”。^①除东北地区外，仅1950年11月到1951年3月期间，河南省就有2026个剧团参与抗美援朝宣传演出，全中南区共有136059人通过剧目演出宣传抗美援朝运动。山西各地也成立了多个业余剧团，自编、自导、自演多部话剧、歌剧和地方戏。^②再如，为了引导川北人民参与战争动员，最主要的是要对占全区总人口96%^③的农民进行宣传。因此，使用川北农民喜爱的川北戏剧，以四川话为主，使用通俗的语言，让农民群众更易于接受。

总体而言，地区战争动员这一主题，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涉及到国家意识的构建、社会秩序的重建、民众心理的凝聚、思想观念的改造、新生政权社会价值观的变革等复杂问题，是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中相当重要又比较特殊的一个选题。而对这一选题的研究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仍然广泛，有赖于采用更宽广的视域、更丰富的史料、更独特的切口，并有待于新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以此渐趋全面、客观、细微地还原这场战争的面貌。

^① 李敬信：《活跃在生产战线上的业余剧团》，《群众文艺》，1951（4卷3期）。

^② 如太原铁路局南站机务段演出《年》，工人医院演出《抗美援朝医疗队》以及小型剧《麻痹不得》《好亲戚》，新化剧团演出《农村新风光》《赵玉玲劝夫》《邵巧云》（新编历史剧），新新剧团演出《灭亡之途》《小女婿》，晋声剧团演出《保卫家园》《庆祝胜利》，京剧工作团演出《送子参军》《皇帝与妓女》（新编历史剧），外埠移风评剧团演出《纸老虎》《一家光荣》《四姊妹参军》，鲜灵霞评剧团演出《父子争先》《红花遍地开》《乌鸦告状》《信陵公子》（新编历史剧）等新剧。

^③ 1950年至1952年，川北区以农业人口为主，约占全区总人口的96%。川北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川北区志1950.1-1952.9》，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중국사 관점에서 본 6·25 전쟁

지역에 대한 전쟁 동원을 중심으로

최근 관련 문헌 사료가 계속 발굴되고 활용되면서 중국사 시점에서 고찰한 6·25 전쟁에 대한 연구가 점차 새로운 변화와 특징을 나타내고 있다. 이는 다음 다섯 방향으로 요약할 수 있다. 첫째, 전통적 문제들에 대한 연구가 중요한 진전을 거두면서 중대 사안을 둘러싼 연구가 기본적인 공감대를 형성했다. 둘째, 연구 범위가 초기의 군사 역사 연구에서 정치, 문화, 외교, 사회, 인물, 국제 관계, 매체 선전 등 다양한 분야로 점차 확장되고, 전문 연구가 깊이를 더하는 한편 학술적 관점이 다양성을 띠게 되었다. 셋째, 새로운 연구 이론, 방법, 양식이 출현하면서 학제적 연구가 활발하게 이뤄지고 있다. 넷째, 국내외 파일 및 자료가 보다 깊이 있게 발굴, 정리, 출판, 활용되고 있다. 다섯째, 국내외 학술 교류와 협력이 크게 증가하고, 연구 성과가 국제적인 영향력을 발휘하고 있다. 세부 연구 내용을 보자면, 최근 6·25 전쟁 관련 연구는 여전히 기존에 주목받던 사안에 국한되어 있다. 중국 정부의 전쟁 의사결정에 영향을 미친 요소, 과정, 의미, 가치, 정전 협상, 전후 사안 처리, 전쟁의 영향과 평가 등이 그 예이다.

6·25 전쟁이 일어나자 중국 정부는 평화 협상에 의한 해결을 호소하였으나 1950년 6월 27일 트루먼 대통령은 침략의 화살을 중국에게 돌리는 공개 성명을 발표한다. 항미원조(抗美援朝) 전쟁은 한반도 내전에 대한 미국 정부의 무장 간섭, 대만 해협에 미국 제 7 함대 파견, 북중 국경으로의 전쟁 확대의 배경 속에서 발생한 것이다. 1950년 10월부터 1953년 7월 27일 정전협정이 체결될 때까지 중국의 당과 정부는 북한의 당과 정부의 요청을 수용하고 중국 인민지원군(人民志願軍) 총 290여만 명을 전쟁에 투입한다. 그 기간 중국의 당과

정부는 전황을 통괄하며 정확하게 전쟁을 지휘했을 뿐 아니라 적극적인 전쟁 동원을 펼쳐 전국적인 항미원조 전쟁 운동을 전개하였다. 현재 연구자들은 항미원조 전쟁 운동 중에서도 지역에 대한 전쟁 동원이라는 구체적 사안을 보다 주목하고 있다. 해외 자료의 공개 외에도 중국 연구자들은 중국 각지에 있는 자료를 발굴하고 연구하는 데 중점을 둔다. 그 중에서도 전국 및 지방 관련 부처의 적극적인 참여에 힘입어 연구자들의 연구에 유용한 지방 문건, 신문, 역사 사료, 지방지(地方誌) 등 역사 자료를 발굴하고 정리하는 작업이 큰 성과를 거두었다. 그 결과 정부가 주도하고, 민간이 참여한 지역에 대한 전쟁 동원 사안이 지역 연구자들의 더 큰 관심을 받게 되면서 항미원조 운동의 지역성에 대한 연구도 활기를 띠고 있다. 지역을 개별 케이스로 한 연구 성과가 지속적으로 증가하는 가운데 지역 단위가 세분화되고, 지역의 범위가 축소되는가 하면 연구 대상 집단이 다양해지는 추세를 보인다.

1 전쟁 동원 연구 대상 지역의 지속적 확대

전쟁 동원 지역에 대한 연구 범위는 랴오닝(遼寧) 지역과 중난(中南) 일대, 네이멍구(內蒙古), 산둥(山東), 산시(山西), 후난(湖南), 후베이(湖北), 윈난(雲南), 장쑤(江蘇), 저장(浙江), 광둥(廣東)을 아우르는 지역과 성 단위, 베이징시(北京市), 상하이시(上海市), 안양시(安陽市), 카이펑시(開封市), 이창시(宜昌市)와 같은 중대형 도시 단위, 우룽현(武隆縣), 하이룽현(海龍縣), 용슈현(永修縣), 동베이(東北) 지역 농촌, 장쑤 남부 지역 농촌이 해당하는 구(區)와 현 그리고 향촌, 쓰촨(四川) 티베트, 텐진항(天津港)을 포함하는 일부 특수 지역이 해당한다. 본 연구에서는 랴오닝 지역과 상하이 및 이창 세 곳을 중점적으로 다룬다.

가) 전쟁 지역과 인접한 랴오닝 지역

옛 랴오둥성(遼東省)^①, 랴오시성(遼西省)^②, 선양시(沈陽市), 뤼다시(旅大市)^③, 푸순시(撫順市), 번시시(本溪市)를 포함하는 랴오닝 지역은 한반도와 강을 사이에 둔 곳으로, 가까운 곳에서 항미원조 전쟁에 직접적으로 기여하는 병참기지 역할을 수행하였다. 전쟁 기간, 랴오닝 지역은 들것병과 전문 기술자, 노동자를 대거 조직하였다. 총 동원 인력은 246 만 2297 명(회)으로 당시 랴오닝 지역 전체 인구의 11.7%, 당시 해당 지역 청년 노동력의 52.9%에 달한다. 전쟁에 동원된 들것은 총 1 만 1210 개, 차량은 18 만 9082 대였다^④. 들것병은 주로 농촌, 현 단위에서 동원되었다. 일반 들것병과 핵심 들것병으로 나뉘었는데, 일반 들것병은 단거리 국내 운송 임무를 맡았고, 핵심 들것병은 해외에서 전시 임무를 수행하였다. 핵심 들것병 가족은 군인 가족에게 제공되는 우대 혜택을 받았다. 이후 전쟁이 진행되면서 전장에서의 실제적 수요가 발생하자 핵심 들것병을 기초로 한 준 군사화된 들것부대를 조직하여 장기간 군사작전에 투입되었다. 운전수, 기술자, 의료인, 요리사, 통역사, 선원, 석공, 목수 등 전문 기술자는 주로 도시에서 임무를 수행하였는데, 이들을 동원하기 위해 설득을 위한 교육과 합당한 보수 지급을 병행하는 한편 先사후공(先私后公)의 원칙을 적용하였다. 즉, 우선적으로는 개인, 자영업자, 미취업자를 모집한 뒤 사기업 직원으로 범위를 넓혔고, 마지막으로 공공기관과 국영기업 직원을 동원하여 전쟁 동원으로 인해 각 성의 국민 경제에 미칠 수 있는

① 랴오둥성은 1949년 4월에 설치됐다. 성도는 안둥시(지금의 단둥)이며, 랴오닝성 동부와 지린성 통화(通化), 바이산(白山) 등지를 관할한다. 1954년 6월 19일, 랴오둥성은 중앙인민정부의 승인을 받고 폐지되고, 당시의 랴오시성과 통합하여 랴오닝성이 되었다.

② 랴오시성은 1949년 4월에 설치됐다. 성도는 진저우(錦州)시이며, 랴오닝성 서부와 진저우, 푸신(阜新), 쓰핑(四平, 현재 지린성 소속), 산하이관(山海關, 현재 허베이성 소속) 등지를 관할한다. 1954년 6월 19일 랴오시성은 중앙인민정부의 승인을 받고 폐지되고, 당시의 랴오둥성과 통합하여 랴오닝성이 되었다.

③ 旅大市成立于 1950 年 12 月, 辖区包括今大连市主城区、旅顺口区、金州区、瓦房店市、长海县等地。1954 年 6 月 19 日, 旅大市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撤销, 划归辽宁省管辖。뤼다시는 1950년 12월에 설치됐으며, 다렌시 주요 도시, 뤼순커우구(旅順口區), 진저우구(金州區), 와팡덴시(瓦房店市), 장하이현(長海縣) 등지를 관할한다.

④ 자료: 랴오닝성 자료관 『랴오닝성 해방전쟁, 항미원조 시기 인적 동원 작업 사료』, 『항미원조 시기 전시 동원 통계표』

타격과 영향을 최소화하였다. 그러나 전장 형세 변화로 기술자에 대한 수요가 급증하면서 기존 인력으로 실제 수요를 맞출 수 없는 상황이 되었다. 이를 해결하기 위해 부족한 기술자를 양성하기 위한 기술 교육을 실시한다. 운전사의 경우, 전쟁이 심화되며 대량의 장비 보급이 필요했으나 운전사는 태부족이었다. 이에 랴오둥과 랴오시의 각 시에 자동차운전학교를 설립하고, 공공기관에서 모집한 사람에게 운전 기술을 교육하여 전쟁 운송에 필요한 자원을 공급하였다. 노동자는 한반도 현지 근무와 후방 전장 배치로 구분된다. 한반도 현지 근무 노동자 동원 방식과 편제는 일반 들것병과 동일하다. 반면 후방 전장 배치 노동자에게는 전시 수요 충족을 보장하고, 농민 생산을 살핀다. 밝는 원칙이 적용되었다. 이들은 공항, 철도, 도로, 군용 창고의 건설과 전시 대비 사업 등 6·25 전쟁과 관련한 국내 국방 인프라 건설에 투입되었다. 또 전쟁 노동자를 모용제(雇傭制)에 따라 운영하며 합당한 보수를 지급하는 것 외에도 노동자 가정의 농사에 지장이 없도록 틈을 주고받는 품앗이를 활성화하였다.

나) 높은 경제 수준의 상하이시

장강 삼각주에 위치한 상하이시는 발달한 경제와 편리한 육상 및 해상 교통 자원이라는 이점을 살려 전선에 식품과 의복 및 긴급 물자를 공급하는 중요 원천으로 작용하였다. 상하이시 정부의 동원령에 따라 상하이 각계각층은 6·25 전쟁에서 싸우는 북한과 중국 병사들의 식품과 의복을 공급하기 위하여 생산 증대와 물자 절약 운동을 펼치는 데 힘을 모았다. 중국 인민지원군이 이 전쟁에 투입된 때는 겨울인데다가 유독 추운 북한의 날씨 때문에 지원군의 방한복 해결이 당시로서는 매우 중대한 문제였다. 이에 상하이시 상공업계와 상하이시 활자제판(製版) 동업(同業)조합, 상하이시 장부제본업동업조합, 상하이시 기계모형업동업조합, 상하이시 나무상자업(板箱業)동업조합, 상하이시 자동차운송업동업조합 등이 방한복 기증 장려

운동을 전개하였다. 상하이시 상공업연합회가 항미원조 지원부대에 울 스웨터 1 천 벌을 기증했고^①, 용화구(龍華區)와 같은 상하이시의 일부 현도 많은 양의 방한복을 기증하며 협조하였다. 방한복 기부 장려 외에도 상하이현, 신징구(新涇區)^②, 용화구^③ 및 일부 공공기관도 북한 전선에 다양한 긴급 물자를 기증하고 나섰다. 대중화(大中華)고무공장, 정태(正泰)고무공장, 의생(義生)고무공장, 대성(大成)고무공장은 1950년 10월부터 시작하여 2년 동안 군용 고무장화 1144만 켤레와 고무 소재 방수포 4만 150자를 비롯한 고무 소재의 기타 군수품을 대량 공급하였다. 상하이 경공업계는 통조림, 비스킷, 군용 취사용품, 고글, 식기, 가죽 신발, 가죽 옷 등을 보냈으며, 상하이 자동차제조업체는 손수레 500대를, 상하이 배터리공장은 레이더용 철제 배터리를 보태었다. 화동(華東) 공업부 경리처(經理處)의 자동차부속품위원회는 북한 전선에서 급히 필요한 자동차 부속품과 부품을 시험 제작하는가 하면 신이(信誼)의약품공장은 소독용 소금물 등을 병에 담아 대량 공급하였다^④. 이 같은 기증 물품은 전장에서 매우 큰 역할을 하였다.

다) 핵심 교통 허브 이창(宜昌)시

이창시는 양쯔강 중상류 분계점과 시링샤(西陵峽) 입구에 위치하여 국경을 통과하는 부대를 맞이하고 이들이 경유하도록 돕는 중요하고도 막중한 임무를 수행했다. 1950년 12월 이창시는 전방지원위원회를 설립하고, 공급, 대접, 교통,

상하이시 상공업연합회 준비회의 항미원조 지원부대에 기증한 울 스웨터 1천 벌의 신속한 제작을 위한 서한:, 1950년 12월 8일. 상하이시 자료관 소장, 자료번호: C48-2-53-24.

1992년, 상하이현과 옛 민항구(閔行區)을 통합해 새로운 민항구가 탄생했다.

1949년에 설치된 신징구는 1956년에 폐지되어 시자오구(西郊區)로 편입되었다.

자료: 『상하이고무공업지(志)』 편찬위원회 지, 『상하이고무공업지』, 상하이사회과학원출판사 2000년 출간, qq24. 상하이현지(志) 편찬위원회 지, 『상하이현지』, 상하이인민출판사 1993년 출간, qq43, 289. 홍커우구지(虹口區志), 상하이사회과학원출판사 1999년 출간, qq580. 『상하이경공업지(志)』 편찬위원회 지: 『상하이경공업지』, 상하이사회과학원출판사 1996년 출간, qq30, 32. 『상하이자동차공업지(志)』 편찬위원회 지: 『상하이자동차공업지』, 상하이사회과학원출판사 1999년 출간, qq15.

교대와 비서실을 제공하는 전방지원센터를 마련한다. 이곳에는 26 명이 근무했으며, 시민이 행정과 과장과 센터장을 함께 맡았다. 마을 주민들은 소규모로 뭉쳐 전방 지원을 위한 조장을 뽑기도 하였다. 뿐만 아니라 1 만 9 천 명을 수용하는 거주 공간과 함께 3 만 8 천여 1h 에 달하는 침상용 풀과 벧짚이 제공되어 군용 말 600 마리를 묶어 둘 수 있는 마구간과 임시 병상 40 개를 갖춘 임시 병원을 지을 수 있었다. 이창에서 사양(沙洋)으로 이어지는 곳에 지원센터와 마구간을 마련하여 기차 환승을 위해 육로를 통해 샹오간(孝感)으로 이동하는 부대를 지원하였다. 1950 년 12 월 19 일부터 1951 년 2 월 26 일까지 이창시 전방지원센터는 서남 지역에서 이창을 거쳐 동진하거나 북진하는 지원군 병력 32 만 7891 명을 맞이하고 중계하였다. 이 병력에 대한 지원은 1950 년 12 월 19 일 i 1951 년 2 월 26 일의 10 만 9216 명, 3 월 2 일 i 5 월 16 일의 8 만 8202 명, 5 월 17 일 i 6 월 23 일의 7 만 1329 명, 7 월 14 일 i 9 월 19 일의 5 만 9144 명과 같이 총 네 시기에 걸쳐 이뤄졌다. 이 외에도 군용 말 4385 필과 군용 기계, 탄약, 기자재, 차량, 연료, 약품, 기타 군수 물자가 이곳을 경유하여 운송되었다^①. 이창 시민들은 매번 다양한 환영, 환송, 연회, 위문 행사를 했으며, 세탁조, 바느질조, 물품대여조를 꾸려 지원군에게 봉사하며 국경을 넘는 지원군 병력을 정성껏 맞이하였다.

2 동원에 참여한 여러 계층의 역할에 대한 심도 있는 분석

소수민족, 민주 당파, 신 민주주의 청년단, 대학교, 문화예술계, 적십자, 국내외 애국 화교, 대만 동포, 상공업자, 신화(新華)서점 등 사회 계층과 조직, 기구 및 단체가 항미원조 전쟁 운동에서 보인 활약을 파헤치는 과정에서 지역적 전쟁 동원의 일환인 이들을 통해 전쟁 동원의 전반적 상황을 보다 잘 이해할 수 있었다. 다음은 광저우 상공업계와 국내외 애국 화교 및 소수민족에 대해 분석하고자 한다.

자료: 이창시 자료관 소장 자료

가) 광저우 상공업계의 애국 동원과 사회적 역할

신 중국 건국 초기, 광저우시에서 운영된 전체 공업 회사는 1048 개, 광저우시 상업단체는 131 개, 소속 회원 수는 1 만 2638 개에 달했으며, 상공업체는 총 1 만 3000 개를 웃돌았다. 이는 광저우에서 상공업계가 갖는 위상을 가늠할 수 있는 수치이다^①. 항미원조 운동에 적극 동참한 화난(華南) 지부는 중앙 정부의 단계별 지시와 요구에 응하였고, 광저우의 실질적 핵심 임무를 반영하는 동시에 상공업계의 일치된 움직임을 이끌어내기 위한 조치를 마련하였다. 상공업연합회를 동원한 통일전선(統一戰線) 작업 실시. 여기서 광저우상공업연합회는 다음의 두 가지 임무를 수행하였다. 첫 번째는 경제 분야로, 정부의 시장 관리, 공사(公私) 관계 처리, 상공업 조정 등 분야에서 정부를 도와 그만의 경제적 역할을 발휘하였다. 두 번째는 정치 분야로, 상공업계가 항미원조 운동에 적극적으로 나서도록 하였다. ②항미원조에 따른 애국주의 교육을 통한 상공업계의 사상 개조 실시. 광저우의 각 상공업계는 항미원조 선전이 심화하자 상공업자들이 소속 시의 애국 상공업계 및 시민과 함께 이전보다 더욱 견고한 반 침략 통일전선을 구축하는 것을 촉구하는 차원의 규탄대회를 열었다^②. 상공업계의 세금 완납 독려. 상공업계가 잘 돼야 국가 세수가 증가하며(할 수 있다)^③, 항미원조에도 보탬이 된다는 것이었다. 이에 화난 지부의 지휘와 광저우 민주 당파의 독려 속에 광저우 상공업계는 납세 및 세금 완납을 핵심으로 하는 작업에 돌입하였다. 항미원조 애국 기부 운동에 동참하게 된 상공업계. 상공업계는 기부 운동의 최대 원동력이었다. 상공업연합회와 업체들이 1950 년 12 월부터 1951 년 6 월까지 실시한 운동만 해도 수류탄 기부 운동^④과

광둥권역 광저우 분책(分冊) 엮음, 『중국자본주의 상공업 사회주의 개조(광둥권역 광저우 분책)』, 중앙공산당사출판사 1993 년판, qq24, 25.

『마오저동의 호소에 응답한 광저우상공업연합준비위원회』, 남방일보, 1950 년 12 월 6 일(1).

중공중앙문헌연구실 저: 『건국 이후의 중요 문헌 선집(제 1 권)』, 중앙문헌출판사 1992 년 출간,qq469 i476.

『어제 광저우상공업계 3 만여 명 항미원조 경축 행진 실시』, 남방일보, 1950 년 12 월 13 일(1).

문대 위문 운동^㉑, 비행기 포탄 기부 운동, 금 기부 운동이 있다. 애국주의 구호 속에 기부를 기초로 하는 통일 전선 작업에 속도가 붙었으며, 그 중에서도 상공업계가 단연 큰손^㉒으로 손꼽혔다^㉓.

나) 국내외 화교의 진정성 있는 다양한 참여

항미원조 운동이 일어나자 해외 화교와 귀국한 화교들은 다양한 지원 활동을 펼쳤다. 전장에 직접 몸담는가 하면 다양한 집회를 열고, 전보 발송, 물품 기부를 통해 미국의 침략을 강력히 규탄하였다. 또 중국공산당 중앙위원회의 항미원조 결정을 적극 지지하고 지원군의 북한 내 작전 수행을 지원하는 등 항미원조 운동에서 중요하고 특별한 존재감을 드러냈다. **화교 당파의 미국 침략 규탄.** 중국치공당(中國致公黨)은 화교를 대표하는 당이다. 항미원조 운동에서는 북한에 대한 미국의 무장 침략과 중국 대만 침입의 죄를 강력 규탄하는 성명을 수 차례 발표하는 등의 활약을 통해 해외 화교와 귀국 화교의 입장을 대변하였다. 이와 같은 중국치공당의 노력은 해외 화교와 귀국 화교가 항미원조 운동에 적극 동참하는 데 일조하였다. 귀국 화교는 전쟁에 직접 참가하거나 종군 작전을 수행하였다. 1950년 가을, 태국에서 초등학교 교사를 하던 젊은 여성 화교 쉬링(許玲)은 부모의 반대를 무릅쓴 채 중국행을 감행한다. 신분을 증명할 수 없던 그녀는 동행한 중국인 십여 명과 함께 배 하부에서 20시간 넘게 숨어 지낸 끝에 출국에 성공한다. 배에 숨어서 이동하는 동안 조국의 항미원조에 크게 공감한 그녀는 지니고 있던 장신구와 스위스산 여성 시계를 기부하며 항미원조 전선 지원에 동참한다. 중국에 도착한 그녀는 중국 인민지원군에 지원하여 북한 전선에 투입되고, 한반도 전선에서의 일을 기록으로 남긴다. 그 중에서도 그녀가 소속한 지원군 부대의 야간 실전 훈련을

『위문 기부 운동 활발히 진행, 우리시는 오늘부터 깃발 판매 개시』, 남방일보, 1951년 1월 20일(2).

중국인민정치협상회의 광저우시위원회 문학 및 역사 자료연구위원회 저: 『광저우 문학 및 연구 자료(제 60호)』, 광둥인민출판사 2002년 출간, qq62.

기록한 『야간훈련기』는 그 가치를 높게 평가받고 있다^①. 다양한 형태의 향미원조 지원 운동 전개. 해외 화교와 귀국 화교는 국내외적인 협조, 중앙 화교 업무 부처와 각 귀국 화교 거주 지역의 연계, 화교계 지도자 및 화교 사업가와 기타 화교들로 이어지는 연대 등 다양한 방식으로 향미원조 운동을 지원하였다. 그들은 UN 에 미국의 한반도 침략과 중국 대만 침입을 반대하는 청원서를 제출하는가 하면 중국 인민지원군에게 위문 편지를 보내거나 향미원조 지원을 위한 각종 집회를 열었다.

향미원조 운동을 위한 금전적 지원. 일례로 인도네시아 화교 천서우취안(陳壽全)은 항일전쟁 당시 귀국한 뒤 중국의 항전(抗戰)을 돕기 위해 버마 로드(Bvsn b Rpbe)를 통해 전략 물자를 운송하였다. 버마 로드가 일본군에게 차단된 채 점령되자 방향을 틀어 국민정부자원위원회의 전기화학제련소로 차를 몰았다. 1949 년 11 월 인민해방군의 제련소 진주(進駐)를 적극 지원하는 한편 해당 제련소의 노조준비위원회 주임(主任)과 조직 위원을 겸임하며 공장, 현, 시로부터 여러 차례 모범적 인물로 선정되기도 하였다. 향미원조 전쟁이 발발한 이후에는 금전적 어려움을 겪고 있는 와중에도 생계 유지를 위해 인도네시아에서 가져온 금 500h 을 조국의 향미원조 운동에 쾌척하였다^②.

다) 소수민족 특유의 역할과 기여

신 중국 건국 초기에 진행된 향미원조 전쟁 동원으로 소수민족의 인민 정권 및 중화 민족에 대한 동질감이 강화하였다. 이는 민족 단결과 융합을 촉진하며 사회 통합과 관리에 긍정적 효과를 가져왔다. 민족 단결에 대한 관심 증대. 소수민족에게 부여된 동원령은 민족 평등을 전제로 하며, 민족 단결이 그 목표였다. 간쑤(甘肅)와

쉬링의 한반도 전선 기록을 적은 수첩 원본, 중국화교역사박물관 소장, 편집장 왕춘파(王春法): 『먼 곳에서 같은 꿈을 꾸다』 화교 및 중국인과 신 중국』, 베이징시대화문서점 2019 년 출간, qq54.

장귀셴(張國賢), 야오잉리(姚盈麗) 저: 『남양 화교 기계공 영웅 명부』 하권, 중국화교출판사 2016 년 출간, qq 22 i23.

칭하이(靑海) 접경에 위치한 간자(甘甲)와 자우(甲冑)라는 티베트의 두 부락은 한 산을 둘러싼 분쟁 때문에 35 년이나 적대 관계로 지냈다. 스무 차례 이상 화해를 시도하였으나 아무런 성과가 없었다. 양속으로 지내던 두 부락은 향미원조가 개시되자 애국주의 기치를 내걸고 분쟁을 원만히 해결했고, 분쟁 대상이던 산 이름도 단결산(團結山)으로 바꾸었다^①. 국가적 대의 앞에 부족 간 갈등의 명분이 사라지며 작은 어려움(小難)이 해결되자 나아가 국가적 큰 어려움(大難) 극복을 위해 일치단결한 것이다. 생산협력사(生産合作社)를 조직한 닝샤(寧夏) 핑뤄현(平羅縣)의 회족과 한족 농민은 계속해서 새로운 생산 기록을 세우면서 군수와 민간을 위한 증산 기부 등 임무를 순조롭게 수행하였다. 민족 풍습과 지역 특색의 접목. 소수민족의 향미원조 운동에는 지역성과 풍속이 두드러지게 나타났다. 네이멍구 시맹(錫盟) 동부 연합기(聯合旗)에서 열린 나담 축제(Nebn Fbjs)에서 기부 행사를 진행하였는데, 축제에 참석한 유목민 3천여 명이 4천 마리에 달하는 가축과 1만 5941 위안 상당의 은화, 원보(元寶, 중국 옛 전통 화폐) 50 개를 비롯한 많은 물건을 기부하였다^②. 나담이라는 전통 축제를 통해 몽골족 동포의 기부 열정이 빛을 발한 것이다. 먼저 향미원조를 전통에 가미하여 향미원조에 대한 민족적 지역의 관심을 나타냈고,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시의적절한 축제를 통해 기부를 독려하면서 정책 수행의 유연성까지 보여주었다. 목축업이 생계 수단인 지역이다 보니 짜축 증가가 증산의 핵심 목표였고, 기부 물품도 축산물 등 현물 위주였다. 식량, 현금 등을 주로 기부한 한족 지역과는 다른 지역 특징이 돋보이는 지점이다. 티베트어와 위구르어로 실시한 선전 활동, 평화협상 서명에 등장한 티베트 문자 등은 모두 전쟁 동원이 민족 지역과

중국 인민 향미원조 본부 선전부: 『위대한 향미원조 운동』, 인민출판사 1954년 출간, qq1188.

중국 인민 향미원조 본부 선전부: 『위대한 향미원조 운동』, 인민출판사 1954년 출간, qq1140.

맞물리며 만들어낸 산물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종교와의 밀접한 접촉.** 중국 소수민족은 대개 고유의 종교를 갖고 있다. 민족 지역에서의 향미원조 운동 전개 시에도 종교 활동을 활용하여 기대 이상의 효과를 거두었다. 중국공산당 중앙위원회 서북 지부는 종교계 지도자의 단결을 통한 소수민족의 향미원조 운동 실시에 역점을 두었다. 해당 민족의 진보 인사와 대표적 인사를 우선적으로 내세워 활동을 전개한 뒤 지도층에서 출발하여 일반 시민에게 호소하는 식으로 종교적 수단을 빌려 위에서 아래로 흐르는 활동을 전개한 것이다.^① 1951년 2월 11일, 란저우(蘭州)시는 마호메트 탄생 기념일에 8개 민족의 수만 명이 집결한 가운데 향미원조 시위를 거행하였다. 칭수이현(淸水縣)에 있는 245개 이슬람 사원에서는 7만 명이 넘는 회교도가 좌담회를 개최하였고, 쥐니(卓尼)자치구의 천당사(天堂寺)는 승려 200여 명과 시민 1900여 명을 모아 시위를 하기도 했다^②. 소수민족 지역에서 종교 활동과 긴밀히 연계하여 진행된 향미원조 운동의 종교적 연관성은 다른 부분에서도 살펴볼 수 있다. 주로 사원 단위로 이뤄진 애국공약(愛國公約) 체결, 기부 모금 등 활동을 비롯하여 종교 일정(설법, 예배 등) 종료 즉시 이어진 향미원조 운동 선전 등이 그 예이다.

3 다각도에서 고효율로 이뤄진 동원 선전

6·25 전쟁 발발 이후 중국은 향미원조 전쟁의 필요성과 필연성 설명, 한반도 전장에 대한 적극적이고 능동적인 국민적 지원의 설득과 시행, 장기 전쟁을 대비한 국민의 사상적 준비 작업, 발생 가능한 여론 이슈에 대한 대응으로 요약할 수 있는 네 종류의 사회적 여론에 직면한다. 이 같은 분위기 속에 활자 선전, 음성 선전, 이미지 선전이 전쟁 지역 동원에 폭넓게 활용되었다. 그 가운데 표어 슬로건, 신문,

① 「종교 상층부를 통해 전개한 소수민족의 향미원조 운동」, 『당내통신(黨內通訊)』, 1951년 제 69호.

중국 인민 향미원조 본부 선전부: 『위대한 향미원조 운동』, 인민출판사 1954년 출간, qq1188.

만화, 연극은 시민들이 쉽게 듣고 보며 즐길 수 있는 전통적 매체로서 대중의 지원과 전쟁 동원 참여를 이끌어내는 데 큰 효과를 발휘하였다.

가) 선전에 최적화된 생동적 표어 슬로건

선전 주체는 표어 슬로건 동원의 첫 단계로서 중요한 의미를 지니며, 표어 슬로건에서도 통상 주도적 역할을 한다. 동원을 실시할 때 단계별로 상이한 표어 슬로건이 제시되었다. 관련 회의, 행사 등의 특색을 반영한 동원 초기 슬로건은 정서적으로 고양시키고 소리내서 외치기 좋은 것이 채택되었다. 때로는 시민 스스로가 선전을 위해 모든 걸 바치자! 나 적을 말끔히 제거하자! 와 같이 개인의 뜻을 표현하는 슬로건을 외쳤다. 동원 작업이 계속적으로 진행되면서 사회 각계각층은 실제 생산 현장을 반영한 다양한 슬로건을 내세웠다. 방직공장과 염직공장은 질적 성장, 양적 증대, 원료 절약, 물품 보호의 원칙을 지켜 생산하자! 라는 슬로건을 외쳤다. 밀가루공장과 양곡공장은 식량을 충분히 공급하고, 부정 매입, 이물 혼합, 매점매석을 하지 말자! 를 내걸었다. 이 외에도 이를 빠르고 광범위하게 확산하기 위해 사회 각계각층은 생활하는 곳곳을 선전 도구로 활용하였다. 공공장소의 경우, 길, 골목, 상점, 주거지의 눈에 띄는 곳에 표어와 슬로건을 부착하여 미국 침략자에 대한 시민들의 분노를 직관적으로 표출하였다. 각 업계 인사들은 자신이 보유한 자원을 표어 슬로건 확산에 창의적으로 활용하였다. 체신부를 예로 들면, 각 지역 우체국에 선전 슬로건을 작은 쪽지로 만들어 편지를 부치러 온 사람에게 나눠 주도록 하였다. 쪽지 슬로건을 우표와 함께 편지봉투에 붙이게 하기 위함이었다. 상하이에서는 국제라디오노조와 한약업 종사자들이 전보 종지와 약 포장지에 미국 침략에 반대하는 내용의 선전 표어를 인쇄하였다. 이처럼 선전 방식이 다양해지면서 정치 소식도 보다 빠르게 퍼져 나갈 수 있었다.

나) 동원 선전의 주요 수단인 신문

항미원조 전쟁 기간, 중국 매체들은 전쟁 현황과 중국 국민의 지원 상황을 전면적이고 대대적으로 보도하였고, **인민일보**· **인민화보(人民畫報)**· **문휘보(文彙報)**와 같은 중앙 주류 신문과 **동북일보**· **강서일보(江西日報)**· **쑤북일보(川北日報)**· **쑤강일보(西康日報)** 등의 지역 신문은 이 과정의 핵심 수단으로 자리잡았다. 동북일보의 경우, 항미원조 전장과 가장 인접한 신문사로, **신화사(新華社)**와 **인민일보**와 더불어 6·25 전쟁에 종군기자를 파견한 유일한 지역 당 기관지이기도 하다. 역사적 가치가 있는 독점보도를 수차례 하면서 당시 동원 선전과 여론 형성에 큰 기여를 하였다. 1950년 7월부터 1953년 8월에 이르는 전쟁 기간에 발행한 **인민화보** 38호에 실린 항미원조 관련 기사는 70여 편에 이른다. 또 관련 기사는 보통 1면이나 표지를 장식했다. 항미원조를 주제로 한 문화예술 작품도 470편에 육박했다. 영상, 유화, 조각, 만화, 선전화 등 그 종류도 다양했다. 다양한 주제를 담은 콘텐츠는 각자의 역할을 발휘하며 전시 국가의 여론 형성, 민중 동원, 국내외 선전에 유용한 수단으로 쓰였다. 항미원조 운동에 대한 농민의 궁금증을 풀어주는 노력도 있었다. **쑤북일보** 등은 시민들의 질문사항과 그 답변을 보도하는데 역점을 두었다. 독자들의 이해를 돕기 위해 다양한 사례를 들었고, 문맹률이 높은 농촌 현실을 고려하여 신문 읽어주기 조를 조직함으로써 농민에 대한 선전 동원 효과를 높였다.

다) 시각적 표자 동원 수단인 만화

항미원조 시기, 만화의 주된 풍자 및 비난 대상은 미국 침략자였다. **인민일보**는 20여 편의 미국을 비판하는 만화를 게재하였다. 만화는 군복과 부자의 옷차림을 한 인물을 미국으로 그리면서, 이들을 교활하고 추악한 이미지로 표현하였다. 장광위(張光宇)가 그린 <파시즘 파멸의 전철을 밟다>와 장딩(張仃)의 <저승사자와의 도박> 등 일련의 만화는 불의(不義)한 미국의 침략 행위가 결국 실패로 끝날

것이라는 예언적 작품이다. 장딩의 <지옥천국>과 미구(米谷)의 <이게 미국이다>는 인종 차별, 자본 약탈, 파시즘 선전 등 미국의 갖가지 사회 현상을 폭로하고, 미국 국민이 열악한 환경에서 도탄에 빠져 있음을 표현하고자 했다. 창간 초기였던 <인민화보>는 컬러 인쇄가 아직 전면 도입되지 않았으나 미국을 비판하는 정치 만화에는 컬러 인쇄의 특권을 허용하였다. 풍부하고 선명한 컬러와 과장되고 우스꽝스러운 이미지, 거기에 시선을 사로잡는 호소력 짙은 슬로건식의 내용은 미국 침략자와 끝까지 싸우고자 하는 국민 감정을 최대한 끌어올리기에 최적이었다.

라) 누구나 즐길 수 있는 공연 작품

항미원조 시기 중국 국민이 좋아한 공연 및 예술 형태가 기존보다 다양해지며, 평극(評劇), 대고(大鼓), 만담, 노래의 수도 늘어났다. 그림에도 단막극, 양가(秧歌)극, 소규모 가무극, 쾌판극(快板劇), 시사풍자극 등 대중에게 익숙하면서도 쉽고 짧으며, 편하게 써서 연기할 수 있는 공연이 가장 큰 사랑을 받았다. 이들 작품은 정책 선전과 대중 교육의 역할을 했을 뿐 아니라 대중을 학습시키고, 그들을 개조 및 발전시키는 데 필요한 새로운 방법을 제시하였다. 현존 작품을 예로 살펴보면, 당시 공연 주제는 △침략자에 대한 북한측의 반격을 직접적으로 묘사 △지원군을 칭송하며 북중의 우호적 관계를 표현 △후방 청년층의 참전 독려 △농공업 생산 증대로 전선 지원 △반혁명을 저지하여 위험 요소를 제거하고, 간첩 행위를 차단 △미국의 폭력 행위 규탄의 여섯 가지로 정리할 수 있다. 이 가운데 <항미원조와 국가 방위|선전 작업의 적극적 전개에 대한 결정>을 발표한 동북문연(동북문학예술계연합회)은 학교, 공장, 공공기관에 속한 문화예술 단체와 촌(村), 진(鎭), 현, 시의 문화 기관에 문화예술 활동을 적극적으로 펼칠 것을 호소하고, 이에 대한 보상 체계를 만들며 짧은 기간 동안 상당한 성과를 거뒀다. 먼저, 항미원조|공연 작품을 묶음으로 출판

및 발표하였다. 동북문연은 두 차례에 걸쳐 대중문화예술총서 10 종을 출간(동북 신화서점이 1950 년 i 1951 년 출판)하였고, 동북전통극신보사(東北劇曲新報社)는 『한성봉화(漢城烽火)』 등 전통극 총서 10 종을, 동북군사지역정치부는 『강을 건너(過江去)』와 『혈육 같은 사이(血肉相聯)』를 비롯한 극본 5 편이 실린 『항미원조 전통가곡 특집(제 1 권)』을 출간하였다. 이 외에도 뤼다문화협회 편집부는 항미원조 문화오락총서(다렌 신화서점이 출판 및 발간)를 내 놓았고, 동북문연의 기관 간행물인 『군중문예』에는 항미원조, 국가 방위 를 주제로 한 문화예술 작품 외에도 문화오락 소재 를 다루는 코너를 따로 만들어 상술한 주제로 제작한 공연 및 예술 작품을 게재하였다. 다른 한편으로는 도시와 농촌에서 벌어지는 공연이 전에 없이 증가하였다. 한 공장과 광산은 취미 극단 17 개를 운영했으며, 여기서 활동하는 배우는 436 명 이었다^①. 1950 년 11 월 i 1951 년 3 월에 둥베이 지역 외에도 허난성(河南省)에서 운영된 2026 개의 극단이 항미원조 선전을 위한 공연에 참여했고, 13 만 6059 명에 달하는 중남부 지역 시민이 연극 공연을 통해 항미원조 운동을 선전하였다. 산서 각지에서도 취미 극단 여러 개가 설립되었다. 이들 극단은 극본, 감독, 연기를 직접 소화하며 다수의 연극과 가극 및 지방극을 선보였다^②. 뿐만 아니라 사천 북부 지역에서는 해당 지역 전체 인구의 96%^③에 이르는 농민을 전쟁

리정신(李敬信): 『생산 전선에서 활발한 취미 극단』, 『군중문예』, 1951 년 4 권 3 호.

타이위안(太原)철도국 남부역 기관차 사무소는 <해(年)을>, 공인병원(工人醫院)은 <항미원조 의료대>와 소형극 <경계를 늦추지 마>, <좋은 친척>을, 신화(新化)극단은 <농촌의 새 풍경>, <자오위링취안푸(趙玉玲勸夫)>, <사오차오윈(邵巧云)>(신규 역사극)을, 신신극단은 <파멸의 길>, <작은 사위>를, 진성극단은 <국가를 지키다>, <승리를 축하하다>를, 경극공작단은 <아들을 전장으로>, <황제와 기녀>(신규 역사극)를, 외부 이풍평극단(移風評劇團)은 <중이 호랑이>, <가문의 영광>, <네 자매의 참전>을, 셴링샤평극단(鮮靈霞評劇團)은 <아버지와 아들의 경쟁>, <붉은 꽃이 만발했네>, <까마귀의 경고>, <신릉공자(信陵公子)>(신규 역사극) 등 새로운 작품을 공연하였다.

1950 년 i 1952 년, 쓰촨 북부 지역은 대부분이 농업 인구로, 해당 지역 전체 인구의 96%를 차지했다. 쓰촨북부지역지(志) 편찬위원회 저: 『쓰촨북부지역지 1950.1 i 1952.9』, 방지출판사(方志出版社) 2015 년 출간,

동원에 참여시키기 위하여 그들이 좋아하는 사천 북부 지역 공연을 그들의 방언으로 올렸다. 현지 농민들은 쉬운 대사로 짜인 공연을 거부감 없이 받아들였다.

종합하면 인적, 물적, 금전적 부분을 아우르는 전쟁의 지역 동원이라는 주제는 국가 의식의 구축, 사회 질서 재건, 국민의 심리적 결속, 사상 이념 개조, 신생 정권의 사회 가치관 변혁 등 복잡한 문제와 결부돼 있다. 중국 근현대사에서도 상당히 중요하게 조명될 뿐 아니라 특수한 면도 지니는 주제이다. 이 주제를 심도 있게 확장하여 연구할 여지는 여전히 상당하다. 보다 광범위한 시각과 풍부한 사료 그리고 독특한 접근법을 동원하고, 새로운 학술 이론과 연구 방법을 접목한다면 6·25 전쟁을 보다 전면적이고, 객관적이며 세밀하게 들여다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아이젠하워 행정부의 정전구상과 동북아 질서 내 한국군의 역할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Armistice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Armed Forces
in Northeast Asian Order

발표 | 손경호(국방대학교)

토론 | 나종남(육군사관학교)

아이젠하워 행정부의 정전구상과 동북아 질서 내 한국군의 역할

손경호(국방대학교)

I. 서론

미국은 6·25전쟁을 제한전쟁의 테두리 내에서 치렀다. 북한군이 처음 공격해 내려 올 때부터 미국은 공산주의자들의 침략을 긴급히 막아내면서 미국의 대응이 소련을 자극하여 제3차 세계대전을 일으키지 않도록 전쟁의 목표를 전전 상태의 회복으로 정하였다. 전황이 좋아진 뒤 미국은 전쟁의 목표를 전 한반도의 통일로 확장하였지만 여전히 전쟁의 범위를 한반도 경내로 제한하였다. 미국은 중국군이 개입하여 불리한 상황에 처하자 다시금 회담으로 전쟁을 끝낸다는 제한적인 목표로 돌아갔다. 아이젠하워(Dwight Eisenhower) 행정부가 들어선 뒤 전쟁을 신속히 종결하기 위하여 핵무기를 사용하고 또 만주로 전장을 확장하고자 했을 때에도 전쟁의 목표 자체는 바꾸지 않았다.

한편, 미국은 6·25전쟁을 통해 중국과 본격적으로 대결하게 되었다. 중국 정부가 한반도에서 미국과 당당히 겨루어 승리하였다고 하는 선전은 이 전쟁에서 미국과 중국이 처음으로 대규모 폭력을 주고받았다는 점에서는 진실을 설명한다. 중국이 미국의 오랜 대아시아 정책의 핵심이 되어왔고 제2차 세계대전 시기 공통의 적인 일본을 위해 서로 협력하였던 것을 돌이켜 보면 아쉬운 일이겠지만, 미국과 중국은 6·25전쟁을 치른 중요한 교전 당사국이 되었다. 이러한 관점에서 보면 6·25전쟁은 미국이 중국을 심각하게 접하게 된 계기로서 작용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미국은 냉전 체제 아래에서 대륙을 장악하고 소련에 의존하여 국가를 건설해 가는 공산주의 중국의 진면목을 발견하였고 군사적 대결을 통해 중국의 능력을 이해하게 되었다. 미국은 제한전쟁을 통해 스스로 족쇄를 채워 불편한 전쟁을 하였지만, 그러한 가운데서도 중국군의 전력은 미군에 심각한 패배를 안겨주었을 만큼 괄목할 만한 것이었다.

6·25전쟁이 정전체제로 옮겨간 과정은 흔히 소련의 지도자 스탈린의 사망으로 인한 회담의 진전이 계기가 된 정전협정의 체결, 이후 구체적으로 드러난 아이젠하워 행정부가 채택한 뉴룩(New Look)에 따른 질서 구축의 맥락에서 설명된다. 이 관점을 택하면 쌍방의 교전이 멈춘 뒤 세계적인 차원에서 미국이 시행한 한국군 건설과 이를 위한 경제 원조 정책을 쉽게 이해할 수 있게 된다. 또 다른 관점은 한국의 역할에 보다 중점을 두어 한국이 전쟁 말기에 도전적인 전략으로 미국으로부터 방위 공약을 쟁취하였으며 이를 통해 한미동맹이 성립되었고 대신 한국군의 지휘권을 국제연합(UN, 유엔)군이 행사하게 되었음을 설명한다. 이들 관점은 전쟁을 주도하였던 미국 행정부의 변화에 따라 세계전략이 변화하고 전쟁이 종결되는 과정에서 한국과 미국이 동맹

관계를 수립하며 한국군이 확장되는 변화를 명징하게 설명할 수 있는 장점이 있다.

하지만 위에서 제공하는 시각은 6·25전쟁이 제한전쟁으로 치러졌으며 이로 인해 형성된 미국의 경험을 반영하지 못한 한계를 지니고 있다. 특히 전쟁 기간 미국이 중국을 상대로 전쟁을 치르며 겪었던 다양한 상황과 이것이 미국 정부의 주요 인사들의 인식에 반영되어 나타난 여러 정책이 충분히 고찰되지 못하였다. 분명히 미국은 소련을 의식하여 전쟁에 뛰어들었고 소련이 개입할 가능성을 막기 위하여 전쟁의 목표와 범위, 수단을 제한하지만, 전쟁 시기 초반 몇 개월을 제외하고는 거의 중국과 전쟁하였다. 주된 교전 상대가 중국군이었던 것이다. 미국은 정전을 구상하며 전쟁의 배후에 있는 소련을 염두에 두면서도 현실적으로는 직접 전장에서 맞서고 있는 중국을 견제하고 다른 방법을 고안하였어야 했을 것이다.

본 연구는 이러한 문제의식을 바탕으로 미국이 중국을 상대로 한 전쟁 경험을 토대로 전쟁 막바지에 구상했던 정전에 대한 정책을 고찰해 보기로 한다. 이 작업을 통해 6·25전쟁의 정리기에 한반도가 정전 체제로 이행해 갔던 과정을 좀 더 실질적으로 이해할 수 있을 것으로 기대한다. 아울러 이 시기 미국이 그려내었던 여러 정전 구상 가운데 한국군을 대상으로 설정한 역할과 목표를 분석해 보고자 한다. 미국은 정전을 구상하며 지역적 차원에서 미군의 역할을 규명하지 않았다. 미군은 어디까지나 세계적 차원에서 역할을 수행하게 되어 있었고 지역 내에서는 해당 지역의 군대가 안전보장을 제공하는 임무를 맡게 되어있었다. 이러한 맥락에서 미국은 자연스럽게 한국군에 대한 사항을 규정하게 되어 있어, 본 연구는 이를 확인하고 의미를 따져보고자 한다. 본 연구는 필연적으로 미국이 구상했던 정전 정책을 담은 국가안전보장회의(NSC) 보고서를 분석하고 관련된 논의를 고찰하는 것을 주된 연구 방법으로 채택한다. 연구의 앞부분에서는 6·25전쟁에 개입한 중국군의 변화를 분석하여 미국이 인식한 중국군의 실체를 확인하고, 이어서 미국의 정전 구상안을 순차적으로 분석한다.

II. 중국군의 등장과 변화

1. 중국군의 개입과 미국의 충격

중국군의 6·25전쟁 개입은 미국이 전쟁 기간 가장 뼈아프게 경험하였던 사건이었다. 미국은 중국군이 한반도에 개입할 가능성을 크게 보지 않았다. 오히려 미국은 중국이 한반도 상황을 틈타 타이완에 어떠한 형태로든 도발을 감행할 것으로 예측하여 전쟁 초기 타이완 해협에 제7함대를 급파하였다.¹⁾ 유엔군이 반격에 나서서 38도선을

1)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이후 FRUS) 1950*, Vol. V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pp. 157-161.

통과할 시점에 미국은 저우언라이(周恩來)가 중국군의 개입을 경고하였을 때 이를 심각하게 듣지 않았다.²⁾ 심지어 10월 19일부터 한반도 경내에 진입한 중국군이 10월 25일 유엔군의 공격을 차단하고 불의의 일격을 가하였을 때조차 맥아더(Douglas MacArthur) 장군은 몇 개의 중국군 사단이 국경의 발전 설비를 보호하기 위하여 입경한 것으로 판단하였다.³⁾

사실 미국 행정부 내에서는 참전 이후 전쟁의 목표를 한반도의 통일로 확장하면서 중국군의 개입 이후 나타날 상황을 비교적 낙관적으로 보았다. 전쟁이 확전할 가장 유력한 경우는 소련이 개입하는 것이었는데 이에 대한 검토는 주로 NSC 73 문서를 통하여 이루어졌다. 1950년 8월 3일 NSC 73/1에서 미국의 의사결정자들은 소련이 선택할 수 있는 옵션을 검토하고 특별히 중국이 소련의 대리자로 참전할 경우 대응 방법을 분석하였다. 최종적으로 미국의 국가안전보장회의는 NSC 73/4를 채택하면서 중국군이 소련을 대신해 개입해 올 경우 미군은 전면적인 개입은 회피하고 만일 유엔군이 중국군에 대해 승산이 있다고 판단되면 군사행동을 계속하고 한반도 밖의 해상 및 공중에서도 대응 행동을 하기로 결정하였다.⁴⁾ 그런데 이 문서는 앞 버전의 문서인 NSC 73/3에서 중국군이 유엔군에 비해 우세할 경우를 배제하고 유엔군의 우세만을 남겨 두었다. 기본적으로 미국은 유엔군이 중국군에 대해 적어도 우세할 것으로 판단하였던 것이다.⁵⁾

미국 정부의 판단은 크게 어긋났다. 맥아더가 시작한 1950년 11월 24일 크리스마스 공세는 다음날 중국군의 반격으로 돈좌되었고 전 전선에서 유엔군이 밀려나기 시작하였다. 서부전선에서 전진하던 제8군은 워커(Walton Harris Walker) 장군의 지휘 아래 청천강 선에서 개성 인근까지 철수하였다. 동부전선에 있던 제10군단의 상황은 더 좋지 않았다. 미 해병 제1사단이 장진호에서부터 시작하여 영웅적인 철수를 감행하여 도달한 흥남 일대에 군단 전체가 고립되었다. 원산까지 탈취당하여 육로로 후퇴할 수 있는 경로가 차단된 것이다. 중국군은 1차 공세 이후 유엔군과의 접촉을 단절하고 산간 지역으로 후퇴하여 유엔군을 깊숙이 끌어들이고자 교묘하게 덫을 놓았고 유엔군이 이를 전혀 눈치채지 못하고 말려든 것이다.

갑작스러운 전선 상황의 악화는 미국 정부를 당황하게 하였다. 미 행정부 관리들의 눈에에는 고립된 10군단이 마치 제2차 세계대전 시기 던커크(Dunkerk)에 갇혀버린 연

2) Harry S. Truman, *Memoirs II*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6), pp. 361-362.

3) 로이 E. 애플만 저, 육군본부 역, 『낙동강에서 압록강까지』 (서울: 육군본부, 1963), pp. 562-581에 당시 정보 판단의 혼란상이 드러나 있다.

4) NSC 73/4, August 25, 1950.

5) 손경호, “제한전쟁을 수행하기 위한 미국의 6·25전쟁 정책과 전략: 전쟁목표에 관한 고찰을 중심으로,” 『한국국가전략』 Vol. 16 (2021), pp. 254-255.

합군처럼 보였다. 특별히 미국 정부를 당황하게 하였던 것은 아직 소련이 개입하지 않았는데 미군이 중국군의 개입에 의해 후퇴하였다는 것이다. 만일 소련이 유럽이나 일본에 대한 공격을 감행한다면 미국으로서는 아무것도 할 수 없이 수수방관해야 하는 입장이 된 것이다. 미국 정부는 1950년 12월 16일 국가비상사태를 선포하고는 전쟁의 목표를 새로이 정립하였다. 영국 정부와 함께 논의한 끝에 미국은 회담으로 전쟁을 종결하기로 하였다.⁶⁾

중국군 개입의 여파는 쉽게 회복되지 않았다. 중국군은 1950년의 끝자락에 다시 공세를 감행하여 평택에서 제천에 이르는 선까지 국제연합군을 밀어붙였다. 더구나 문제는 미국의 합참에까지 비관적인 분위기가 퍼져나간 것이었다. 합참의 분위기는 사태가 더 악화하여 유엔군이 급박하게 철수하게 되는 상황을 피하기 위해 한국을 포기하자는 의견이 대세를 형성하였다.⁷⁾ 그들은 일본의 방위를 위해서 한국군과 정부의 일부를 다른 곳으로 옮기고 철수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하였다. 트루먼과 국무부의 관료들이 이들을 제지하고 할 수 있는 범위에서 전쟁을 계속할 것을 요구하였다.⁸⁾ 다행히 리지웨이(Matthew B. Ridgway) 장군이 전선을 밀어 올리자 합참 역시 안정을 되찾았으며, 이후 리지웨이가 도달한 캔사스선을 기반으로 정전을 구상하게 되었다.⁹⁾

2. 중국군의 군사적 효율성 향상

중국군은 한반도에 개입한 이래 유엔군에 많은 피해를 입히면서 전쟁 상황을 반전시켰으나 세 번에 걸친 공세 이후에는 근본적인 한계에 봉착하였다. 사실 3차 공세조차도 중국군의 실정에서는 무리한 것이었으나 마오쩌둥(毛澤東)의 성화로 실시되었었다. 미군보다 기동력과 화력이 현저하게 부족하고 군수지원 능력이 부족한 중국군으로서는 현대적인 산업전쟁을 완전하게 구사하는 미군과 대결하는 것이 어려울 수밖에 없었다. 리지웨이의 부임 이후에 유엔군이 전열을 정비하고 중국군의 침투를 허락하지 않은 상태에서 막강한 화력수색을 실시하자 중국군은 곧 물러나기 시작하였다. 연이은 유엔군의 작전에 의해 중국군은 쉽게 한강선을 내주면서 철수하였다. 중국군이 시도한 4차 및 5차 공세 역시 이러한 중국군의 한계를 그대로 노출하였다. 5차 공세 이후 중국군은 지구작전과 평화회담을 통해 전쟁을 마무리 짓는 것으로 방향을 수정하였다.¹⁰⁾

6) 미국 정부는 1950년 11월 28일 안전보장회의부터 정전안을 진지하게 고민하기 시작하여 12월 4일부터 8일까지 애틀리(Clement R. Attlee) 수상을 필두로 한 영국 대표단과 회의를 거쳐 전쟁 목표를 정하였다. 자세한 설명은 손경호, “6·25전쟁에 나타난 미국의 제한전쟁 수행 체계 분석,” 『국제정치논총』 Vol. 44, No. 4 (2015), pp. 118-119 참조.

7) CCS 383.21 Korea(3-19-45), Sec. 41, RG 218 JCS Geographic Files, 1948-1950,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Administrations (NARA), College Park, MD.

8) 1950.12.26. 블레어하우스 회의에서 트루먼과 애치슨이 주도하였다. *FRUS 1950*, Vol. VII, p. 1601.

9) 리지웨이 장군의 전선회복과 이와 연관한 전쟁 목표의 결정 과정은 손경호(2015), pp. 126-130 참조.

중국군은 정전협상 기간을 통해 전투력을 향상하기 시작하였다. 전투력 증강은 두 가지 방향에서 추진되었다. 먼저 현지에서 방어 공사를 통해 전투 지속능력을 강화하였다. 중국군은 정전협상이 진척되어 분계선에 관한 합의가 이루어지자 점령한 지역을 요새화하기 시작하였다. 분계선에 관한 합의는 중요한 의미를 지니고 있었다. 양측이 한 달 이내에 모든 사항에 합의하여 정전이 이루어지면 현 접촉선이 그대로 분계선이 되기 때문이었다. 당시 전선에 일시적으로 정전에 대한 기대가 부풀어 올랐으며 적대행위가 자제되었다. 중국군은 이 시기에 단순히 진지를 강화하는 수준이 아니라 아예 동굴형으로 진지를 구축하였다. 중국군은 모든 시설을 지하 갱도화 하여 지하 갱도 속에 병사들의 생활 시설, 무기고는 물론 강당과 휴게실까지 건설하였다. 갱도화된 진지는 유엔군의 폭격에 잘 견뎠고 자연스럽게 중국군의 전투력이 개선되었다.¹¹⁾

중국군은 본격적으로 전력 개선을 시작하였다. 소련이 지원하는 압도적인 물자가 전선의 중국군에 공급되자 중국군은 사단 단위로 새로운 소련제 무기로 무장하기 시작하였다. 기존에 가지고 있던 다양한 원산지를 가진 무기 대신 통일된 규격의 표준적인 무기가 지급되고 포병과 기갑 화력이 보강되면서 중국군의 전력이 눈에 띄게 향상되었다. 스탈린은 전쟁을 장기화 하기로 방침을 정하고는 중국에 60개 사단 분의 장비를 지원할 것을 약속하였다. 중국은 이를 최대한 활용하여 한반도 내 전력을 증강하였다. 1951년 여름부터 이듬해 여름까지 중국군의 화포는 1,141문에서 1,493문으로 증가하였고 로켓발사기의 경우 752정에서 3,082정으로 증가하였다. 인상적인 것은 중국군의 투입 가능한 항공기 100기에서 450기로 증가하였는데 이는 Mig-15를 포함한 전력이었다.¹²⁾

중국군의 개선된 전력은 1952년 10월 14일 실시된 쇼다운 작전(Operation Showdown)에서 입증되었다. 미국 정부는 포로 송환 문제로 회담이 경색되어 이를 해결하기 위해 일괄타결 안을 제시한 뒤 이것이 여의치 않자 중국군을 압박하기 위해 쇼다운작전을 개시하였다. 그러나 예상과 달리 유엔군은 일부 지역에서만 우세를 거두었고 대다수의 지역에서 기대했던 성과를 올리지 못하였다. 유엔군은 작전을 개시하며 5일 정도면 목표를 달성할 수 있을 것으로 기대하였으나 중국군의 선전으로 인해 42일 간이나 전투가 지속되었다. 오히려 중국군이 ‘상감령전투’등에서 승리를 거두었다. 중국군은 이 시기 개입 초기와는 다른 현대화된 장비로 무장한 잘 훈련된 군대로 변화하였던 것이다.

10)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 편 한국전략문제연구소 역, 『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戰史』(서울: 세경사, 1991), pp. 172-173.

11) 손경호. “회담과 접전의 병존을 통해 본 정전협상의 본질.” 전쟁기념사업회(편). 『정전 70년, 정전체제의 이해와 역사적 전망』(서울: 전쟁기념사업회, 2023). p. 64.

12) 중국 군사과학원 저, 국방부 군사편찬연구소 역, 『중국군의 한국전쟁사』 3권, (서울: 국방부 군사편찬연구소, 2005), p. 396.

이에 더하여 중국군은 군사력 개선을 전 군적으로 추진하였다. 마오쩌둥이 한반도를 중국군의 학교라고 언급하였던 대로 중국군은 본토에 있는 부대를 전선에 순환시켜 새로운 무기로 무장시키고 실전에 투입한 다음 다시 돌려보내기 시작하였다. 중국군 부대는 제2제대로 배치되면서 새로운 장비를 지급받고 훈련에 임하다가 제1제대가 되어 실전을 경험한 다음 본국으로 돌아갔다. 심지어 중국군은 참모 기능을 수행하는 장교들을 계선별로 본토에서 불러와 전쟁을 경험하게 한 뒤 돌려보내어 군사력의 모든 요소를 체계적으로 개선하였다.¹³⁾

III. 아이젠하워 행정부의 정전 구상

1. 기본적 구상과 문제의식

아이젠하워 행정부가 들어선 이후 한반도 내 전쟁에 관해 수립한 기본적인 계획은 NSC 147로 이전에 트루먼 행정부가 수행하던 제한전쟁과는 결이 달랐다. 이 계획은 상대방이 치러야 할 전쟁의 비용을 올려 신속히 정전을 달성하는 방식을 추구하였다. 미국의 새로운 의사결정자들은 집권 초기부터 적극적으로 핵무기 사용과 중국 본토에 대한 공격을 통하여 정전을 압박할 방안을 모색하였다.¹⁴⁾ 그들은 1953년 5월 6일 제 143차 국가안전보장회의에서 핵무기를 사용하여 만주나 중국 본토에 있는 목표를 공격하고 한반도 내에서 대규모의 협조된 공세를 취하고 지상작전을 강화하는 방안을 구체적으로 검토하였다.¹⁵⁾ 아이젠하워와 참모들은 핵무기를 사용할 수 있는 무기로 인식하였고 한반도 경내로 제한되었던 전장의 범위를 확대할 것을 결정하여 이전까지 엄격하게 추구되었던 제한전쟁의 경계를 허물기로 하였다.

다만 미국의 확전 계획은 1953년 4월 26일 그동안 멈추어 있던 협상이 재개되면서 실제적으로 구현되지는 않았다. 미국 정부는 새로이 정전에 대비한 계획인 NSC 154를 수립하였다. 사실 NSC 147은 정전이 성립되지 않을 경우에 대비하여 트루먼 행정부가 수립하였던 NSC 118/2를 대체한 성격이 강했기 때문에 본격적으로 정전에 관한 구상을 담은 계획문서를 작성한 것이다. 이 문서의 정식 명칭은 “한국 내 정전에 따른 즉각적인 미국의 전술, United States Tactics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

13) 중국 군사과학원 저, 국방부 군사편찬연구소 역, 『중국군의 한국전쟁사』 3권, (서울: 국방부 군사편찬연구소, 2005), pp. 473-477.

14) 아이젠하워는 대통령 당선자의 신분으로 한국 전선을 시찰하고 돌아가는 길에 참모들에게 전쟁이 너무 비싼 전쟁이 되지 않도록 북한, 만주, 그리고 중국 해안의 전략 목표들을 공격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하였다. 1953년 2월에는 공산군이 개성을 성역으로 활용하고 있어 이를 전술핵으로 공격하는 방안을 제기하기도 하였다. 손경호, “아이젠하워 행정부 출범 전후 6·25전쟁 확전 논의 고찰,” 『국방연구』 Vol. 67, No. 3 (2024) 참조.

15) "Discussion at the 143r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May 6, 1953." Eisenhower, 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1953-61(Ann Whitman File), NSC Series, Box No. 4,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S.

Armistice in Korea"이며 국가안전보장회의에 의해 공식적으로 회람된 일자는 6월 15일이었다. 이 시점은 회담장에서 그동안 난항을 거듭해 오던 송환 거부포로의 처리에 대한 합의가 이루어진 6월 8일로부터 일주일이 지난 시점이었다. 미국 정부가 정전을 목전에 두고 구상을 정리한 셈이다.

미국의 국가안전보장회의가 작성한 이 문서는 미국이 정전을 구상하며 고민하였던 근본적인 문제의식을 드러냈다. 흥미롭게도 NSC 154의 기본적인 개념을 담은 선행 연구인 참모 연구(Staff Study)에 붙여진 제목이 “정전이 성립할 경우 공산주의 중국에 대한 미국의 전술, U.S. Tactics Toward Communist China in The Event of An Armistice”였다.¹⁶⁾ 이 제목은 미국이 정전을 위해 근본적으로 중국을 가장 심각한 위협으로 인식하고 이에 대한 대비가 정전을 유지하는 핵심적인 구조를 형성하였음을 보여준다. 후일 *FRUS*에는 제목이 바뀌어 본 문서와 동일한 제목으로 작성된 참모 연구가 부록으로 수록되었다.¹⁷⁾ 아이젠하워와 참모들은 7월 7일자로 일부 내용이 수정된 NSC 154/1을 채택하였다.

NSC 154/1은 미국이 한반도에서 정전을 유지하고 동북아에서 평화를 지속하기 위해 중국을 억제해야 한다는 구상에 따라 작성되었다. 그 내용은 중국의 의도에 대한 판단과 미국의 행동 중점으로 구성되어 있으며 그 내용은 중국에 압력을 행사하는 분야와 방법, 유엔군 전력의 유지, 한국에 대한 원조, 정치협상, 그리고 동맹에 대한 설득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미국 정부는 중국이 군사력을 사용하여 목표를 추구하는 행태를 멈추지 않을 것이라고 전제하면서 특별히 동남아에서 이러한 위협이 계속될 것으로 보았다. 또한, 중국은 정전을 통해 자유 진영의 국가들을 전술적으로 활용하여 결국은 미국과 동맹국 사이를 이간시킬 것으로 판단되었다. 이에 미국은 정전이 성립된 직후에 중국을 정치적 및 경제적으로 압박하는 것이 바람직한 정전 구도를 형성하는데 중요할 것으로 보았다.¹⁸⁾

미국은 중국에 대한 압력을 다양한 방법으로 구상하였다. 우선 미국 정부는 타이완의 국민당 정부가 지배하는 중국을 정식 국가 및 유엔 회원국으로 인정하는 정책을 지속하기로 하였다. 또 미국은 중국으로의 화물 운송과 자금 이동을 차단하고 유엔군을 구성했던 다른 15개 국가들이 참여하는 대제재(great sanctions)를 실시하기로 하였다. 한편, 미국 정부는 프랑스, 영국, 호주, 뉴질랜드는 물론 가급적 많은 정전 서명국과 협력하여 만일 공산주의자들이 아시아의 어느 곳에서 문제를 일으키면 공산주의자들의 도전이 정전의 목적과 조건에 부합하지 않는다는 성명을 발표할 것을 정하였

16) NSC Policy Papers, NSC 154/1, RG 273, Record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7) NSC 154,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1174-1977.

18) NSC 154/1,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341-1344.

다. 군사적으로는 한국에 충분한 유엔군 전력을 유지하고 추가적인 유엔군을 모집할 것을 규정하였다.¹⁹⁾

미국 정부는 NSC 154/1에 한국군 지원 프로그램에 대한 언급도 추가하였다. 미국 정부는 이미 NSC48/5에 공식적으로 한국군을 육성하여 자국 방위를 책임질 수 있는 충분한 전력을 건설할 것을 명시하였었다. 이 목표와 방침은 NSC 118/2에도 이어졌으며 상당히 진척되고 있었다.²⁰⁾ 대신 NSC 154/1에는 다소 특이한 규정이 포함되었다. 미국 정부는 한국이 유엔에 협력하여 정전협정 규정을 성실히 준수하는 경우에 한하여 한국군을 충분한 방어능력을 지닌 군대로 육성하기 위해 지원하기로 하였다. 그리고 미국은 호주, 필리핀, 그리고 뉴질랜드와 유사한 형태로 한국에 안전보장을 제공할 것과 경제 재건을 위한 원조를 제공하기로 하였다.²¹⁾ 한국 지원 조항이 조건부로 설정된 것은 이승만 정부가 정전을 거부하면서 천명하였던 단독 북진론이 영향을 미친 결과였다.

2. 한반도 중립 통일 방안과 현실적 절충

미국은 일단 NSC 154/1을 기본적인 정전 구상을 정리하고 상황의 진전에 따라 필요한 정책을 개발하였다. 무엇보다 정전협정 체결을 통해 정치회담을 열게 되자 이를 계기로 새로운 한반도 질서를 구상하였다.²²⁾ 아이젠하워를 비롯한 의사결정자들은 NSC 157을 통해 정치회담을 통해 통일된 중립적인 한국을 추구하기로 하였다. NSC 157은 정치협상을 통해 한국에 대한 미국의 장기적인 목표를 설정하기 위하여 작성되었다. 국가안전보장회의는 미국에게 가장 바람직한 조건인 “대한민국이 주도하고 군사 동맹으로 발전할 수 있는 미국에 우호적인 통일 한국”을 달성하는 것이 현실적으로 불가능하여 위와 같은 목표를 선정하였다.²³⁾ 하지만 합참은 공산주의 국가들이 한반도를 지배하겠다는 욕망을 포기한 것이 아니므로 중립화된 한반도는 대단히 취약하다고 반대하였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합참은 이미 목표가 정해졌으므로 미국이 극동에서 강력한 군사태세를 유지하고 적절한 한국군 육성 방안을 포함한 군사적 지원을 제공해야 한다고 건의하였다.²⁴⁾ 미국 정부는 7월 6일 한국에 대한 보호를 추가한 NSC 157/1을 채택하였다.

미국이 한국에 대하여 가지고 있던 중립 통일 구상은 한국 측의 희망과는 무관한

19) Ibid.

20) 미국의 전쟁 시기 한국군 육성 정책은 손경호, “미국의 한국전쟁 정전 정책 고찰” 『미국사연구』 Vol. 36 (2012) 참조.

21) NSC 154/1.

22) 정전협정은 체결 이후 90일 이내에 정치협상을 열도록 규정하였다.

23) NSC 157,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272-1274.

24) Ibid.

것이였다. 미국은 한반도의 중립을 위해 병력을 철수시키며 기지를 폐쇄할 복안을 가지고 있었다. 물론 한국과 미국은 상호 방위조약도 체결할 수 없게 된다. 이러한 상태에서 중립은 공산주의 국가들에게는 힘의 공백으로 인식될 것이 분명하였다. 미국의 중립 통일 계획은 한국 정부로부터 쉽게 동의를 얻을 수 있는 성격이 아니었다. 자연스럽게 이승만은 1953년 8월 7일 덜레스(John Foster Dulles) 국무장관과 회담하며 중립 안을 수용할 수 없다고 반대하였다.²⁵⁾ 덜레스는 8월 5일 한국측 관료들과 정치협상 및 방위조약 등을 논의한 첫 회담을 가진 다음 이승만을 따로 만나 중립 통일 방안을 제시하였었다.²⁶⁾ 미국 정부는 자체적인 한반도 통일 방안을 정한 다음 한 달이 지난 다음에야 당사국인 한국에 공지한 것이다.

시간이 경과하면서 미국 정부의 의사결정자들은 자신들이 추구하는 중립 통일안의 한계를 이해하고 새로이 NSC 167을 작성하였다.²⁷⁾ 이는 공산측이 아무래도 북한 지역을 순순히 내어주기 않을 것으로 보았기 때문이다. 미국이 기지를 폐쇄하고 미군이 한반도에서 철수한다고 할지언정 북한이 스스로 존재를 포기할 수는 없을 것이였다. 때문에, 미국 정부는 정치협상에서 뜻한 대로 목표를 달성할 수 없는 상황을 가정된 계획을 수립하였다. 이 상황에서 가장 문제가 되었던 것은 한국 정부를 자제시키는 것이였다. 한국 정부는 정전협정에 동의하는 조건으로 정치협상을 통해서 통일을 달성하지 못하면 실패할 경우 군사행동을 요구하였기에, 미국은 한국 정부가 쉽사리 군사행동에 나서지 못하도록 막아야 하였다. 미국 정부는 이에 따라 정치협상이 실패하고 공산측이나 한국이 적대행위를 재개할 경우를 상정하여 각각의 대응 방안을 정립하였다.

미국 정부는 11월 9일 기존에 논의해 왔던 구상들을 정리하여 NSC 170을 채택하였다. 이에 따르면 미국의 한반도에 대한 목표는 장기 목표와 “현실적인” 당면 목표로 구분되었다. 장기적으로 미국은 한반도에서 통일된 한국을 추구하도록 정책 목표를 선정하였다. 통일 한국은 통합된 영토 위에 정치적으로도 통합을 이루며 국제적 합의 및 충분한 방어 역량을 통해 안전보장을 유지할 것으로 상정되었다. 하지만 단기적으로 미국은 유엔과 함께 한국이 공산주의 국가로부터 다시 침략을 당하지 않도록 방지하며 한반도에 자유 정권이 존속하도록 보호하고 지원할 것을 규정하였다. 특별히 미국은 한국이나 공산측이 정전협정을 어기고 전쟁을 시작하지 않도록 체계적인 접근 방법을 고안하여 NSC 170으로 정리하였다.²⁸⁾

25) 덜레스가 서울을 방문하여 회담하였다. Third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Rhee and Secretary Dulles,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 1481.

26) Draf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474-1475.

27) NSC 167,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546-1561.

28) NSC 170,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600-1604.

미국 정부의 한반도에 대한 구상은 중립 통일 방안과 현실적인 현상 유지 방안을 절충하여 성립되었다. NSC 170에 장기적 목표로 제시된 통일은 NSC 157/1이 명시했던 통일에서 중립을 배제한 통일을 지향하고 있다. 하지만 두 문서 모두 통일을 위한 안전보장 대책을 국제 제도, 즉 유엔에 의한 집단안전보장과 자체적인 한국의 능력을 제시하고 있어 근본적으로는 큰 차이가 없어 보인다. 실제 NSC 170은 공산측과 분쟁의 재발을 방지하기 위한 대화를 지속하되 그 논의 사항으로 통일된 한국이 미국에 우호적인 국가로서 존재하지만, 미군을 포함한 유엔군이 철수하고 미국 역시 한미 양자 협약에 의해 부여될 권리를 포기하는 안을 제안하고 있다. 한편 미국은 당면한 목표로서는 현상을 유지하기로 정하고 NSC 154/1이 규정한 대로 유엔군의 존속과 한국의 역량을 강화하는 정책을 추진하기로 한 것이다.

3. 한국군의 역할과 목표

미국은 정전 이후 질서를 구상해 가면서 한국군 증강을 중요한 요소로 다루었다. 한국군을 재건하는 것은 한국에 대한 방위 공약을 준수하는 것과 동시에 미군의 부담을 경감시켜 본국에 돌려보낼 수 있는 이중의 의미를 지니고 있었다. 아울러 한국군을 증가하는 것은 다양한 정전 구상을 가능하게 하는 물리적 토대로서 그 중요성이 인식되었다. 미국 정부는 안보 문서를 작성할 때마다 한국에 안보를 제공할 수 있는 유력한 수단으로 한국군 육성을 제안하였으며 이는 보통 한국군에 지상군 사단 20개를 건설하고 적절한 해군과 공군을 건설하는 것을 의미하였다.

NSC 154/1은 한국군을 한국 방어에 더 큰 책임을 질 수 있는 군대로 육성하되 현재의 프로그램에 따라 육성한다고 규정하였다. 이 문서는 중국군에게 압력을 가하기 위한 다양한 방법을 모색하는 가운데 한국군에 관한 사항을 이같이 명시하였다. 이에 의하면 한국군은 순수하게 방어적인 목적에 따라 육성되어야 했다. 한편 문서의 다른 부분을 확인하면 한국군의 육성과 동시에 한반도에 여전히 유엔군이 주둔하고 미국은 추가적인 유엔군을 유치하기 위해 최대한의 노력을 기울이게 되어 있었다.²⁹⁾ 결국 정전 체결에 임박하여 수립된 미국의 구상은 한국군 지상군 사단 20개와 적절한 해군과 공군력 건설을 목표로 하였고 유엔군과 함께 중국을 견제하기 위해 필요한 전력으로 한국군을 인식하였다.

NSC 157/1은 조금 다른 형태로 한국군의 역할을 기술하였다. 이 문서는 역내에서 발생한 도전에 대해 미국이 보복을 책임을 진다고 명시하였다. 한국군은 내부 전복 및 간접 침공에 대해 대응하는 것으로 설명되었다. 문서는 미국이 비밀 공작이나 경제적 지원을 제공할 수 있다고 명시하였다. 미국과 한국의 방위 역할이 나뉘어져 있

29) NSC 154/1,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 1343.

는 것이다. 이 문서가 규정한 또 다른 안전보장 대책은 한국이 유엔에 가입하는 것으로 집단안보 체제를 활용하는 것이 근본적으로 고려되었다. 물론 NSC 157/1은 통일된 한국이 중립을 유지하므로 한국과 미국이 안보를 위한 양자 조약을 체결할 수는 없다고 설명하였다.³⁰⁾ 이 문서는 한국군의 역할에 대해 좀 더 구체적으로 역내의 주요 강대국이 침공해 오는 경우를 제외한 그보다 약한 강도의 도전에 대해 독자적인 방어 능력을 구비해야 하는 것으로 규정하였다. 물론 주요 강대국은 중국을 지칭하는 것이었다.

NSC 167은 문서의 성격상 한국군의 역할을 규정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NSC 170은 장기적인 목표에 따라 성립될 통일 한국이 공산측의 도전을 방지하기 위해 갖추어야 할 한국군의 능력을 NSC 157/1과 같이 규정하였다. 즉 역내의 주요 강대국으로부터 받는 침공을 제외한 나머지 수준의 도발에 대응하는 것으로 설정되었다. 다만 당면한 목표에 따른 한국군의 역할에 대해서는 명확한 기준을 제시하지는 않았다. 미국은 한국군 육성을 계속하되 미군의 전환을 염두에 두고 지원한다고 명시하여, 미군이 한반도에서 철수할 것을 감안하여 군사력을 건설할 것을 규정하였다. 물론 미국 정부가 다른 유엔 참전국들이 병력을 유지하도록 최대한 노력하는 것도 포함되었다.³¹⁾

미국의 정전 구상 문서들은 한국군 건설의 구체적인 목표는 제시하지 않았다. NSC 154/1이 기존에 미국 정부가 추진해 왔던 지상군 20개 사단과 적절한 해군과 공군을 건설하는 프로그램을 추진할 것을 명시하였던 반면 통일된 중립 국가인 한국을 위한 한국군의 목표는 수치로 제시되지 않았다. 분명한 것은 중립국 한국이 비무장 국가를 의미하는 것은 아니었다. 그렇다고 적정한 군사력 수준이 따로 명시된 것은 아니었다. 다만 중립화 될 경우 미국과 방위조약을 체결할 수 없게 되며 외국군이 모두 철수하므로 상당한 수준의 능력이 필요할 것은 사실이었다. 하지만 중립화 통일 방안은 장기적인 계획이라 구체적인 수준을 정하기는 어려웠을 것이다. 때문에, 안보문서는 한국군의 능력을 역내 강대국의 침공으로부터 방위하는 것을 제외한 나머지 위협에 대응할 수 있는 대략적인 범위로 규정하였다.

IV. 결론

미국의 정전 구상은 철저하게 중국을 대상으로 상정하여 작성되었다. 이는 지금까지 한미동맹이 유지되면서 북한의 도발을 억제하고 유엔의 감시기구가 비무장지대에서 남북한의 대결을 자제시켜 왔던 일반적으로 인식된 정전 관리의 양상과는 동떨어

30) NSC 157/1,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 1346.

31) NSC 170,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600-1604.

진 인상을 갖게 한다. 미국은 실제 전쟁을 치렀던 상대인 중국에 압력을 가하여 정전을 위반하지 못하도록 견제하고 억제하는 데 중점을 두었다. 미국의 중국 중심 인식은 중립 통일방안을 구상하며 공산주의자들이 북한을 포기할 것이라고 가정한 것에서도 드러난다. 미국은 중국을 상대하기 위해 유엔 참전국의 병력이 유지되는 것이 필요하였고 할 수 있으면 많은 병력을 확보하기 위해 노력하였다. 미국이 중국을 중요한 억제 대상으로 인식한 이상 한반도를 미국에 우호적이지만 통일된 중립국가로 유지하려고 한 미국의 구상은 자연스러운 귀결로 이해될 수 있다. 중국이라면 한반도에서 미국의 발판이 사라지는 것을 환영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미국의 정전 구상 가운데 한국군에 부여된 역할은 자체적인 안정을 유지하는 것으로 규정되었다. 한반도에서 북한이 사라진 상태였기 때문에 실은 북한의 도전을 고려할 이유는 없었고 중국의 침공이 중요한 위협으로 상정된 것이었다. 미국 정부는 한국군의 능력을 신장시키고 한국이 정치적 통합과 지리적 통합을 달성하는 것을 보장하지만 중국의 침공을 막아내는 능력까지는 제공하기 어려울 것으로 판단하였다. 미국은 중국이 한국을 침략할 경우 대신 보복해 주는 것은 가능하게 보았지만, 근본적인 대응은 유엔의 집단안전보장 체제를 활용할 것을 고려하였다. 미국의 구상은 6·25 전쟁 이전 한국의 안전보장에 대한 미국의 구상과 유사해 보인다.

한반도에서의 정전은 미국이 다른 경우의 수로 생각하였던 분단된 한국을 기본으로 한 질서로 귀착되었다. 미국은 공산측의 재침을 방지하기 위해 유엔군을 유지하였으며 한국군을 육성하였다. 미국의 우려와 달리 한국 정부도 정치협상이 실패한 이후 통일을 달성하기 위한 독자적인 군사행동에 나서지 않았다. 결국, 한반도에서의 정전은 미국이 깨달았던 현실이 주도한 형태로 자리 잡았다.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Armistice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Armed Forces in Northeast Asian Order

Kyengho Son (Kore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I. Introduction

The United States fought the Korean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limited war. From the moment North Korean forces launched their initial attack, the U.S. aimed to urgently repel the communist aggression while preventing its response from provoking the Soviet Union into triggering a Third World War. Accordingly, the objective of the war was set a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te. After the tide of war turned in its favor, the U.S. expanded its war objective to the unification of the entire Korean Peninsula, but continued to limit the scope of the war to within the peninsula. Whe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ntervened and placed the U.S. in an unfavorable position, the U.S. reverted once again to the limited objective of ending the war through negotiations. Even after the Dwight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came to power and considered using nuclear weapons and expanding the battlefield into Manchuria in an effort to swiftly conclude the war,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the war remained unchanged.

Meanwhile, the U.S. came into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through the Korean W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ropaganda claiming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the U.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explains the truth that this war marked the first large-scale violent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hile it is regrettable in retrospect, considering that China had been a key component of the U.S.'s long-standing Asia policy an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ooperated against their common enemy,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U.S. and China became significant belligerents in the Korean War.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Korean War served as a pivotal moment for the U.S. to come into serious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Under the Cold War system, the U.S. discovered the true nature of communist China, which was consolidating control over the continent and building its state relying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came to understand China's capabilities through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lthough the U.S. imposed self-restrictions by engaging in a limited war, thereby conducting an uncomfortable conflict,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of the PLA was nonetheless remarkable enough to inflict serious defeats on the U.S. Forces.

The transition of the Korean War into an armistice regime is commonly explained by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which was triggered by progress in negotiations following the death of Soviet leader Stalin, and later clarifi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order-building pursued under the New Look policy adopted by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U.S.-led constru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Armed Forces and the accompanying economic aid policy can be easily understood in a global context after hostilit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ceased. Another perspective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Korea, explaining that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Korea secured a defense commitment from the U.S. through a challenging strategy,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ROK-U.S. Alliance, while the command authority over the ROK Armed Forces was exerci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UN) Forces. These perspectives have the advantage of clearly explaining how Korea and the U.S. established their alliance and expanded the ROK Armed Forces amid shifts in global strategy and the process of war ter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at led the war.

However, the perspectives presented above have the limitation of not reflect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U.S. shaped by the Korean War being conducted as a limited war. In particular, the various situations the U.S. encountered while fighting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the resulting policies shaped by the perceptions of key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ly examined. It is clear that the U.S. entered the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and limited the war's objectives, scope, and means to prevent Soviet intervention; however, except for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the war, the U.S. mostly fought China. In other words, the main opponent was the PLA. While formulating the armistice initiative, the U.S., though mindful of the Soviet Union behind the scenes, realistically needed to devise ways to contain and manage China, which it was directly confronting on the battlefield.

Based on this awareness,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armistice policy that the U.S. conceived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based on its experience fighting China. Through this work, it is expected that a more substantive understanding can be gained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Korean Peninsula transitioned to an armistice regime during the final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Moreover, among the various armistice initiatives formulated by the U.S.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study seeks to analyze the roles and objectives assigned to the ROK Armed Forces. The U.S. did not specify the role of its forc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when conceiving the armistice. The U.S. Forces were intended to operate primarily on a global scale, while the duty of providing security assurances within the region was assigned to the local forces. In this context, the U.S. naturally delineated matters related to the ROK Armed Forces, which this study seeks to examine and interpret along with their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inevitably adopts as its main research method the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reports containing the armistice policies conceived by the U.S. and a review of related discussions. In the earlier part of the study, the changes in the PLA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are analyzed to identify the nature of the PLA as perceived by the U.S., followed by a sequential analysis of the U.S. armistice initiative proposals.

II. The Emergence and Changes of the PLA

1. The PLA's Intervention and the U.S. Shock

The PL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was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experiences for the U.S. during the war. The U.S. did not initially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LA enter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seriously. Rather, the U.S. anticipated that China might exploit the situation in Korea to launch some form of provocation against Taiwan, and thus deployed the Seventh Fleet to the Taiwan Strait early in the war.¹ When UN Forces advanced past the 38th parallel and Zhou Enlai warned of the PLA's intervention, the U.S. did not take this seriously.² Even when the PLA, having entered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October 19, blocked a UN Forces attack and struck unexpectedly on October 25,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assessed that only a few PLA divisions had crossed the border to protect development facilities near the frontier.³

¹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after FRUS) 1950*, Vol. V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pp. 157-161.

² Harry S. Truman, *Memoirs II*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6), pp. 361-362.

³ The confusion in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at the time is revealed in Roy E. Appleman, translated by Army Headquarters,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Seoul: Army Headquarters, 1963), pp. 562-581.

In fact, as the objectives of war expanded to the 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fter taking part in the war, the U.S. administration viewed the situation following the PLA's intervention relatively optimistically.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for the war's escalation was Soviet intervention,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is possibility was primarily conducted through NSC 73 documents. On August 3, 1950, in NSC 73/1, U.S. decision-makers reviewed the options availabl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specifically analyzed response measures in the event that China participated as a proxy for the Soviet Union. Ultimately, the U.S. NSC adopted NSC 73/4, which stipulated that if the PLA intervened on behalf of the Soviet Union, U.S. Forces would avoid full-scale intervention; however, if the UN Forces were judged to have a favorable chance against the PLA, military actions would continue, including responses in maritime and aerial domains outside the Korean Peninsula.⁴ Notably, this document excluded the scenario in which the PLA is superior to the UN Forces from the previous version NSC 73/3, leaving only the scenario of UN Forces superiority. Essentially, the U.S. believed that the UN Forces would at least be superior to the PLA.⁵

The U.S. government's judgment proved to be gravely mistaken. The "Home by Christmas Offensive" launched by MacArthur on November 24, 1950, was halted the very next day by a counteroffensive from the PLA, and the UN Forces began to retreat across the entire front. On the western front, the Eighth Army under the command of General Walton Harris Walker withdrew from the Chongchon River line to the vicinity of Kaesong. The situation of the X Corps on the eastern front was even worse. Beginning at the Chosin Reservoir, the U.S. 1st Marine Division conducted a heroic withdrawal, during which the entire corps became isolated in the Hungnam area. With Wonsan having been captured, all overland retreat routes were blocked. Following their first offensive, the PLA cut off contact with the UN Forces and withdrew into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laying a cunning trap to lure the UN Forces deeper in; and the UN Forces failed to recognize this and fell right into the trap.

The sudden deterioration of the front lines caught the U.S. government off guard. To U.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he isolated X Corps appeared much like the Allied forces trapped at Dunkirk during World War II. What especially alarmed the U.S. government was the fact that U.S. Forces were retreating due to the PLA's intervention, even though the Soviet Union had not yet become involved. If the Soviet Union were to launch an attack on Europe or Japan, the U.S. would find itself unable to respond and forced to stand by helplessly. On December 16, 1950, the U.S. government declared a national emergency and redefined its war objectives. After discussions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U.S. decided to bring the war to an end through negotiations.⁶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PLA's intervention were not easily overcome. At the end of 1950, the PLA launched another offensive, pushing UN Forces back to a line stretching from Pyeongtaek to Jecheon. The problem was the spread of pessimism even within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A dominant view emerged among the Joint Chiefs that, in order to avoid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situation deteriorated further and the UN Forces were forced into a hasty withdrawal, it would be preferable to give up on Korea.⁷ They argued that parts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and government should be relocated

⁴ NSC 73/4, August 25, 1950.

⁵ Son, K., "For Limited War: An Analysis on U.S. Policy and Strategy in the Korean War Based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oals," *KRINS Quarterly* Vol. 16 (2021), pp. 254-255.

⁶ The U.S. government began to seriously consider an armistice proposal starting with the NSC meeting on November 28, 1950, and subsequently defined its war objectives through a series of meetings with the British delegation led by Prime Minister Clement R. Attlee, held from December 4 to 8. For more details, see Son, K., "Analyzing U.S. War Efforts to Limit the Korean War,"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4, No. 4 (2015), pp. 118-119.

⁷ CCS 383.21 Korea(3-19-45), Sec. 41, RG 218 JCS Geographic Files, 1948-1950,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elsewhere to prioritize the defense of Japan. Truman and officials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restrained them and demanded that the war be continued to the extent possible.⁸ Fortunately, General Matthew B. Ridgway succeeded in pushing the front line northward, which helped stabilize the stance of the Joint Chiefs, and this subsequently led to the conception of an armistice based on the Kansas Line reached by Ridgway.⁹

2. Improvement of the PLA's Military Efficiency

Since its interven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PLA inflicted significant damage on the UN Forces, reversing the course of the war; however, after three offensives, it encountered fundamental limitations. In fact, even the third offensive was overly ambitious given the PLA's actual conditions but was carried out under Mao Zedong's urging. Compared to the U.S. Forces, the PLA was significantly deficient in mobility and firepower, as well as logistical support capabilities, making it inevitably difficult for the PLA to confront the U.S. Forces that fully executed modern industrial warfare. After Ridgway's appointment, the UN Forces reorganized their lines and conducted powerful fire reconnaissance operations while preventing PLA infiltration, causing the PLA to begin a gradual withdrawal. Through successive UN Forces operations, the PLA easily relinquished the Han River line and retreated. The fourth and fifth offensives attempted by the PLA also clearly exposed these limitations. Following the fifth offensive, the PLA shifted its direction toward concluding the war through localized operations and peace talks.¹⁰

During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 period, the PLA began to enhance its combat capabilities. The reinforcement of combat power was pursued in two directions. First, the PLA strengthened its endurance in combat through defensive construction on-site. Once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armistice talks and an agreement on the demarcation line was reached, the PLA began to fortify the territories it occupied. The agreement on the demarcation line held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his is because, if both sides reached full agreement on all matters within one month to finalize the armistice, the existing line of contact would become the official demarcation line. At that time, expectations for an armistice temporarily rose along the front line, leading to a reduction in hostile ac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LA did not merely strengthen its positions but constructed cave-like fortifications. The PLA transformed all facilities into underground tunnels, building soldiers' living facilities, armories, as well as assembly halls and rest areas within these tunnels. These tunnel-fortified positions withstood UN Forces' bombing effectively, resulting in a natural improvement of the PLA's combat capabilities.¹¹

The PLA began a full-scale effort to improve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With the influx of overwhelming Soviet-supplied materiel to the front line, the PLA started rearming its divisions with

Administrations (NARA), College Park, MD.

⁸ This was led by Truman and Acheson at the Blair House meeting on December 26, 1950. *FRUS 1950*, Vol. VII, p. 1601.

⁹ For the process of front-line recovery by General Ridgway and the related determination of war objectives, see Son, K.(2015), pp. 126-130.

¹⁰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 translated by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trategy, 『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戰史』 (Seoul: Sekyungsa, 1991), pp. 172-173.

¹¹ Son, K. "The Nature of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s as Seen through the Coexistence of Talks and Clashes." Korea War-memorial Organization (edited). *70 Years of the Armistice: Understanding the Armistice Regime and Its Historical Prospects* (Seoul: Korea War-memorial Organization, 2023). p. 64.

new Soviet-made weaponry. Instead of the previously diverse and mixed-origin weaponry, the PLA was supplied with standardized arms of uniform specifications, and its artillery and armored firepower was reinforced, resulting in a marked improvement in its overall military capabilities. As Stalin decided to prolong the war, he promised to provide China with equipment for 60 divisions. China made full use of this aid to strengthen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etween the summer of 1951 and the following summer, the number of PLA artillery pieces increased from 1,141 to 1,493, and the number of rocket launchers surged from 752 to 3,082. Notably, the number of deployable PLA aircraft rose from 100 to 450, which included the MiG-15.¹²

The PLA's improved military capabilities were demonstrated in Operation Showdown launched on October 14, 1952. With negotiations deadlocked over the issue of prisoner repatriation, the U.S. government proposed a comprehensive settlement; when this failed, it initiated Operation Showdown to pressure the PLA.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however, the UN Forces achieved superiority in only a few areas and failed to attain the anticipated results in most regions. While the operation was expected to achieve its objectives within five days, fierce PLA resistance prolonged the battle for 42 days. The PLA even secured victories in engagements such as the Battle of Triangle Hill (Shangganling Campaign). By this time, the PLA had transformed into a well-trained military equipped with modernized weaponry, different from its condition at the outset of its intervention.

In addition, the PLA undertook a military-wide initiative to improve its military power. As Mao Zedong had referr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a "school" for the PLA, units stationed on the mainland were rotated to the front line, equipped with new weapons, deployed in actual combat, and then sent back. PLA units were initially assigned as the second echelon, receiving new equipment and undergoing training, and later transitioned to the first echelon to gain combat experience before returning to China. The PLA even brought in staff officers of various command levels from the mainland to experience the war firsthand and then sent them back, thereby systematically enhancing all aspects of its military power.¹³

III.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Armistice Initiative

1. Basic Concept and Problem Awareness

The fundamental plan regarding the war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mulated after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was NSC 147,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limited war approach pursued previously b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This plan aimed to raise the costs of war that must be borne by the opponent to swiftly achieve an armistice.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the new U.S. decision-makers actively explored measures to pressure the armistice through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attack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¹⁴ On May 6, 1953, at the 143rd NSC meeting, they

¹²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translated by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orces in the Korean War* Vol. 3, (Seoul: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2005), p. 396.

¹³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translated by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orces in the Korean War* Vol. 3, (Seoul: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2005), pp. 473-477.

¹⁴ As president-elect, Eisenhower inspected the Korean front and, on his return, urged his staff to target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North Korea, Manchuria, and the Chinese coast to prevent the war from becoming excessively costly. In February 1953, he also proposed using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Kaesong, which the communist forces were using as a sanctuary. See Son, K., "A Study on Issues about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Conflict in the Korea War before and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National Defense Studies* Vol.

specifically reviewed plans to use nuclear weapons to strike targets in Manchuria or mainland China, launch large-scale coordinated offensives with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reinforce ground operations.¹⁵ Eisenhower and his staff officers regarded nuclear weapons as a usable tool and decided to expand the battlefield that had been limit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reby breaking the previously strict boundaries of the limited war.

However, the U.S. escalation plan was not practically implemented after negotiations, which had been stalled, resumed on April 26, 1953. The U.S.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new plan in preparation for the armistice, known as NSC 154. In fact, NSC 147 mainly served to replace NSC 118/2, which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had prepared in case the armistice did not materialize, which is why NSC 154 was formulated to fully incorporate detailed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armistice. The official title of this document was “United States Tactics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 Armistice in Korea,” and it was officially circulated by the NSC on June 15. This date was one week after June 8, when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at the negotiation site regarding the handling of prisoners of war who refused repatriation, which had been a long-standing point of contention. Thus, the U.S. government finalized its plans just prior to the armistice.

This document, prepared by the U.S. NSC,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awareness the U.S. grappled with while planning for the armistice. Interestingly, the title of a prior staff study underpinning the basic concept of NSC 154 was “U.S. Tactics Toward Communist China in the Event of An Armistice.”¹⁶ This tit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U.S. fundamentally perceived China as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rmistice, and that preparations against it formed a core framework for maintaining the armistice. Later, the *FRUS* included the staff study—the title revised to match this document’s title—as an appendix.¹⁷ Eisenhower and his staff officers adopted a partially revised version, NSC 154/1, dated July 7.

NSC 154/1 was drafted based on the U.S. vision that China must be contained to maintain the armisti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sustain peace in Northeast Asia. Its content comprises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intentions and the focal points of U.S. actions, including the areas and methods of exerting pressure on China, the maintenance of UN Force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id to South Korea, political negotiations, and persuasion of allies. The U.S. government assumed that China would not cease pursuing its objectives through the use of military power and that such threats would continue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 Furthermore, it was anticipated that China would tactical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free world countries through the armistice to eventually drive a wedge between the U.S. and its allies. Accordingly, the U.S. regarded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pressuring China immediately after the armistice was established as crucial to forming a favorable armistice arrangement.¹⁸

The U.S. devised various methods to exert pressure on China. First, the U.S. government decided to maintain its policy of officially recognizing the China dominat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aiwan as a sovereign state and a member of the UN. Moreover, the U.S. planned to block shipments

67, No. 3 (2024).

¹⁵ "Discussion at the 143r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May 6, 1953." Eisenhower, 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1953-61 (Ann Whitman File), NSC Series, Box No. 4, Dwight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S.

¹⁶ NSC Policy Papers, NSC 154/1, RG 273, Record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¹⁷ NSC 154,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1174-1977.

¹⁸ NSC 154/1,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341-1344.

and financial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o implement great sanctions involving the 15 other countries that comprised the UN Forces. Meanwhile, the U.S. government decided to cooperate with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as many other armistice signatories as possible to agree that, should the communists cause trouble anywhere in Asia, a statement would be issued declaring that their challenge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purpose and terms of the armistice. Militarily, it stipulated maintaining sufficient UN Forces in Korea and recruiting additional UN Forces.¹⁹

The U.S. government also added to NSC 154/1 a reference to support programs for the ROK Armed Forces. It had already officially stated in NSC 48/5 the goal of developing the ROK Armed Forces to build sufficient military capability for self-defense. This objective and policy continued in NSC 118/2 and had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²⁰ However, NSC 154/1 contained some somewhat unusual provisions. The U.S. government decided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into a military with sufficient defensive capabilities only on the condition that South Korea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the terms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 The U.S. also decided to provide security assurances to South Korea—similar to those given to Australia, the Philippines, and New Zealand—as well as aid fo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²¹ The conditional nature of these support provisions was a result of the Syngman Rhee administration's unilateral northward advance policy, which had been declared in opposition to the armistice.

2. A Neutral Unification Plan for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 Realistic Compromise

The U.S. first outlined its basic armistice initiative through NSC 154/1 and developed necessary policies as the situation evolved. Most notably, as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created an opportunity to convene political talks, the U.S. devised a new order for the Korean Peninsula.²² Eisenhower and other decision-makers decided through NSC 157 to pursue a unified, neutral Korea via political talks. NSC 157 was drafted to establish the U.S.'s long-term objective for Korea through political negotiations. The NSC selected this objective because achieving the most desirable outcome for the U.S.—"a unified Korea led by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friendly to the U.S., with the potential to evolve into a military alliance"—was deemed unrealistic.²³ However,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pposed the idea of a neutralized Korean Peninsula, arguing that the communist states had not abandoned their desire to dominate the region, and therefore such a neutralization would leave Korea highly vulnerable. Nevertheless, since the objective had already been set, the Joint Chiefs recommended that the U.S. maintain a strong military posture in the Far East and provide military support, including appropriate plans to build up the ROK Armed Forces.²⁴ On July 6, the U.S. government adopted NSC 157/1, which added a provi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Korea.

The U.S. vision for a neutral unification of Korea was unrelated to the wishes of the Korean side. The U.S. intended to withdraw its forces and close its bases to achieve neutra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Naturall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Korea and the U.S.

¹⁹ Ibid.

²⁰ For the U.S. policy on developing the ROK Armed Forces during the war, see Son, K., "A Study on U.S. Armistice Policy for the Korean War" *Korea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36 (2012).

²¹ NSC 154/1.

²²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stipulated that political negotiations must be held within 90 days after its signing.

²³ NSC 157,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272-1274.

²⁴ Ibid.

would also be impossible. In this situation, neutrality would clearly be perceived by communist states as a power vacuum. The U.S. plan for neutral unification was not something the Korean government could easily agree to. U.S. Naturally, on August 7, 1953, Syngman Rhee met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and strongly opposed the neutrality plan.²⁵ Earlier, Dulles had held the first meeting with South Korean officials on August 5 to discuss political negotiations and a defense treaty, after which he met separately with Rhee to present the neutral unification proposal.²⁶ The U.S. government had finalized its own plan for Korea's unification but only informed the key party, South Korea, a month later.

Over time, U.S. government decision-makers came to underst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neutral unification plan they pursued and drafted a new document, NSC 167.²⁷ This was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 communist side was unlikely to willingly relinquish control over the North Korean region. Even if the U.S. closed its bases and withdrew U.S. Forces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 would not simply give up its existence. Therefore, the U.S. government formulated a contingency plan assuming that the objectives sought in the political negotiations would not be achieved. The biggest issue in this situation was restraining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Since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demanded military action if political negotiations failed to achieve unific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greeing to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the U.S. had to prevent South Korea from easily initiating such military action. Accordingly, the U.S. government prepared response plans assuming that political negotiations might fail and that either the communist side or South Korea could resume hostile actions.

On November 9, the U.S. government consolidated its previously discussed plans and adopted NSC 170. According to this, the U.S. objectives for the Korean Peninsula were divided into long-term goals and "realistic" immediate objectives. In the long term, the U.S. set its policy goal to pursue a unified Korea on the peninsula. This unified Korea was envisioned to achiev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ver the integrated territory and maintain security assura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and sufficient defense capabilities. However, in the short term, the U.S. stipulated that, together with the UN, it would prevent Korea from being invaded again by communist states and protect and support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 free regime on the peninsula. Specifically, the U.S. devised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nsure that neither Korea nor the communist side would violate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nd initiate a war, which was outlined in NSC 170.²⁸

The U.S. government's plan for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established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neutral unification proposal and a realistic status quo approach. The long-term goal of unification presented in NSC 170 aimed for unification without the neutrality clause specified in NSC 157/1. However, both documents fundamentally align in proposing security assurance measures for the unified state, including collective security assura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 and South Korea's own capabilities. In fact, NSC 170 proposed continuing dialogue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dispute with the communist side, while envisioning a unified Korea that exists as a U.S.-friendly state; but this plan included the withdrawal of U.S. Forces and UN Forces, and the U.S. relinquishing rights granted under the U.S.-ROK bilateral agreements. Meanwhile, the U.S. set the

²⁵ Dulles visited Seoul for the talk. Third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Rhee and Secretary Dulles,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 1481.

²⁶ Draf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474-1475.

²⁷ NSC 167,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546-1561.

²⁸ NSC 170,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600-1604.

immediate goal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decided to pursue policies to sustain the presence of UN Forces and strengthen Korea's capabilities, as stipulated in NSC 154/1.

3. Rol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The U.S. regarded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as a key element while shaping the post-armistice order. Rebuilding the ROK Armed Forces carried a dual significance: it fulfilled the defense commitment to South Korea while also reducing the burden on U.S. Forces, allowing their redeployment back to the homeland. Furthermore, increasing the ROK Armed Forces was recognized as a crucial physical foundation enabling various armistice initiatives. The U.S. government, in each security document it prepared,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as a powerful means of providing security to Korea, which generally indicated establishing 20 ground divisions along with adequate naval and air forces within the ROK Armed Forces.

NSC 154/1 stipulated that the ROK Armed Forces should be developed under the current program into a military capable of assuming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South Korea. This document clearly stated this provision regarding the ROK Armed Forces while seeking various measures to exert pressure on the PLA.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the ROK Armed Forces were to be developed solely for defensive purposes. Meanwhile, other parts of the document indicate that, alongs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UN Forces would remain station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U.S. would make utmost efforts to attract additional UN Forces.²⁹ Ultimately, the U.S. plan formulated just prior to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aimed to build 20 ground divisions along with adequate naval and air forces within the ROK Armed Forces, perceiving the ROK Armed Forces as military power necessary to keep China in Check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N Forces.

NSC 157/1 described the role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manner. The document stated that the U.S. would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retaliation in response to challenges arising in the region. The ROK Armed Forces were described as being tasked with responding to internal subversion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It also specified that the U.S. could provide clandestine operations or economic assistance. In this way, the defense roles of the U.S. and South Korea were divided. Another security assurance measure stipulated in the document was Korea's admission to the UN, which fundamentally considered leveraging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Of course, NSC 157/1 explained that, since a unified Korea would maintain neutrality, Korea and the U.S. would not be able to conclude a bilateral treaty for security.³⁰ This document provided a more detailed definition of the role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specifying that they should possess independent defensive capabilities against lower-intensity challenges, except in cases involving invasions by major powers within the region. Naturally, major powers here referred to China.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document, NSC 167 did not specify the role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However, NSC 170 outlined the capabilities that the ROK Armed Forces of a unified Korea, to be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long-term objectives, should possess to deter challenges from the communist side, following NSC 157/1. That is, the ROK Armed Forces were to be tasked with

²⁹ NSC 154/1,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 1343.

³⁰ NSC 157/1,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 1346.

responding to provocations short of a lower intensity, excluding full-scale invasions by major powers. However, the document did not provide a clear standard for the role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in line with the immediate objectives. The U.S. stated that it w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with a view to transitioning the role of U.S. Forces, thereby stipul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ilitary power considering that U.S. Forces would withdraw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Of course, this also included the U.S. government's best efforts to encourage other UN member states that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to maintain their military strength.³¹

The U.S. armistice initiative documents did not specify concrete goals for building the ROK Armed Forces. While NSC 154/1 explicitly called for the program to build 20 ground divisions along with adequate naval and air forces as previously pursu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he objectives for the ROK Armed Forces of a unified neutral Korea were not presented in numerical terms. What was clear was that a neutral Korea did not mean a demilitarized country. Yet no appropriate level of military power was explicitly stated. It was understood, though, that if Korea became neutral, it would be unable to conclude a defense treaty with the U.S., and all foreign forces would withdraw, which would make a considerable level of capability necessary. However, since neutral unification was a long-term plan, it may have been difficult to specify concrete levels of capability. Therefore, the security documents defined the ROK Armed Forces' capabilities roughly within a range sufficient to respond to threats other than defending against invasions by major powers within the region.

IV. Conclusion

The U.S. armistice initiative was strictly formulated with focus on China as the primary target. This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generally accepted pattern of armistice management, in which the ROK-U.S. Alliance has maintained stability by deterring North Korean provocations and the UN's supervisory body has restrained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within the Demilitarized Zone. The U.S. focused on applying pressure on China, its actual wartime adversary, to restrain and deter any violations of the armistice. This China-centered perspective of the U.S. was also evident in its neutral unification plan, which assumed that the communists would relinquish control over North Korea. The U.S. considered it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UN combatants in the region to counter China and made efforts to secure as many troops as possible. Since the U.S. perceived China as a key target for deterrence, its plan to mainta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a unified neutral state friendly to the U.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natural outcome. After all, China would welcome the disappearance of a U.S. foothol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mong the U.S. armistice initiatives, the role assigned to the ROK Armed Forces was defined as maintaining internal stability. Since North Korea was assumed to be absent from the peninsula, there was no reason to consider challenges from the North, and instead, a Chinese invasion was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threat. The U.S. government aimed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and ensure that Korea achieved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 integration, but judged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them to provide the capacity to repel a Chinese invasion. The U.S. considered it possible to retaliate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of Korea, but for a more fundamental response, it

³¹ NSC 170, *FRUS, 1952-1954*, Volume XV Korea Part 2, pp. 1600-1604.

considered leveraging the UN's collective security assurance system. This appears similar to the U.S. concept of security assurance for Korea before the Korean War.

The armisti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ultimately resulted in an order based on divided Korea, which the U.S. had considered as another possible scenario. To prevent reinvasion from the communist side, the U.S. maintained UN Forces and fostered the growth of the ROK Armed Forces. Contrary to U.S. concern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did not undertake independent military action to achieve unification after political negotiations failed. In the end, the armisti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ook shape in a form driven by the reality that the U.S. had come to realize.

朝鮮戦争と日本外務省の認識－休戦の影響を中心に
한국전쟁과 일본 외무성의 인식－휴전의 영향 중심으로

The Korea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ercep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Armistice

발표 | 나가사와 유코(와세다대학교)

토론 | 김유석(전쟁기념사업회)

「朝鮮戦争と日本外務省の認識—休戦の影響を中心に」

長澤裕子

(ソウル大学校アジア研究所、訪問学者フェロー

早稲田大学国際和解学研究所、招聘研究員)

1. 序論：問題意識・先行研究

朝鮮戦争の休戦から今年で72年を迎えた。1950年6月25日に勃発した朝鮮戦争の休戦(1953年7月)とは、1953年7月27日の休戦協定による戦闘停止を意味する。これは周知の通り、戦争の「終結」ではなく「休戦」にすぎず、朝鮮半島の緊張状態はその後も続いている。一方で、日本がこの休戦により、米軍の駐留と対共産圏への戦略的立場を改めて意識せざるをえなくなったことは研究で重要視されていない。特に、朝鮮戦争の休戦と日本に関する一次資料の発掘と資料に基づく研究は進んでいない。

先行研究では、日本の役割分析は、戦争特需や後方支援基地としての機能が主たるテーマとして限定されてきたが、本発表は日本外務省外交文書(MOFAアーカイブ)を中心に、発表者が新たに発掘調査した朝鮮戦争の休戦交渉に関する日本外務省の史料と外務省の認識や外交的関与を紹介する。特に、1950年代初頭の外務省文書を新たに調査し、当時の外務大臣や国連大使、米国大使をはじめ各国大使が、駐日米国大使館や国連外交当局と連携しつつ、朝鮮戦争の休戦に対する日本外交の議論の実態を示したい。日本は国連未加盟で休戦協定にも正式には関与できなかったが、外交的手段を駆使し物資供与や行政調整を行うことで「再国際化」を図った。

朝鮮戦争と日本に関して、外交史料を分析したものはあまり多くないが、先行研究の主な論点は4つの側面から整理できる。

1) 戦争特需と経済復興：朝鮮戦争は日本の戦後復興において転機となり、米国による軍需物資の調達によって「朝鮮特需」が生じ、日本経済は本格的な成長軌道に入った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る。これは日本の高度経済成長の原点と位置づけ、日本の高等学校の教科書にも掲載されるほど通論となっている。同じ文脈の中で、2) 1965年の日韓国交正常化交渉の多くの研究は、日本の対韓経済協力構想と植民地責任の回避について、冷戦下の反共同盟としての再編を強調している。合わせて3) 南北分断と在日朝鮮人社会の政治的影響について、朝鮮戦争が在日朝鮮人社会の分断を指摘した研究もある。鄭榮桓(2017)、南基正(2023)は、戦争を契機に在日コリアン社会が「北」と「南」に政治的・イデオロギー的に分裂し、日本国内の治安政策・監視体制と密接に連動し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これらは、在日朝鮮人の「敵視」と排除の論理が、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再構築と交差した点を指摘した。

4) 朝鮮戦争を通じて日本が米国の「極東戦略」の一環として再編成され、安保体制と経済的従属が制度化された対米依存体制が強化された冷戦構造を重視している。日本の再軍備や経済復興、日米関係の強化としての分析(赤木, 2011, 2013)、後方支援基地・兵站拠点として基地国家としての役割(南, 2016, 2023)、日本人の参戦や反戦運動までをひとつの流れで捉えた(鄭, 2010)、他国との比較の中で日本人の参戦を分析した研究(テッサ, 2015)がある。テッサは、日本は公式な意味では軍事的な参戦国ではないがとしながらも、基地国

家や日本人の船員など戦争に動員され死亡者を強調するだけでは十分でないと、日本が実質的に戦争の暴力に関連した国として主張している (Tessa 2015, 8)。吉田茂内閣が対日講和条約を有利な条件で早期に締結しようと、掃海隊や LST (戦車揚陸艦) の派遣をした結果 (大沼、2006)、開戦から半年の間、労働者を中心とした日本の「参戦」規模は 16 の戦争参戦国のうち上位 6 位となった (南 2023b, 108-109)。他方で、テッサが主張する朝鮮戦争への日本の積極性・責任論は、垂直的な日米関係の中で日本が命じられて応じた側面やなによりも米ソ冷戦の側面を軽視しているという批判もある (木宮, 2015)。朝鮮戦争と日本の関与が日本の学会で主たるテーマとして論じられた背景には、2015 年 5 月 15 日、安保法制が衆議院に提出され、日本政府が集団的自衛権に関して従来の憲法解釈を変更したことが関係していた。同時期、韓国では国会議員と首相が朝鮮半島有事における在韓邦人に対する自衛隊の韓国入国要請に応じるという発言から、政府批判が加熱した。2015 年 10 月の日韓防衛相電話会談、中谷防衛相の 4 年 9 ヶ月ぶりの訪韓によって、自衛隊の活動が専守防衛の原則を堅持する点を確認せざるをえなかった (松浦, 2019)。

昨今、朝鮮戦争の休戦体制に関する議論は、日本の朝鮮半島研究や国会議論においてさらに熱を帯びている。朝鮮戦争勃発から 70 周年の 2023 年、朝鮮戦争の専門家小此木政夫は、1949 年の韓国からの米軍撤退について、米国の対韓関与がむしろ拡大するきっかけになったと強調した (小此木, 2023)。1953 年 7 月の休戦協定の成立も、1957 年 7 月に朝鮮国連軍司令部がソウルへの移転にともない朝鮮国連軍後方司令部が日本に設立されることで、むしろ日本の関与が高まったという議論につながっている。日本の国会では、2017 年から 2018 年にかけて、後方司令部の存在が政治議論として具体化した。日本が朝鮮半島の有事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や、在韓邦人の保護の観点からの自衛隊と韓国軍との合同訓練 (国会議事録、2017 年 4 月 25 日) や、2018 年 4 月 27 日の南北首脳会談と板門店宣言を受け、休戦協定から平和協定への移行を念頭に、朝鮮国連軍とその後方司令部の整理が必要だという議論があった (国会議事録, 2018 年 5 月 17 日)。

上記の第 4 の研究と同じ文脈の中で、特に南の最新の研究に着目した。南は、休戦協定の締結の直前の 1953 年 6 月から 7 月にかけて作成された、岡崎勝男外相とジョン・M・アリソン (John M. Allison) 駐日大使との面談報告、そして新木駐米日本大使から岡崎勝男外相宛ての日本外交史料の計 3 文書を新たに紹介して、日本の政治会談への参加意欲と、政治会談の開催が選択肢として消滅し日本の政治会談参加も実現しなかっ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 (南 2023a, 230-231; 南 2023b, 112)。

これに対し、本発表では、こうした日本外務省の休戦体制への積極性について、南が既に発表したに加え、その前後の外交史料についても合わせて分析する。停戦交渉は 1951 年 7 月 10 日に開始していた。特に、1951 年 9 月 8 日に対日講和条約と日米安全保障条約に締結した日本外務省にとって、休戦交渉中の日本外交は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たと言える。特に看過できない点として、国連加盟を目指していた日本と朝鮮戦争の政治解決を試みていた国連との外交だ。1952 年 6 月、日本は国際連合に加盟を申請し 9 月の国連安全保障理事会で 10 対 1 の圧倒的多数の賛成を得たものの、ソ連の拒否権発動により否決された。日本は、1956 年 12 月 18 日に正式に加盟して国際舞台に正式に復帰するまでの期間、一貫して

「平和国家」として国際協調をアピールしていた。上述した朝鮮戦争に対する日本関与を強調すべきでないという、木宮の批判をふまえる場合、従来の研究のように、朝鮮半島の「参戦」だけではなく、休戦に関する日本の姿勢も同時に分析対象に加えることで、日本の思惑を日米外交の枠の中でより具体的に理解できると考える。

結論から先に論じると、日本外交史料の調査分析の結果、日本外務省は対日講和条約の締結と朝鮮戦争の停戦交渉の過程で、日本が政治会談への参加の可能性があると楽観視していた。政治会談の参加と休戦協定締結後の国際舞台への実現に向けて、日本外務省は講和後に吉田茂首相兼外相から外相を引き継いだ岡崎勝男（おかざきかつお）を中心に、新木栄吉（あらきえいきち）米国大使、澤田廉三国連大使、そして芳沢謙吉中国大使が休戦に向けた情報収集・調整を行い、アリソン駐日米国大使や国連のキングスレー（John D. Kingsley）国連韓国再建団（UNKRA: United Nations Korean Reconstruction Agency）総裁と交渉を重ね、日本の主張を反映しようと模索し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った。特に、芳澤中国大使による外交文書は休戦協定締結に対する共産圏の提案をふまえた国際状況の判断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重要な史料だ。芳澤謙吉は、中国公使として1925年日ソ基本条約締結による日ソ国交回復などに関わった人物で、1952年から3年間駐中華民國大使を務めた。辞任後も自由アジア擁護連盟代表、自由アジア協会長として台湾擁護に奔走した人物として彼の休戦交渉中の行動は注目に値する。

本発表の分析時期にあたる1950年代前半の朝鮮半島と日本の関与については、UNKRAも見逃すことはできない項目だ。特に、先行研究では、UNKRAは1950年12月の設立後、休戦協定の締結まで目立った動きがなかったと言われてきた（임다운, 2019, 2020）。それだけに、UNKRAへの日本の関与に関する外交史料を紹介することは意味がある。1951年11月には日本政府への協力要請があり、日本政府は講和条約締結後の初めての国連活動として検討していたことも日本外交資料から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南, 2023）。さらに本発表者が史料調査をした結果、1953年1月には日本政府が外務省だけでなく通産省、厚生省などの関係省庁はもちろん、UNKRA 極東本部、韓国統一復興委員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for the Un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Korea, UNCURK）との調整結果、支援金額と輸送物資のリストを確定した議事録が複数、確認もできた。

しかし、UNKRAへの日本関与に関する史料紹介と分析の結果は、時間上そして紙面上の制約から、本発表には休戦関連の史料紹介とその分析結果に限定し、UNKRAに関する史料分析を含む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韓国再建団を中心とする復興事業と日本の関与に関する発表は、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をきっかけに、朝鮮戦争の休戦や休戦協定締結後の復興事業に関わる日本の外交政策研究に対する関心と共同研究などの機会が広まることを期待して、別の機会に譲りたい。

2. 朝鮮戦争と日本の関与—対日講和の締結前

戦争勃発後、吉田首相は非武装の枠内にとどめて日本の協力を表明したにすぎないことや、識者による義勇軍の参戦議論も報道分析から論じられてきた。田中最高裁長官による「法理論的には日本人が個人として国際義勇軍に参加することは可能」という発言も、最終的にはその内容が訂正された（南, 2023a）しかし、新たに外交史料や国会議事録を分析してみると、対日講和条約の締結前の日本は、形式的には占領下でありながらも、朝鮮戦争を通じて国際政治への再関与を試みて独立国としての主体的な発言権を模索し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日本人の義勇軍参戦については、1950年7月26日、衆議院で憲法第9条と自衛権に関して、義勇軍の合法性について検討が行われた。日本の自衛権が認められる場合、義勇軍が合法的かどうかという議論にも踏みこんでいた。1947年制定の憲法第9条では、戦争と武力の行使を放棄していた。しかし国会では、義勇軍の朝鮮戦争派遣は、法的な解決は不明確であり、講和条約が締結されることで日本の位置づけや義務が明確になるという見解が主流だった（国会議事録、1950年、7月26日）。この国会議論は、田中耕太郎最高裁判所長官が新聞インタビューで、対日講和条約こそが日本の位置付けとともに義勇軍問題の法的基盤であることや、日本が国連との関係性の中で国際的な義務を果たすべきという論理につながった。

講和条約の発効直前の1952年3月、日本外務省は朝鮮戦争の休戦交渉の近況に注意を傾けて文書をまとめたが、同年10月28日には朝鮮休戦が日本に及ぼす影響について具体的に議論を始めていた。1953年1月からは、芳沢中国大使をはじめとする各国大使から日本外務省への外相に集中的に報告されている。

日本の休戦交渉参加意欲と外交戦略については、次のような特徴がある。朝鮮戦争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的関与は、公式な戦闘当事国ではなか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休戦交渉のプロセスに対して一定の「発言権」を模索する動きを含んでいた。特に1951年の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条約を経て主権を回復した日本にとって、朝鮮戦争の終結とその後の秩序形成への関与は、安全保障上の優先課題であった。日本外務省は、朝鮮半島の安定が日本の安全保障と経済再建にとって不可欠であるとの認識のもと、休戦交渉に何らかの形で関与したいという意欲を持っていた。これは、戦後の日本外交が「国際的責任と再統合」を志向する中で、冷戦の最前線にある朝鮮半島への関心を高めていたことと軌を一にする。外務省は非公式な情報収集と分析を通じて、交渉の展開を把握し、日本の立場をいかに米国や韓国に伝達し得るかを模索した。

講和条約締結前後の時期には、日本の一部外交官や知識人の間で、「朝鮮の安定と東アジアの平和のために、日本が何らかの調停的役割を果たすべき」とする意見も散見された。特に1953年の休戦協定に際しては、日本政府内でも将来的な南北対話・平和構築に日本が橋渡しの役割を果たしうるという期待感が存在していた（赤木完爾、2013）。

しかし、実際の日本外交史料によると、東アジアの平和秩序への貢献という名目より、超戦争による特需の減少や国際舞台における発言権を失うことへの焦燥感が如実に現れている。

1953年6月11日 アリソン大使と岡崎外務大臣の面談報告に関する「朝鮮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の政治的関与に関する一史料」の報告文書（番号557号）は、岡崎勝男外務大臣がア

リソン駐日アメリカ大使と行った会談で日本の立場を表明した記録である。岡崎外相は、国連軍および英軍に対して、日本の支援を強調するとともに、朝鮮半島の将来に対して日本が「多大な関心」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を表明した。朝鮮半島の将来を決定する政治会談に、日本が何らかの形で参加すべきだとする立場を主張していた。しかし、米国側の反応は日本の関与を認めていない。アリソン大使は、当面の会議参加国は「朝鮮において現実に主要な関与を持つ国々」に限定されるとの見解を示した。6月29日には、ジョンソン国務次官補代理とも接触しており、日本外務省は政治会談への参加を米国を通じて実現を図ろうとしていた。同時に、1953年6月18日にはニューヨーク駐在の澤田廉三国連大使が韓国問題に関する政治会談に対する日本の態度を問うインド大使に対して、軍事的議題については発言権がないことを認めながらも、政治情勢に関わる議題になれば日本も参加を認め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認識を示した（南 2023b, 112）。

6月30日新木大使から岡崎外相宛て文書では、日本が国連軍に多大の協力をし、軍事施設を提供してきたこと、そして鮮の将来の運命に関しては、多大の関心を有していることを再びアリソン大使に告げ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停戦直前の7月23日、ワシントンの新木栄吉駐米大使はロバートソン国務次官補との会見の中で、極東全般の問題を討議する過程で日米間の協力の必要性について共感が形成されたとして、次のように報告している。ロバートソン国務次官補が新木大使に対して、「今後の政治会談などについては未だ具体的には何も決まっていないが、少数の関係国のみで交渉を行うことと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極東全般の問題が討議されるが如き場合は、当然日本にも協議することとなろう」と伝えたのに対して、新木大使は「朝鮮問題は日本として密接な関係を有するので、今後の〔事態〕の発展に付、インフォームされたい」と答えた。

日本外務省は休戦協定の締結の前後で、アメリカの著名な政治評論家ウォルター・リップマン（Walter Lippmann, 1889-1974）が新聞に発表した論説の発言に注目していた。リップマンは、20世紀アメリカを代表する政治評論家、ジャーナリスト、外交思想家で冷戦初期の国際秩序に関する深い洞察で知られ、現代の「オピニオンリーダー」の原型とも言える存在だった。

アメリカの政治評論家ウォルター・リップマン（Walter Lippmann）の朝鮮戦争と日本の寄与を強調する外交的見解に注目していた。リップマンは戦後アメリカの代表的なリアリズム思想家であり、現実主義的外交の観点から、国務長官ジョン・フォスター・ダレス（John Foster Dulles）の強硬な反共外交路線に対し、アメリカが東アジアにおいて軍事的・道徳的義務に過度に縛られることの危険性に対して警告した。

日本外交資料からは、リップマンのダレス批判は、日本外務省だけでなく英国議会も賛同し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1953年7月29日に駐米日本大使館から岡崎外相に宛てられた「リップマン論文に関する件」では、リップマンが永続的に朝鮮半島を解決する際に、南北韓と中国および米国だけでは決定できないこと、特に、日本とソ連が関与する必要性が強調されている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た。リップマンは、朝鮮半島の人々も、米国と国連による解決は安全・安定を保証し得ないと考えていること、周辺諸国の強大国ソ連と特に主権を回復した日本からの保証を必要と感じるはずだとまとめている。これに対する駐米日本大使館の詳しい

対応策などの提示は示されていない。この時期、日本外務省としては、日本の関与に有利な論調を集め、日本外務省の主張を後押ししてくれる国際世論の形成に神経を尖らせ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

特にリップマンは、朝鮮戦争中の日本の役割が単なる後方支援基地にとどまらず、地域的外交の主体として再評価されるべきだと主張したことから、日本外務省の主張の強力な後見者と考え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日本が1956年に国連加盟を果たす以前からの再国際化に向けた重要な知的支援であり、戦後日本外交の立ち位置に関する再考を促すものであった。こうしたリップマンの1953年における論調は、当時の国際情勢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立ち位置を見直す視座を提供するとともに、日本外交史の再評価において重要な手がかりを与えている。

3. 休戦協定の締結後

停戦協定が締結された7月27日から二日後の7月29日、『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ズ』は、韓国問題をめぐる政治会議に参加することを希望する日本政府の動きを伝えた。この報道に対する対応をめぐって澤田国連大使が外務省と交信して、休戦協定締結後もなお、日本の関与を求めて国連外交を展開していた様子がわかる。

「1953年8月10日付の外務大臣から駐米大使への極秘電報：日本と朝鮮の政治会談について」には、日本外交の転換点として、日本が自国の将来に対する「強い不安」を抱いている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特に、日本は韓国の復興について、戦争特需の減少という経済の悪影響を和らげることに大きな関心を寄せ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日本の将来に対する強い不安」と「朝鮮復興への関心」が結びついており、日本の国際的再登場への意図が示されている。日本は国連非加盟であり、武装解除されたまま国際政治の議論に加われない現実、「何をすればよいのか」という記述に日本の外交的無力感が示されている。

休戦から2日後、自民党は中国との貿易促進を決定した。朝鮮戦争が2年間にわたり継続することを見越して、日本政府は朝鮮の政治会談に対して次のような希望を持っていた。

- 1) 中国共産党の参加を望むこと
- 2) 日本を含む自由主義国が朝鮮復興に参加すること
- 3) 共産圏の国々に対しても、自由主義陣営が協力して対処すること

こうした点は将来的な朝鮮半島と国際社会との関係性にとって重要な要素であるとして、休戦協定の締結後もなお日本の関与の余地を広げる方向性として共産圏との外交を模索していた。なぜなら、戦後日本の不安感として、対日講和条約の締結により、日本は主権を回復したものの、経済復興や安全保障の面で依然として不安が残っていたからである。朝鮮戦争の影響については、休戦がもたらす影響として、日本経済に悪影響が及ばないよう強く望んでいた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外交姿勢としては、中国との関係改善、そして朝鮮半島の復興支援に自由主義陣営の一員として関わりたいという意志があった。将来を見据えた交渉参加の意欲もあり、共産主義圏への対抗を含め、国際政治に主体的に関わろうという姿勢が見える。史料の主なポイントを整理すると、日本が武装解除されたまま「国際政治の議論から外されていること」への不満に加え、そうした状況下でも日本が国連を全面的に支持し続けて

いることの正当性を主張している。特に、日本が米国の「民主主義の兵器庫」としての役割を負わされつつ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る。

こうした実際の負担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が国連における破局（戦争や国際危機）に関する討議にすら参加できないというのなら、いったい何をすればいいというのかと、日本は訴えている。なぜなら日本は、敗戦後に武装解除されて対外的に軍事的な危険にさらされながらも、国連の支援を全面的に信じてきた揺るぎない姿勢は、日本人の信念であると主張している。

こうした史料群の中で、注意すべき点は、「兵器庫」という日本外務省の認識である。これは米国が第二次世界大戦後、日本を再軍備させずに西側陣営の生産・支援拠点にしようとした構想を日本が批判的にとらえた表現と言える。これは、米国への依存とジレンマを示している。日本外務省は「民主主義の兵器庫」として米国に依存していたが、同時に国連などの国際舞台での発言権が制限されている現実には不満を抱えていた。武装解除された日本が、なお国連の支持を貫いた姿勢は「平和外交としての信念」や「東洋の平静回復」への貢献として理想主義的な理念による外交ではない。

駐日米軍や国連軍の何よりも、東洋の平静回復を前端的に主張して、朝鮮戦争後のアジアの安定化を示唆し、「兵器庫」としての日本の負担とすれに見合う日本の発言権を強化する目的があった。

1953年8月25日の澤田国連大使が岡崎外相に宛てた「再開国連総会第一週の概況に関する件」では、日本の政治会議参加問題に関する議論が国連総会で主題となったことを「成功」として評価している。こうした結果について澤田大使は、日本外交の成果としてではなく、共産圏が朝鮮の停戦後の政治会議の議題について、具体的な案件を示さなかったために、会議そのものが政治会議の構成国の問題に限定されたにすぎないと分析していた。国連総会の空転そのものが、日本が朝鮮戦争の停戦後の秩序構築の構成国として加わる余地を広げていると外務省が楽観視し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

外務書は、同時期の米国新聞などの論調にも過敏に反応していた。1953年8月には停戦協定締結後、日本が朝鮮半島の停戦体制の秩序構築に関与しようという姿勢が公になっていた。たとえば、8月28日の岡崎外相宛ての新木米国大使からの報告「朝鮮平和会議と日本の態度」が参考になる。この文書では、8月27日付けの新聞「クリスチャン・サイエンス・モニター」で特電として、日本が停戦後の政治会議への出席を強力に推進できる立場ではないものの、停戦後もなお極東問題の解決を目的とするすべての会議に日本の代表を出す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意見に変化がないと掲載されことを報告している。

この他に、同時期、日本外務省が政治会議の構成問題を単なる日本の関心事ではなく、国際世論として一般の関心をひいているとみなしていた史料として、英国大使からの報告などがある（1953年8月24日、松本大使より岡崎大臣宛て「政治会議の構成問題に対する新聞論調の件」など）。しかしながら、締め切り直前に発表者の韓国赴任ほか個人的な都合が重なり、能力が足りず期限内に原稿を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多くの主催、関係者の皆様にお詫び申し上げ、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の討論を基盤として、研究を補完したい。

朝鮮戦争の停戦協定を締結する過程の日本外交に関する分析は、日本の主権回復や日米関

係を軸に、冷戦下の朝鮮半島分断と復興の再評価につながるものである。本研究は現在も続く朝鮮半島の休戦体制に関する隣接研究との共同プロジェクトの基礎研究として、今後活発に活用されることが期待したい。

参考文献

【一次資料】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第1卷 (外交文書原文)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第3卷 (外交文書原文)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政治會議關係』 (外交文書原文)

・国会議事録

第8回国会 衆議院 外務委員会 第4号、1950年7月26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00803968X00419500726¤t=42>

第193回国会 参議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15号 2017年4月25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9313950X01520170425&spkNum=10¤t=16>

第196回国会 参議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15号 2018年5月17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9613950X01520180517&spkNum=127¤t=2>

【書籍・論文・その他】

・書籍

남기정 2016, 기지국가의 탄생-일본이 치른 한국전쟁, 서울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大沼久雄 2006 『朝鮮戦争と日本』新幹社.

南基正 2023a 『基地国家の誕生- 朝鮮戦争と日本・アメリカ』東京堂出版.

・論文

정병욱 (2010), 일본인의 경험한 한국전쟁-참전에서 반전까지, 역사비평 91, 2010 여름호, 212 - 231.

임다은(2019), 유엔한국재건단 (UNKRA)의 조직과 활동, 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국사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

임다은(2020), 유엔한국재건단 (UNKRA)의 조직과 활동, 서울대학교 국사학과, 한국사론, 66 권, 201-260.

Akagi Kanji (2011), "The Korean War and Japan"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24, No.1, pp. 175-184.

Tessa Morris-Suzuki (2015), "Japan and the Korean War 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아시아政経学会編 『アジア研究』 Vol.61, No.2, pp. 3-14.

赤木完爾(2013)「朝鮮戦争—日本への衝撃と余波—」『戦史特集 朝鮮戦争と日本（防衛研究所）』 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mh_tokushu/pdf/mh001_03.pdf

小此木政夫(2023)「朝鮮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休戦七〇年の視点から」日本外務省 『外交』 Vol. 80, 2023年8月号、138-143.

木宮正史 (2016) 「【特集：朝鮮戦争と日本】日本にとって朝鮮戦争とは—歴史の再解釈と、その現代的含意」アジア政経学会編『アジア研究』 Vol.61, No.2, pp. 20-29.

鄭栄桓(2017)「在日朝鮮人の「国籍」と朝鮮戦争（1947-1952年） — 「朝鮮籍」はいかにして生まれたか」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平和研究所『プライム』 40巻, pp. 36-62.

南基正(2023b)「東アジア停戦体制と日本の位置—日本が戦った朝鮮戦争を手掛かりに」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冷戦期の日本の安全保障と朝鮮半島』防衛研究所. https://www.nids.mod.go.jp/event/proceedings/forum/pdf/2023/JP_05_nam.pdf

松浦正伸(2019)「朝鮮半島有事における在韓邦人非戦闘員退避活動（NEO）に関する政策的研究」国際安全保障学会編『国際安全保障』第47巻第3号, pp. 92-109.

한국전쟁과 일본 외무성의 인식 — 휴전의 영향 중심으로

나가사와 유코(長澤裕子)

(서울대학교 아시아연구소 방문연구원)

와세다대학교 국제화해학연구소 초빙연구원)

1. 서론: 문제의식 및 선행연구

올해로 한국전쟁(6.25 전쟁)의 휴전이 이루어진 지 72 년이 되었다. 1950 년 6 월 25 일 에 발발한 한국전쟁의 휴전(1953 년 7 월)은 1953 년 7 월 27 일의 휴전협정에 따른 전투 중단을 의미한다. 이는 잘 알려진 바와 같이 전쟁의 “종결”이 아닌 “휴전”에 불과하며, 한반도의 긴장상태는 이후로도 계속되어 왔다. 일본은 이 휴전을 계기로 미군 주둔과 공산 권에 대한 전략적 입지를 다시금 인식하지 않을 수 없었지만, 이에 대한 연구는 충분히 이루어지지 않았다. 특히, 한국전쟁의 휴전과 일본에 관한 일차 사료의 발굴과 자료에 기반한 연구는 아직도 미진한 실정이다.

선행연구는 일본의 역할 분석이 전쟁특수나 후방지원 기지로서의 기능에 한정해서 다루어 왔다. 하지만 본 발표는 일본 외무성 외교문서(MOFA 아카이브)를 중심으로, 발표자가 새롭게 발굴 및 조사한 한국전쟁 휴전 협상과 관련된 일본 외무성 사료를 통해 외무성의 인식 및 외교적 관여를 소개하고자 한다. 특히 1950 년대 초반의 외무성 문서를 새롭게 조사하여, 당시 외무대신과 유엔대사, 미국대사 등을 비롯한 각국 대사가 주일 미국 대사관과 유엔 외교당국과 연계하여 한국전쟁의 휴전에 대해 일본 외교 내에서 어떤 논의가 이루어졌는지를 밝히고자 한다. 일본은 유엔 비회원국이라 정식으로 휴전협정에 참여할 수 없었지만, 외교적 수단을 동원해 물자지원과 행정조정 등을 통해 “재국제화(再國際化)”를 추구했다.

한국전쟁과 일본에 관한 외교 사료를 분석한 연구는 많지 않지만, 기존 연구의 주요 논점은 네 가지 측면으로 정리할 수 있다.

1) 전쟁특수와 경제부흥: 한국전쟁은 일본의 전후 부흥에 전환점이 되었으며, 미국으로부터의 군수물자 조달로 “한국 특수”가 발생해 일본경제가 본격적인 성장궤도에 올랐다는 점을 강조하고 있다. 이는 일본 고도경제성장의 출발점으로 여겨지며, 일본의 고등학교 교과서에도 수록될 정도로 통설로 자리 잡았다. 같은 맥락에서, 2) 1965 년 한일 국교 정상화 협상에 대한 많은 연구는 일본의 대한 경제협력 구상과 식민지 책임 회피를 강조하며, 냉전 하의 반공동맹 재편을 강조한다. 또한 3) 남북 분단과 재일조선인 사회의 정치적 영향과 관련하여, 한국전쟁이 재일조선인 사회의 분열을 초래했음을 지적한 연구도 있다. 정영환(鄭榮桓, 2017), 남기정(南基正, 2023)은 그 전쟁을 계기로 재일 한국인 사회가 “남”과 “북”으로 정치적으로, 이념적으로 분열되었으며, 이는 일본 국내 치안정책과 감

시체제와 밀접하게 연동되었음을 밝혔다. 이들 연구는 재일조선인을 향한 “적대시”와 배제의 논리가 전후 일본의 내셔널리즘 재구축과 교차하였다고 지적했다. 4) 한국전쟁을 통해 일본은 미국의 “극동전략”의 일환으로 재편되어, 안보체제와 경제적 종속이 제도화되면서 대미 의존 체제가 강화된 냉전구조가 중시되고 있다. 일본의 재군비와 경제부흥, 미일관계의 강화 측면을 분석한 연구(아카기(赤木), 2011, 2013), 후방 지원 기지 및 병참 거점으로서의 기지 국가 역할을 다룬 연구(남기정, 2016, 2023), 일본인의 참전과 반전운동까지 하나의 흐름으로 포괄한 연구(정영환, 2010), 그리고 다른 국가들과 비교하여 일본인의 참전을 분석한 연구(테사(テッサ), 2015) 등이 있다. 테사는 일본이 공식적으로는 군사적 참전국이 아니라고 전제하면서도, 기지 국가나 일본인 선원 등 전쟁에 동원되어 사망한 점을 강조하는 것만으로는 충분하지 않다고 지적하며, 일본이 실질적으로 전쟁의 폭력에 연관된 국가라고 주장하고 있다(Tessa 2015, 8). 요시다 시게루(吉田茂) 내각이 대일 강화 조약을 유리한 조건으로 조기에 체결하고자 기뢰제거부대(소해대)와 LST(전차 상륙함)를 파견하였다(오누마(大沼), 2006). 그 결과 전쟁 발발 후 6개월 동안 노동자를 중심으로 한 일본의 “참전” 규모는 16 개 전쟁 참전국 중 상위 6 위에 달했다(남기정, 2023b, 108-109). 반면, 테사가 주장하는 한국전쟁에 대한 일본의 적극성과 책임론은 수직적인 미일 관계 속에서 일본이 명령에 따라 응한 측면이나, 무엇보다도 미소 냉전의 측면을 경시한다는 비판도 있다(키미야(木宮), 2015). 한국전쟁과 일본의 관여가 일본 학계에서 주요 주제로 논의된 배경에는, 2015년 5월 15일 안보 법안이 중의원에 제출되고 일본정부가 집단적 자위권에 대한 기존 헌법해석을 변경한 것과 관련되어 있었다. 같은 시기에 한국에서는 국회의원과 총리가 한반도 유사시 재한 일본인의 보호를 위해 자위대의 한국 입국 요청에 응할 수 있다는 발언을 하여 정부 비판이 격화되었다. 2015년 10월 한일 국방장관 전화회담과 나카타니(中谷) 방위상의 4년 9개월 만의 방한을 계기로, 자위대의 활동이 전수방위(專守防衛) 원칙¹을 준수한다는 점을 확인하지 않을 수 없었다(마쓰우라(松浦), 2019).

최근에는 한국전쟁의 정전체제에 대한 논의가 일본 내 한반도 연구 및 국회 차원의 논의에서도 한층 더 활발해지고 있다. 한국전쟁 발발 70주년인 2023년, 한국전쟁 전문가 오코노기 마사오(小此木政夫)는 1949년 한국에서의 미군 철수와 관련하여, 오히려 그것이 미국의 한반도 관여가 확대되는 계기가 되었다고 강조했다(오코노기, 2023). 또한 1953년 7월 휴전협정 체결 이후 1957년 7월 한국 유엔군 사령부가 서울로 이전함에 따라 한국 유엔군 후방사령부가 일본에 설립되면서 오히려 일본의 관여가 강화되었다는 논쟁으로 이어지고 있다. 일본 국회에서는 2017년부터 2018년에 걸쳐 후방사령부의 존재가 정치적 쟁점으로 구체화되었다. 일본이 한반도 위기 상황에 휘말릴 가능성이거나, 재한 일본인 보호 차원에서 자위대와 한국군 간의 합동훈련(국회회의록, 2017년 4월 25일) 등

¹ 역자주: 전수방위원칙: 일본이 타국을 선제 공격하지 않고 오로지 자국 방어에만 전념한다는 안보 원칙

이 논의되었으며, 2018년 4월 27일 남북 정상회담과 판문점 선언을 계기로, 휴전협정에서 평화협정으로의 전환을 염두에 두고, 한국 유엔군과 그 후방사령부의 정리²가 필요하다는 논의가 있었다(국회회의록, 2018년 5월 17일).

위의 네 번째 연구와 동일한 맥락에서, 특히 남기정의 최신 연구에 주목했다. 남기정은 휴전협정 체결 직전인 1953년 6월부터 7월에 작성된 오카자키 카츠오(岡崎勝男) 외무상과 존 M. 앨리슨(John M. Allison) 주일 미국대사 간의 면담 보고서, 그리고 아라키(新木) 주미 일본대사가 오카자키 카츠오 외무상에게 보낸 일본 외교 사료 등 총 3개의 문서를 새롭게 소개하며, 일본이 정치회담에 참여하고자 했던 의지와, 결과적으로 정치회담 개최라는 선택지가 사라져 일본의 정치회담 참여 역시 실현되지 못했음을 밝혀냈다(남 2023a, 230-231; 남 2023b, 112).

이에 대해 본 발표에서는, 이러한 일본 외무성의 정전체제에 대한 적극성에 대해 남기정이 이미 발표한 내용 외에도, 그 전후의 외교 사료에 대해서도 함께 분석한다. 휴전 협상은 1951년 7월 10일에 시작되었다. 특히 1951년 9월 8일에 대일 강화조약과 미일 안보조약을 체결한 일본 외무성에게 있어, 휴전 협상 중의 일본 외교는 큰 전환기를 맞이했다고 볼 수 있다. 특히 주목해야 할 점은, 유엔 가입을 목표로 했던 일본과, 한국전쟁의 정치적 해결을 모색하던 유엔 간의 외교이다. 1952년 6월, 일본은 유엔 가입을 신청해서 9월 유엔 안전보장이사회에서 10 대 1의 압도적 다수 찬성을 얻었으나, 소련의 거부권 행사로 인해 부결되었다. 일본은 1956년 12월 18일 공식적으로 유엔에 가입해 국제무대에 복귀할 때까지 일관되게 “평화국가”로서 국제 협력을 강조했다. 상기 언급된 한국전쟁에 대한 일본의 관여를 강조³해서는 안 된다는 키미야의 비판을 감안하면, 기존 연구처럼 한반도에 대한 일본의 “참전”뿐만 아니라 휴전과 관련된 일본의 태도도 동시에 분석 대상으로 삼는 것이, 일본의 입장을 미일 외교의 틀 내에서 보다 구체적으로 이해하는 데 도움이 될 것이라 판단된다.

결론부터 말하자면, 일본 외교사료의 조사분석 결과, 일본 외무성은 대일 강화조약 체결과 한국전쟁의 휴전 협상 과정에서 일본의 정치회담 참여 가능성을 낙관적으로 전망하고 있었다. 정치회담 참여와 휴전협정 체결 후 국제무대에의 (복귀)실현을 위해, 일본 외무성은 강화조약 체결 후 요시다 시게루(吉田茂) 총리 겸 외무대신으로부터 외무대신을 승계한 오카자키 카츠오(岡崎勝男)를 중심으로, 아라키 에이키치(新木栄吉) 주미대사, 사와다 렌조(澤田廉三) 유엔대사, 그리고 요시자와 켄키치(芳澤謙吉) 주중대사가 휴전 관련 정보 수집과 조율을 진행했다. 이들은 앨리슨 주일 미국대사나 킹슬리(John D. Kingsley) 유엔한국재건단(UNKRA: United Nations Korean Reconstruction Agency) 총재와 협상을 거듭하며 일본의 입장을 반영하려는 노력을 기울였다. 특히, 요시자와 주중대사의 외교 문

² 역자주: 본 문장에서 맥락상의 “정리”는 다소 모호하나, 재검토, ‘조정’, ‘재구성’, ‘존재의 재평가’ 등으로 해석될 수 있음

³ 역자주: 미일 관계나 미소 냉전이라는 맥락을 간과하여 강조

서는 휴전협정 체결에 대한 공산권 제안에 기반한 국제 정세 판단을 알 수 있는 중요한 사료이다. 요시자와 켄키치는 중국공사로 1925년 러일 기본조약 체결을 통해 러일 국교 회복 등에 관여한 인물로, 1952년부터 3년간 주중 일본대사를 역임했다. 사임 후에도 자유아시아옹호연맹 대표, 자유아시아협회 회장으로 활동하며 대만 옹호에 힘썼다. 그의 휴전 협상 중 활동은 주목할 만하다.

본 발표의 분석 시기에 해당하는 1950년대 초반 한반도(정세)와 일본의 관여를 논함에 있어 유엔한국재건단(UNKRA)도 간과할 수 없다. 특히 선행연구에서는 UNKRA가 1950년 12월 설립 후 휴전협정 체결까지 두드러진 활동이 없었다고 평가되어 왔다(임다은, 2019, 2020). 따라서 UNKRA에 대한 일본의 관여와 관련된 외교사료를 소개하는 것은 의미가 있다. 1951년 11월에는 일본정부에 협력 요청이 있었으며, 일본정부가 강화조약 체결 후 첫 번째 유엔 활동으로 검토 중이었다는 사실도 일본 외교사료에서 명확히 드러나고 있다(남기정, 2023). 또한 본 발표자가 사료 조사를 통해 확인한 결과, 1953년 1월 일본정부가 외무성뿐 아니라 통상산업성, 후생성 등 관련 부처는 물론, UNKRA 극동본부, 유엔한국통일부흥위원회(UNCURK: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for the Un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Korea)와의 조율을 거쳐 지원금액 및 수송물자 목록을 확정된 회의록이 다수 확인되었다.

그러나 UNKRA에 대한 일본의 관여와 관련된 사료 소개 및 분석 결과는 시간적, 공간적 제약으로 인해 본 발표에서는 휴전 관련 사료 소개와 그 분석 결과에 한정했으며, UNKRA에 대한 사료 분석을 포함하지 못했다. 한국재건단을 중심으로 한 복구사업과 일본의 관여에 대한 발표는, 이번 심포지엄을 계기로 한국전쟁의 휴전이나 휴전협정 체결 후 재건사업과 관련된 일본의 외교정책 연구에 대한 관심과 공동연구 등의 기회가 확대되기를 기대하며, 다른 기회로 미루고자 한다.

2. 한국전쟁과 일본의 관여 — 대일 강화조약 체결 전

전쟁 발발 후, 요시다 총리는 비무장 범위 내에서 일본의 협력을 표명했을 뿐이며, 전문가들의 의용군(義勇軍) 참전 논의가 (언론)보도 분석을 통해 논의되어 왔다. 다나카(田中) 대법원장의 “법 이론적으로는 일본인이 개인 자격으로 국제의용군에 참여하는 것은 가능하다”는 발언을 한 바 있으나, 해당 발언은 결국 이 수정되었다(남기정, 2023a). 그러나 새로운 외교사료와 국회회의록을 분석해 보면, 대일 강화조약 체결 이전의 일본은 형식적으로는 점령 하에 있었지만, 한국전쟁을 통해 국제정치에 재개입을 시도하며 독립국가로서의 주체적인 발언권을 모색하고 있었다는 점이 드러난다. 일본인의 의용군 참전에 대해 1950년 7월 26일, 중의원에서는 헌법 제9조와 자위권과 관련하여 의용군의 합법성을 검토했다. 일본의 자위권이 인정될 경우, 의용군이 합법적인지 여부에 대한 논의로까지 확장되었다. 1947년 제정된 일본헌법 제9조는 전쟁과 무력행사를 포기하고 있었다.

그러나 국회에서는 한국전쟁에의 의용군 파병에 대해 법적으로 명확한 결론은 없으며, 강화조약이 체결됨으로써 일본의 (국제적) 지위와 의무가 명확해질 것이라는 견해가 주류를 이뤘다(국회회의록, 1950년 7월 26일). 이 국회 논의는 다나카 코타로 대법원장이 신문 인터뷰에서, 대일 강화조약이야말로 일본의 (국제적) 지위와 함께 의용군 문제의 법적 기반이 되며, 일본이 유엔과의 관계 속에서 국제적 의무를 이행해야 한다는 논리를 전개했다.

강화조약 발효 직전인 1952년 3월, 일본 외무성은 한국전쟁의 휴전협상과 관련된 최근 동향에 주목하며 관련 문서를 정리하였다. 같은 해 10월 28일에는 한국 휴전이 일본에 미치는 영향에 대해 구체적으로 논의하기 시작했다. 1953년 1월부터는 요시자와 주중대사를 비롯한 각국 (주재 일본) 대사들이 일본 외무성의 외무대신에게 집중적으로 보고를 시작했다.

일본의 휴전 협상 참여의지와 외교전략에는 다음과 같은 특징이 있다. 한국전쟁에서 일본은 공식적인 전투 당사국이 아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휴전 협상 과정에서 일정한 “발언권”을 모색하는 움직임을 보였다. 특히 1951년 샌프란시스코 강화조약을 통해 주권을 회복한 일본에게 있어, 한국전쟁의 종결과 그 이후의 질서 형성에 참여하는 것은 안보상의 우선 과제였다. 일본 외무성은 한반도의 안정이 일본의 안보와 경제 재건에 필수적이라는 인식 하에, 휴전 협상에 어떤 형태로든 참여하려는 의지를 가지고 있었다. 이는 전후 일본 외교가 “국제적 책임과 재통합”을 지향하는 과정에서, 냉전의 최전선인 한반도에 대한 관심이 고조되고 있었던 것과 맥을 같이 한다. 외무성은 비공식적인 정보 수집 및 분석을 통해 협상 진행 상황을 파악하고, 일본의 입장을 미국과 한국에 어떻게 전달할 수 있을지 모색했다.

강화조약 체결 전후 시기에는, 일본 일부 외교관과 지식인들 사이에서 “한반도의 안정과 동아시아의 평화를 위해 일본이 어떤 형태로든 중재적 역할을 맡아야 한다”는 의견도 간간히 제기되었다. 특히 1953년 휴전협정 당시에는 일본정부 내에서도 향후 남북 대화와 평화 구축에 있어 일본이 중재적 역할을 할 수 있다는 기대감이 존재했다(아카기 칸지(赤木完爾), 2013).

그러나 실제 일본 외교사료에 따르면, 동아시아의 평화 질서 기여라는 명분보다, 전쟁 특수 감소나 국제무대에서 발언권을 상실할 수 있다는 조바심이 보다 뚜렷하게 드러나고 있다.

1953년 6월 11일 엘리슨 주일 미국대사와 오카자키 외무대신의 면담 내용을 다룬 “한국전쟁기에 있어서 일본의 정치적 관여에 관한 한 사료” 보고서(문서번호 557호)는, 오카자키 외무대신이 엘리슨 주일 미국대사와의 회담에서 일본의 입장을 밝힌 기록이다. 오카자키 외무대신은 유엔군 및 영국군에 대한 일본의 지원을 강조함과 동시에, 한반도 미래에 대해 일본이 “지대한 관심”을 가지고 있음을 밝혔다. 그는 또한, 한반도의 미래를

결정하는 정치회담에 일본이 어떤 형태로든 참여해야 한다는 입장을 주장했다. 그러나 미국 측의 반응은 일본의 관여를 인정하지 않는다는 것이었다. 앨리슨 대사는 당면한 회담 참가국은 “한반도에서 현실적으로 주요한 관여를 하고 있는 국가들”로 한정된다는 견해를 밝혔다. 6월 29일에는 존슨 국무부 차관보 대리와의 접촉이 있었으며, 일본 외무성은 정치회담 참가를 미국을 통해 실현하려고 시도했다. 동시에, 1953년 6월 18일 뉴욕 주재 일본의 유엔대표부 대사 사와다 렌조(澤田廉三)는 한국문제 관련 정치회담에 대한 일본의 태도를 묻는 인도대사에게 군사적 의제에 대해서는 발언권이 없음을 인정하면서도, 정치적 사안과 관련된 의제가 되면 일본도 참여를 인정받아야 한다는 인식을 드러냈다(남기정 2023b, 112).

6월 30일 아라키 대사는 오카자키 외무대신에게 보낸 문서에서 일본이 유엔군에 크게 협력했으며 군사시설을 제공해 왔다는 점, 그리고 한반도의 미래 운명에 대해 큰 관심을 가지고 있다는 점을 다시 한 번 앨리슨 대사에게 전달했음을 나타내고 있다.

휴전 직전인 7월 23일, 워싱턴의 아라키 에이기치(新木栄吉) 주미 일본대사는 로버트슨 국무부 차관보와의 회담에서 극동지역 전반의 문제를 논의하는 과정에서 미일 간 협력의 필요성에 대한 공감대가 형성되었다고 보고하며 다음과 같이 전하고 있다. 로버트슨 국무부 차관보는 아라키 대사에게 “향후 정치회담 등에 대해서는 아직 구체적으로 결정된 것은 없지만, 소수의 관련국만 협상을 진행할 것으로 예상되며, 극동지역 전반의 문제가 논의될 경우 당연히 일본과도 협의할 것”이라고 전했다. 이에 아라키 대사는 “한반도 문제는 일본과 밀접한 관계를 가지고 있으므로, 향후 [사태]의 전개에 대해 통보받기를 원한다”고 답했다.

일본 외무성은 휴전협정 체결 전후로 미국의 저명한 정치평론가 월터 리프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이 신문에 발표한 논설에서의 발언에 주목하고 있었다. 리프먼은 20세기 미국을 대표하는 정치평론가이자 언론인, 외교사상가로, 냉전 초기 국제 질서에 대한 깊은 통찰로 알려져 있으며, 현대의 “오피니언 리더”의 원형이라 할 수 있는 인물이었다.

(외무성은) 리프먼이 한국전쟁과 일본의 기여를 강조하는 외교적 견해에 주목했다. 그는 전후 미국의 대표적인 현실주의 사상가로, 현실주의적 외교 관점에서 국무장관 존 포스터 덜레스(John Foster Dulles)의 강경한 반공 외교 노선에 대해, 미국이 동아시아에서 군사적, 도덕적 의무에 과도하게 얽매이는 위험성에 대해 경고했다.

일본 외교 자료에 따르면, 리프먼의 덜레스 비판은 일본 외무성뿐 아니라 영국 의회도 지지하고 있었다. 1953년 7월 29일 주미 일본대사관에서 오카자키 외무대신에게 보낸 “리프먼 논문 관련 사항” 보고서에는 리프먼이 한반도 문제를 항구적으로 해결하기 위해서는 남북한과 중국, 미국만으로는 결정할 수 없으며, 특히 소련과 일본의 참여가 필요하다는 점이 강조되어 있었다. 리프먼은 한반도 주민들도 미국과 유엔에 의한 해결이 안전

과 안정을 보장할 수 없다고 생각하고 있으며, 주변 강대국인 소련과 특히 주권을 회복한 일본으로부터의 보장을 필요로 할 것이라고 정리하고 있다. 이에 대한 주미 일본대사관의 구체적인 대응방안 등은 제시되지 않았다. 이 시기 일본 외무성은 일본의 관여에 유리한 논조를 모아 일본 외무성의 주장을 뒷받침해 줄 국제여론 형성에 신경을 썼던 것으로 보인다.

특히 리프먼은 한국전쟁 중 일본의 역할이 단순한 후방 지원 기지에 그치지 않고 지역적 외교의 주체로 재평가되어야 한다고 주장한 점에서, 일본 외무성의 주장을 강력히 지지하는 인물로 여겨졌다. 이는 일본이 1956년 유엔 가입 이전부터 재국제화를 향한 중요한 지적 지원이었으며, 전후 일본 외교의 위상에 대한 재고를 촉진하는 것이었다. 이러한 리프먼의 1953년 논조는, 당시 국제 정세 속에서 미국의 입지를 재검토할 수 있는 시야를 제공했으며, 일본 외교사 재평가에 중요한 단서를 제공하고 있다.

3. 휴전협정 체결 후

휴전협정이 체결된 7월 27일로부터 이틀 후인 7월 29일, 『뉴욕 타임스』는 한반도 문제를 둘러싼 정치회담에 참가할 것을 희망하는 일본정부의 움직임을 보도했다. 이 보도에 대한 대응을 둘러싸고 사와다 유엔 주재 일본대사가 외무성과 교신하며, 휴전협정 체결 후에도 여전히 일본의 관여를 추구하며 유엔 외교를 전개하고 있었던 정황이 드러난다.

“1953년 8월 10일 외무대신이 주미 대사에게 보낸 극비 전보: 일본과 한반도의 정치회담에 관하여”에는, 일본 외교의 전환점을 보여주는 내용으로, 일본이 자국의 미래에 대한 “강한 불안”을 느끼고 있음을 보여준다. 특히, 일본은 한국의 재건에 대해 전쟁 특수의 감소로 인한 경제의 악영향을 완화하는 데 큰 관심을 기울이고 있었던 것으로 나타난다. “일본의 미래에 대한 강한 불안”과 “한반도 재건에 대한 관심”이 연결되어 있으며, 일본의 국제적 재등장 의도가 드러내고 있다. 일본은 유엔 비회원국으로 무장 해제된 상태에서 국제정치 논의에 참여할 수 없는 현실 속에서, “무엇을 해야 할지 (모르겠다)”라는 표현은 일본의 외교적 무력감을 여실히 보여준다.

휴전 이틀 후, 자민당은 중국과의 무역을 촉진하기로 결정했다. 한국전쟁이 2년 이상 계속될 것으로 내다본 일본 정부는 한국 관련 정치회담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은 기대를 가지고 있었다.

- 1) 중국 공산당이 회담에 참여하기를 바란다.
- 2) 일본을 포함한 자유주의 국가들이 한국 재건에 참여하기를 바란다.
- 3) 공산권 국가들에 대해서는 자유주의 진영이 협력해 대응하기를 바란다.

이러한 점들은 향후 한반도 및 국제사회 간의 관계에서 중요한 요소로 간주되었으며, 휴전협정 체결 후에도 일본의 관여 여지를 확대하는 방향으로 공산권과의 외교를 모색하고 있었다. 이는, 대일 강화조약 체결을 통해 일본이 주권을 회복하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여전히 경제 재건 및 안보 측면에서 불안감을 안고 있었던 전후 일본의 국가적 심리와 연관되어 있다. 한국전쟁의 영향에 대해서는, 휴전이 가져올 영향으로 일본 경제에 악영향이 미치지 않도록 강력히 염원했던 점이 드러나 있다. 외교적 태도로는, 중국과의 관계 개선, 그리고 한반도 재건 지원에 자유주의 진영의 일원으로 참여하려는 의지를 내포하고 있었다. (일본은) 미래를 내다보며 협상 참여 의지가 보였으며, 공산주의 진영에 대한 태도를 포함해 국제정치에 주체적으로 참여하려는 자세를 드러내고 있다. 자료의 핵심 내용을 정리하면, 일본이 무장 해제된 채로 “국제정치의 논의에서 배제되고 있다”는 불만과 함께, 그런 상황에서도 일본이 유엔을 전면적으로 지지해 온 정당성을 주장하고 있다. 특히, 일본이 미국의 “민주주의의 무기고”로서의 역할을 떠맡고 있다는 점을 강조하고 있다.

이러한 실제적인 부담에도 불구하고, 일본이 유엔에서 전쟁이나 국제적 위기와 같은 파국 관련 논의에 참여조차 할 수 없다면, 도대체 무엇을 해야 한다는 것인가라고 호소하고 있다. 일본은 전후 무장 해제되어 대외적으로 군사적 위협에 노출되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유엔의 지원을 전적으로 신뢰해 왔으며, 이러한 일본의 흔들리지 않는 자세가 일본인의 신념을 대표한다고 주장하고 있다.

이러한 사료 속에서 주목해야 할 점은 “무기고(兵器庫)”라는 일본 외무성의 인식이다. 이는 미국이 제 2 차 세계대전 후 일본을 재무장시키지 않고 서방진영의 생산 및 지원 기지로 삼으려는 구상을 일본이 비판적으로 해석한 표현으로 볼 수 있다. 이는 미국에 대한 의존과 딜레마를 나타낸다. 일본 외무성은 “민주주의의 무기고”로서 미국에 의존했지만, 동시에 유엔 등 국제무대에서의 발언권이 제한된 현실에 불만을 품고 있었다. 무장 해제된 일본이 여전히 유엔에 대한 지지를 고수한 자세는 “평화외교에 대한 신념”이나 “동양의 평정 회복”에 기여하는 이상주의적 이념에 기반한 외교가 아니다.

주일 미군이나 유엔군보다도 동양의 평정 회복을 전면적으로 주장함으로써, 한국전쟁 이후 아시아의 안정화를 시사하고, “무기고”로서의 일본의 부담과 맞먹는 일본의 발언권을 강화하는 목적이 있었다.

1953 년 8 월 25 일 사와다 유엔 주재 일본대사가 오카자키 외무대신에게 보낸 보고서 “재개된 유엔총회 첫 주 상황에 관한 건”에서는 일본의 정치회담 참여 문제에 대한 논의가 유엔총회에서 주요 의제로 다뤄진 것을 “성공”으로 평가하고 있다. 이러한 결과에 대해 사와다 대사는 일본 외교의 성과로 보기보다는, 공산권이 한반도의 정전 후 정치회담 의제에 대해 구체적인 안건을 제시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회담 자체가 정치회담 구성국 문제로 국한된 것에 불과하다고 분석했다. 이와 같은 유엔총회의 진전 없는 상황(空轉)

자체가 일본이 한국전쟁 정전 후 질서 구축의 구성국으로 참여할 여지를 확대시키고 있다고 일본 외무성이 낙관적으로 보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외무성은 같은 시기의 미국 신문 등의 논조에도 민감하게 반응했다. 1953년 8월에는 휴전 협정 체결 후 한반도 정전 체제의 질서 구축에 참여하려는 일본의 태도가 공개적으로 드러났다. 예를 들어, 8월 28일 오카자키 외무대신에게 보낸 아라키 주미대사의 보고서 “한반도 평화회담과 일본의 태도”를 참고할 수 있다. 이 문서에서는 8월 27일자 신문 크리스천 사이언스 모니터(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⁴의 특보로 게재된 내용에서, 일본이 휴전 후 정치회담에의 참석을 강력히 추진할 수 있는 입장이 아니지만, 휴전 후에도 극동문제 해결을 목적으로 하는 모든 회담에 일본대표를 파견해야 한다는 의견에는 변화가 없다는 점을 보도하고 있다.

이 외에도 같은 시기에 일본 외무성이 정치회담의 구성문제를 단순히 일본의 관심사만이 아니라, 국제여론으로 일반의 관심을 끌고 있다고 판단했던 자료로는, 영국대사로부터의 보고서 등이 있다(1953년 8월 24일, 마쓰모토(松本) 대사로부터 오카자키 외무대신에게 보낸 “정치회담의 구성문제에 대한 신문 논조 관련” 등). 그러나 마감 직전에 발표자의 한국 파견 등 개인적인 사정이 겹쳐, 능력 부족으로 기한 내에 원고를 정리(완성)할 수 없었다. 많은 주최자와 관계자 여러분께 양해를 구하며, 이번 심포지엄의 토론을 기반으로 연구를 보완하고자 한다.

한국전쟁의 휴전 협정 체결 과정에서의 일본 외교에 대한 분석은 일본의 주권 회복과 미일 관계를 중심으로, 냉전 하의 한반도 분단과 재건의 재평가로 이어질 것이다. 본 연구는 현재 진행 중인 한반도 정전체제에 관한 인접 연구와의 공동 프로젝트의 기초연구로, 향후 활발히 활용되기를 기대한다.

⁴ 역자주: 크리스천 사이언스 모니터(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는 1908년에 창간된 미국의 대표적인 일간지로, 비영리 단체인 Christian Science Publishing Society 에 의해 발행된다. 주로 국제 뉴스와 정책, 경제, 문화, 과학 등의 분야를 다루며, 객관적이고 심층적인 보도를 특징으로 한다. 신문은 미국 내외에서 매우 존경받는 언론으로 평가받고 있으며, 종종 중립적이고 균형 잡힌 보도로 유명하다.

참고 문헌

【 1 차 자료】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第 1 卷 (外交文書原文)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第 3 卷 (外交文書原文)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政治會議關係』 (外交文書原文)

· 국회의회의록

第 8 回国会 衆議院 外務委員会 第 4 号、1950 年 7 月 26 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00803968X00419500726¤t=42>

第 193 回国会 参議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 15 号 2017 年 4 月 25 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9313950X01520170425&spkNum=10¤t=16>

第 196 回国会 参議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 15 号 2018 年 5 月 17 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9613950X01520180517&spkNum=127¤t=2>

【 서적 · 논문 · 기타 】

· 서적

남기정 2016, 기지국가의 탄생-일본이 치른 한국전쟁, 서울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大沼久雄 2006 『朝鮮戦争と日本』新幹社.

南基正 2023a 『基地国家の誕生- 朝鮮戦争と日本・アメリカ』東京堂出版.

· 논문

정병욱 (2010), 일본인의 경험한 한국전쟁-참전에서 반전까지, 역사비평 91, 2010 여름호, 212 - 231.

임다운(2019), 유엔한국재건단 (UNKRA)의 조직과 활동, 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국사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

임다운(2020), 유엔한국재건단 (UNKRA)의 조직과 활동, 서울대학교 국사학과, 한국사론, 66 권, 201-260.

Akagi Kanji (2011), "The Korean War and Japan"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24, No.1, pp. 175-184.

Tessa Morris-Suzuki (2015), "Japan and the Korean War 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아시아政経学会編 『アジア研究』 Vol.61, No.2, pp. 3-14.

赤木完爾(2013) 「朝鮮戦争—日本への衝撃と余波—」 『戦史特集 朝鮮戦争と日本 (防衛研究所) 』 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mh_tokushu/pdf/mh001_03.pdf

小此木政夫(2023) 「朝鮮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休戦七〇年の視点から」 日本外務省 『外交』 Vol. 80, 2023年8月号, 138-143.

木宮正史 (2016) 「【特集：朝鮮戦争と日本】日本にとって朝鮮戦争とは—歴史の再解釈と、その現代的含意」 아시아政経学会編 『アジア研究』 Vol.61, No.2, pp. 20-29.

鄭栄桓(2017) 「在日朝鮮人の「国籍」と朝鮮戦争 (1947-1952年) — 「朝鮮籍」はいかにして生まれたか」 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平和研究所 『プライム』 40巻, pp. 36-62.

南基正(2023b) 「東アジア停戦体制と日本の位置—日本が戦った朝鮮戦争を手掛かりに」 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 『冷戦期の日本の安全保障と朝鮮半島』 防衛研究所. https://www.nids.mod.go.jp/event/proceedings/forum/pdf/2023/JP_05_nam.pdf

松浦正伸(2019) 「朝鮮半島有事における在韓邦人非戦闘員退避活動 (NEO)に関する政策的研究」 国際安全保障学会編 『国際安全保障』 第47巻第3号, pp. 92-109.

The Korea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ercep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Armistice

Yuko Nagasawa (長澤裕子)

Visiting Researche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1. Introduction: Problem Awareness and Previous Studies

This year marks the 72nd anniversary of the armistice that ended active hostilities in the Korean War (also known as the June 25th War). The war, which broke out June 25, 1950, was halted by the signing of the 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 on July 27, 1953. As is well known, this was not the “end” of the war, but merely a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an “armistice.” Since then, tensions have continu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is context, Japan was inevitably compelled to reassess its strategic position in light of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bloc. Howev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conducted. In particular, studies based on primary sources and archival materials related to Japan and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are still lacking.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rgely limited their analysis of Japan’s role to that of a war procurement or rear support base. However, this presentation will focus on diplomatic documents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OFA Archives). Specifically, it will examine documents from the early 1950s preserved in the MOFA Archives to reveal internal diplomatic discussions among the Japanes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U.N. representatives, U.S. ambassadors, and diplomats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worked with the U.S. Embassy in Japan and U.N. diplomatic authorities during that period. Although Japan was not a United Nations member and was thus excluded from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it sought to reestablish it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through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material support and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which may be termed a form of “re-internationalization (再国際化).”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that analyze diplomatic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Korean War and Japan. However, the main arguments presented in previous studi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broad aspects.

1) The Korean War boom and economic recovery: These studies emphasize that the Korean War was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in Japan’s postwar recovery. The United States’ procurement of military supplies triggered the “Korean War special procurement boom,” also known as the “Korean War boom,” which set the Japanese economy on a path of substantial growth. This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Japan’s period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terpretation has become so well-established that it is even included in Japanese high school textbooks. 2) In a related context, many studies on the 1965 normalization negoti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highlight Japan’s strategy of promot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while avoiding direct acknowledgment of colonial responsibility. They also emphasize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anti-communist alliance structure under the Cold War. **3)** Regarding the division of North and South Korea and its political impact on the Korean community in Japan, some studies have noted that the Korean War intensified internal divisions within the Korean community residing in Japan. Jeong (2017) and Nam (2023)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Korean War contribu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vision of the Korean community in Japan into “South” and “North” factions. This division wa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Japan’s domestic security policies and surveillance systems. These studies further argue that the logic of “hostility” and exclusion toward Koreans in Japan intersected with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4)** Several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tha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Japan was reorganized as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ar East strategy.” In this process, institutionalized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economic dependence contribute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a Cold War structure centered on Japan’s reliance on the U.S. These studies include analyses of Japan’s rearmament,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U.S.-Japan relations (Akagi, 2011, 2013); examinations of Japan’s role as a rear support base and logistical hub (Nam, 2016, 2023); comprehensive accounts encompassing both Japa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and domestic anti-war movements (Jung, 2010);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Japanese involvement alongside other nations (Tessa, 2015). Tessa argues that although Japan was not officially a combatant in the war, it is insufficient to focus solely on its role as a rear support and logistical base or the deaths of Japanese seamen mobilized for the war effort. She contends that Japan was, in substantive terms, involved in the violence of the war (Tessa, Aug. 2015). The Yoshida Shigeru (吉田茂) Cabinet dispatched minesweeping units and landing ship, Landing Ships, Tank (LSTs) in an effort to secure an early and favorable conclusion to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also known as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Onuma, 2006). As a result,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primarily through laborers—ranked sixth among the sixtee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during the six month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Nam, 2023b, pp. 108–109) However, there is criticism of Tessa’s argument regarding Japan’s proactiveness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Korean War. Critics contend that Japan was simply responding to U.S. directives within a hierarchical U.S.-Japan relationship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t her argument downplays the broader Cold War dynamic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Kimiya, 2015). The emergence of the Korean War and Japan’s involvement as major topics in Japanese academic discourse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submission of security legislation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May 15, 2015,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re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t the same time, remarks made by Japanese lawmaker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suggesting that Japan could consider responding to a request for the Self-Defense Forces (SDF) to enter South Korea to protect Japanese nationals in the event of a contingenc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parked widespread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 in South Korea. In October 2015, the defense ministers of South Korea and Japan held a telephone conference, and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Nakatani (中谷) made his first visit to South Korea in four years and nine months. This

development made it inevitable to reaffirm that the activities of the SDF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exclusive self-defense (専守防衛; Matsuura, 2019).

Recently,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armistice regime of the Korean War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in both Korean Peninsula studies and debates at the National Assembly level in Japan. In 2023, mark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expert Masao Okonogi (小此木政夫) highlighted that the withdrawal of US troops from Korea in 1949 actually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expand its involvement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Okonogi, 2023). Furthermore,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in July 1953, the Republic of Korea United Nations Command (ROK UNC) was relocated to Seoul in July 1957, which led to the argument that Japan's involvement was actually strengthen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United Nations Rear Command (ROK UNC Rear) in Japan. In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the existence of the Rear Command became a political issue between 2017 and 2018. Debates emerged over the possibility of Japan being drawn into a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well as over joint training exercises between the Self-Defense Forces and the ROK armed forces aimed at protecting Japanese nationals residing in South Korea (Minutes of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April 25, 2017). Moreover, following the inter-Korean summit on April 27, 2018,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Panmunjom Declaration, discussions were held on the potential need to reorganize the ROK UNC and its Rear Command in light of a possible shift from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to a peace treaty (Minutes of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May 17, 2018).

In relation to the fourth research aspect mentioned above, I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Nam's most recent studies. Nam introduced three newly uncovered documents, including a report on a conversation between Foreign Minister Katsuo Okazaki and U.S. Ambassador to Japan John M. Allison from June–July 1953—just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as well as a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from Japan'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raki, to Foreign Minister Okazaki. Through these sources, Nam revealed Japan's expresse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talks. As a consequence, the possibility of holding such talks was ultimately dismissed, and Japan's participation did not materialize (Nam 2023a, 230–231; Nam 2023b, 112).

In this present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findings already presented by Nam regarding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OFA)'s active stance toward the armistice regime, I further analyze diplomatic materials from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armistice.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s began on July 10, 1951. For MOFA in particular, which signe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eace Treaty) and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on September 8, 1951, Japan's diplomacy during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s marked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Especially noteworthy is the diplomatic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seeking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and the UN, which was pursuing a political resolution to the Korean War. In June 1952, Japan applied for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September,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pproved the application by a vote of 10 to 1. However, it was ultimately rejected due to a veto by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at point on, Japan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a “pacifist

nation,” until it officially joined the UN on December 18, 1956, marking its return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light of Kimiya’s aforementioned criticism that Japan’s involvement in the Korean War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analyzing Japan’s stance toward the armistice, as well as its “particip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highlighted in previous studies, offers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Japan’s posi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Japan–U.S. diplomacy.

In conclusion,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diplomatic documents reveals th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held an optimistic view regarding Japan’s potenti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discussions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Peace Treaty and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To facilitate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talks and its return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MOFA—under the leadership of Katsuo Okazaki (岡崎勝男), who succeeded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Shigeru Yoshida (吉田茂)—actively gathered and coordinate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armistice. This effort involved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key diplomatic figures, including Eikichi Araki (新木栄吉),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Renzo Sawada (澤田廉三),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Kenkichi Yoshizawa (芳澤謙吉), Ambassador to China. They engaged in repeated negotiations with U.S. Ambassador to Japan John M. Allison and John D. Kingsley,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Korean Reconstruction Agency (UNKRA), striving to incorporate Japan’s perspective into the postwar political framework. Of particular note are the diplomatic documents authored by Ambassador Yoshizawa, which serve as vital 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Japan’s assess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especially in light of armistice proposals originating from the communist bloc. As Minister to China, Kenkichi Yoshizawa had earlier played a key role in restor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the conclusion of the Soviet–Japanese Basic Convention in 1925. From 1952, he served as Japan’s Ambassador to China for three years. Following his resignation, he actively advocated for Taiwan in his role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Free Asia Defense League (自由アジア擁護連盟) and as president of the Free Asia Association (自由アジア協会). His diplomatic activiti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negotiations are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When discuss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early 1950s and Japan’s involvement—corresponding to the period analyzed in this presentation—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Korean Reconstruction Agency (UNKRA) cannot be overlooked. Notably,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rgely assessed that UNKRA undertook no significant activities between its establishment in December 1950 and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Im, 2019, 2020). Therefore, it is meaningful to introduce diplomatic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shed light on Japan’s involvement with UNKRA during this period. In November 1951, a request for cooperation was made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Japanese diplomatic records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regarded this as its first official engagement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Treaty (Nam, 2023). Furthermore, based

on my own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sources, numerous meeting minutes were identified in whic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ordinated and finalized the amount of monetary support and the list of aid materials to be provided. These discussions involved not onl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but also th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the 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MHLW), and other relevant ministries. Coordination was also carried out with the Far East Headquarters of UNKR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for the Un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Korea (UNCURK).

However, due to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this presentation was limited to introduc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armistice and analyzing their implications, without covering historical sources concerning Japan's involvement in UNKRA in detail. A separate presentation focusing on the UNKRA-centered restoration project and Japan's involvement in it will be reserved for a future opportunity. It is hoped that this symposium will serve as a catalyst for expanding interest in and fostering joint research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related to post-armistice reconstruction efforts following the Korean War.

2. The Korean War and Japan's Involvement — Before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Prime Minister Yoshida expressed Japan's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but only within the bounds of disarmament. Discussions about the potential participation of a Japanese volunteer army were explored primarily through analyses of media reports. Chief Justice Tanaka (田中) remarked that "in theory, it is possible for Japanese individuals to join an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army," though this statement was later revised (Nam, 2023a). However, analysis of newly uncovered diplomatic documents and records from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reveals that although Japan was still formally under occupation prior to the Peace Treaty, it nevertheless sought to re-ent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rough the Korean War and aimed to assert itself as an independent actor on the global stage. On July 26, 1950,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xamined the legality of forming a volunteer army in relation to 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Japan's right to self-defense. If Japan's right to self-defense were to be recognized, the debate naturally extended to whe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force would be lawful. Article 9 of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enacted in 1947, renounces war and the use of force as a means of settl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However, the prevailing view within the Diet was that there was no definitive legal conclusion regarding the deployment of a volunteer army to the Korean War. It was generally held that Jap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obligations would be clarified through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Treaty (Minutes of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July 26, 1950). In this context, Chief Justice Kotaro Tanaka (田中耕太郎) stated in a newspaper interview that the Peace Treaty would serve as the legal foundation for determining both Jap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 legality of a volunteer army. He emphasized that Japan must fulfill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particularly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In March 1952, just before the Peace Treaty came into effect, MOFA closely monitore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negotiations and compiled related documents. On October 28 of the same year, MOFA began detailed discussions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on Japan. Beginning in January 1953, Japanese ambassadors stationed abroad — including Ambassador to China, Yoshizawa — began submitting intensive reports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Japan's approach to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s and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during this period ha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Japan was not an official combatant in the Korean War, it sought to secure a degree of "right to speak" in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 process. In particular, for Japan, which had regained its sovereignty through the Peace Treaty in 1951, participating in the cessation of the Korean War and shaping the postwar order became a key security priority. MOFA expressed a clear int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rmistice process in some capacity, recognizing that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essential to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recovery. This position aligned with Japan's increasing strategic interest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had become the front line of the Cold War. In this context, postwar Japanese diplomacy pursued both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reintegration." MOFA gathered and analyzed unofficial information to track the progress of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s and sought ways to communicate Japan's pos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Around the time of the signing of the Peace Treaty, some Japanese diplomats and intellectuals occasionally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Japan should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some form to ensure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peace in East Asia." In particular, at the time of the 1953 armistice agreement, there was an expectation with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at Japan might assume a mediating role in future inter-Korean dialogue and regional peace-building (Akagi Kanji, 2013).

However, Japanese diplomatic records from the period suggest that concerns about los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Korean War boom or forfeiting Japan's vo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ere more prominent than a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contributing to a peace order in East Asia.

The report titled "A Brief History of Japan's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the Korean War" (Document No. 557) record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U.S. Ambassador to Japan Allison and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Okazaki on June 11, 1953. It documents Foreign Minister Okazaki's articulation of Japan's position during the meeting. Okazaki emphasized Japan's support for the UN and British forces, while stating that Japan held "a deep interest" in the fu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He further argued that Japan should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some form, in the political talks shaping the region's future.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accept Japan's involvement. Ambassador Allison stated that participation in the talks would be limited to "countries that are currently engaged in a major rol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n June 29, MOFA also made contact with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ohnson, exploring way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talks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r, on June 18, 1953, Ambassador Renzo Sawada (澤田廉三) of Japan's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acknowledged to the Indian Ambassador that Japan had no voice in military matters. However, he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Japan should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f the agenda involved political issues (Nam, 2023b, 112).

On June 30, Ambassador Araki sent a report to Foreign Minister Okazaki, stating that he had once again conveyed to Ambassador Allison that Japan had provided significant cooperation to the UN forces, including military facilities, and that Japan maintained a strong interest in the fu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On July 23, just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Japa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Eijichi Araki (新木栄吉) reported that, during a meeting with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son, a consensus had been reached on the need for U.S.-Japan cooperation in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broader Far East region. Ambassador Araki noted the following exchange: Assistant Secretary Robertson stated, "Nothing has been specifically decided yet regarding future political talks, but it is expected tha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relevant countrie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s. If broad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Far East are discussed, we will, of course, consult with Japan." In response, Ambassador Araki said, "Since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is closely related to Japan, I would like to be kept informed of future developments."

MOFA closely followed the editorial comments made by 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a prominent American political commentator, before and after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Lippmann, a leading political commentator, journalist, and foreign policy theorist in the 20th-century United States, was known for his deep insights into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He could be regarded as a prototype of the modern "opinion leader."

MOFA paid attention to Lippmann's diplomatic views, particularly his emphasis on the Korean War and Japan's contributions. As a leading realist thinker in postwar United States, Lippmann, from a pragmatic diplomatic standpoint, criticized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s hardline anti-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He cautioned against the risk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oming overly entangled in military and moral commitments in East Asia.

According to Japanese diplomatic records, Lippmann's criticism of Dulles was supported not only by MOFA but also by member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In a report titled "The Matter of the Lippmann Paper," sent to Foreign Minister Okazaki by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July 29, 1953, Lippmann emphasized that a lasting resolution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solely by South and North Kore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 argue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both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was especially essential. Lippmann also noted that the Korean people believed a resolut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lone would not guarantee their safety and stability. He asserted that assurances from regional powers—includ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particularly from Japan, which had recently regained its sovereignty—were

necessary.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propose any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in response. During this period, MOFA appeared to concentrate on shap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in favor of Japan's involvement by collecting and highlighting arguments supportive of its position.

Notably, Lippmann was regarded as a strong supporter of MOFA's position, asserting that Japan's role during the Korean War should be re-evaluated—not merely as a rear support base, but as an active player in regional diplomacy. This perspective provided important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Japan's re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r re-internationalization, even before it joined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56. It also contributed to a reassessment of Japan's diplomatic status in the postwar period. As such, Lippmann's 1953 argument offered a critical lens through which to reconsider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t the time.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re-evaluation of Japan's diplomatic history.

3.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

On July 29, two days after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was signed on July 27,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expressed its desire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response to this report, communications between Japa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Sawada and MOFA reveal that Japan continued to seek involvement and actively pursue diplomacy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even after the agreement was concluded.

“A top-secret telegram sent by the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to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August 10, 1953, regarding Japan and political talk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Japan's postwar diplomacy. The document reveals Japan's “deep anxiety” about its future. Notably, Japan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interest in Korea's reconstruction, viewing it as a way to offset the adverse economic effects caus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wartime special procurement boom.” “Japan's strong anxiety about its future” is closely linked to “its interes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revealing the country's intention to reemerg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t a time when Japan wa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as unable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ussions while being disarmed, the phrase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encapsulates the nation's diplomatic helplessness.

Two days after the armistice,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decided to promote trade with China.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ich had anticipated the Korean War would last more than two years, held the following 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 upcoming political talks on Korea:

- 1) That Communist China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talks.
- 2) That lib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would be involved in Korea's reconstruction.
- 3) That the liberal democratic bloc would cooperate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ommunist states.

These factors were regarded as key to shaping the fu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ven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Japan pursued a diplomatic approach toward the communist bloc, aiming to expand its role and engagement.

This stance reflects the postwar national psyche of Japan, which remained anxious about economic recovery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spite the restoration of sovereignty through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ith regard to the Korean War's impact, there was a clear desire to prevent the armistice from negatively affecting the Japanese economy. Diplomatically, Japan signaled its intention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Communist China while simultaneously positioning itself withi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camp as a contributor to Korea's reconstruction. Japan not only expressed a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negotiations with an eye on future developments, but also revealed a proactive attitude toward reengag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cluding efforts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communist bloc. To summarize the key points of the materials: Japan expressed frustration over being excluded from discuss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le being disarmed. It also asserted its legitimacy by emphasizing its consistent suppor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even under such constraints. In particular, Japan underscored its role as America's "arsenal of democracy."

Japan argued that, despite these practical burdens and constraints, if it is not even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s on major global catastrophes such as war or international cris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en what role can it possibly play? Although disarmed after the war and exposed to external military threats, Japan has fully relied on the support of the UN. It further asserted that this unwavering commitment reflects the faith of the Japanese peo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a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n these materials is MOFA's perception of Japan as an "arsenal."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Japan'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United States' postwar strategy—not to rearm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but to use it as a production and logistical base for the Western bloc. This perception reveals both Japan's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plomatic dilemma it faced. MOFA recognized that Japan served as an "arsenal of democracy" and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ye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dissatisfied with Japan's limite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Japan's continued support for the UN, despite its disarmament, did not stem from idealistic commitments to abstract notions like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in the East" or "a belief in peace diplomacy."

By comprehensively advocating fo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in the East—rather than mentioning the presence of the U.S. military or UN forces in Japan—the aim was to promote stability in Asia after the Korean War and to enhance Japan's vo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proportion to its role as an "arsenal."

In the report titled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Resumed UN General Assembly*," sent by Japa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 Sawada, to Foreign Minister Okazaki on August 25, 1953, Japan's potenti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talks was evaluated as a "success," as it had become a major agenda item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However, Ambassador Sawada analyzed that this outcome should not be seen as a diplomatic achievement by Japan. Rather, it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the communist bloc had failed to present concrete agenda items for post-armistice political talk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a result, the discussions were confined to the composition of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talks. This lack of

substantive progress at the UN was interpreted by MOFA as an optimistic sign that Japan's participation 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countries in the post-armistice regional order remained a possibility.

MOFA also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one of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other media sources during this period. In August 1953, Japan's stance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order under the armistice regim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ecame publicly known. For instance, in a report titled "*Korean Peninsula Peace Talks and Japan's Attitude*," sent by Ambassador Araki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eign Minister Okazaki on August 28, it was noted tha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ad published a special report on August 27.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Japan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actively advocate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post-armistice political talks. However, Japan maintained its consistent view that a Japanese representative should be included in all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in the Far East, even after the armistice.

In addition, other documents from the same period—such as reports from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Kingdom—indicate that MOFA regarded the issue of the composition of political talks not merely as a matter of Japan's interest, but as one that was draw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attention. (For example, on August 24, 1953, Ambassador Matsumoto (松本) sent a report to Foreign Minister Okazaki titled "*Regarding Newspaper Editorials on the Composition of Political Talks*.") That said, due to personal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being dispatched to Korea shortly before the submission deadline, I was unable to complete the manuscript on time. I sincerely ask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ganizers and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is academic conference. I plan to supplement and further develop my research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and feedback received at this symposium.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diplomacy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cluding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agreement, grounded in Japan's restoration of sovereign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likely to lead to a reevaluation of the divi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As foundational research for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related to ongoing studie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s enduring armistice regime,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future scholarly developments.

REFERENCES

【Primary sources】

-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第1卷 (外交文書原文)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第3卷 (外交文書原文)
日本外交文書『朝鮮動乱關係一件 休戦交渉關係政治會議關係』 (外交文書原文)

• Minutes of the National Diet of Japan

第8回国会 衆議院 外務委員会 第4号、1950年7月26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00803968X00419500726¤t=42>

第193回国会 参議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15号 2017年4月25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9313950X01520170425&spkNum=10¤t=16>

第196回国会 参議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15号 2018年5月17日

<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9613950X01520180517&spkNum=127¤t=2>

【 Books, Articles, and Other Sources 】

• Books

Nam, Ki-jung 남기정 (2016), 기지국가의 탄생-일본이 치른 한국전쟁(*The Birth of a Base Nation: Japan's Role in the Korean War*), 서울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Onuma, Hisao 大沼久雄, 2006 『朝鮮戦争と日本』新幹社.

Nam, Ki-jung 南基正 2023a 『基地国家の誕生- 朝鮮戦争と日本・アメリカ』東京堂出版.

• Articles

Jung, Byung-wook 정병욱 (2010), 일본인의 경험한 한국전쟁-참전에서 반전까지 (*The Korean War as Experienced by the Japanese: From Participation to Antiwar Movement*), 역사비평 91, 2010, 여름호 (Summer Issue), pp. 212 - 231.

Im, Da-eun 임다은 (2019), 유엔한국재건단 (UNKRA)의 조직과 활동 (*The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Korean Reconstruction Agency*),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Korean History, Graduate Schoo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Im, Da-eun 임다운 (2020), 유엔한국재건단 (UNKRA)의 조직과 활동 (*The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Korean Reconstruction Agency*), Department of Korean Histor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한국사론 (Studies in Korean History), Vol. 66, pp. 201-260.

Akagi, Kanji (2011), "The Korean War and Japan"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24, No. 1, pp. 175-184.

Tessa Morris-Suzuki (2015), "Japan and the Korean War 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아시아政経学会編 『アジア研究』 Vol. 61, No. 2, pp. 3-14.

Akagi, Kanji 赤木完爾(2013) 「朝鮮戦争—日本への衝撃と余波—」 『戦史特集 朝鮮戦争と日本 (防衛研究所) 』 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mh_tokushu/pdf/mh001_03.pdf

Okonogi, Masao 小此木政夫(2023) 「朝鮮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休戦七〇年の視点から」 日本外務省 『外交』 Vol. 80, 2023年8月号、pp. 138-143.

Kimiya, Masafumi 木宮正史 (2016) 「【特集：朝鮮戦争と日本】日本にとって朝鮮戦争とは-歴史の再解釈と、その現代的含意」アジア政経学会編 『アジア研究』 Vol. 61, No. 2, pp. 20-29.

Jung, Yeong-hwan 鄭榮桓(2017) 「在日朝鮮人の「国籍」と朝鮮戦争 (1947-1952年) — 「朝鮮籍」はいかにして生まれたか」 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平和研究所 『プライム』 40巻, pp. 36-62.

Nam, Ki-jung 南基正 (2023b) 「東アジア停戦体制と日本の位置—日本が戦った朝鮮戦争を手掛かりに」 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 『冷戦期の日本の安全保障と朝鮮半島』 防衛研究所. https://www.nids.mod.go.jp/event/proceedings/forum/pdf/2023/JP_05_nam.pdf

Matsuura, Masanobu 松浦正伸(2019) 「朝鮮半島有事における在韓邦人非戦闘員退避活動 (NEO)に関する政策的研究」 国際安全保障学会編 『国際安全保障』 第47巻第3号, pp. 92-109.

ATIS와 중공군 포로신문

ATIS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Korean War

발표 | 이상호(군사편찬연구소)

토론 | 추 양(중국군사과학원)

ATIS와 중공군 포로신문

이 상 호(국방부 군사편찬연구소)

I. 서 론

냉전사의 세계적 석학인 개디스(John L. Gaddis)는 그의 저서 『새로 쓰는 냉전의 역사(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에서 소련 붕괴 후 새로운 자료를 통해 냉전사의 전체적인 구조와 원인을 어느 정도 알게 되었다고 주장했다.¹⁾ 냉전의 한복판에서 벌어진 6·25전쟁에 대한 평가와 해석은 어떨까? 한때 이 전쟁을 미국 학자들은 잊혀진 전쟁(the forgotten War)라고 불렀다.²⁾ 최근에 호주 국립대학의 테사-모리스 스즈키(Tessa Morris-Suzuki) 교수는 ‘잘못 기억된 전쟁(the misremembered war)’이라고 평했다.³⁾ 이외에도 ‘끝나지 않은 전쟁(unending conflict)’이라는 표현도 있다.⁴⁾

6·25전쟁의 미 개척지라고 하면 아마도 노획문서와 포로신문에 관련된 기구와 인물에 대한 분야라고 할 수 있다. 특히 노획문서와 포로신문을 담당했던 연합국번역통역국(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ATIS)에 대한 분석과 연구는 최근에야 시작되고 있다. 특히 포로에 대한 연구는 많지만 실제적으로 포로와 실제 접촉했던 기구와 인물에 대한 연구는 아직도 제대로 해명이 되어 있지 않다.

어느 전쟁에서든 포로가 되면 먼저 신문⁵⁾을 받게 된다. 포로가 된 당사자는 제네바협약 제3협약의 제17조에 따라 신문을 받을 때에는 “그 성명, 계급, 출생년월일 및 소속군번호, 연대번호, 군번을 진술하여야 하며, 또는 이것이 없는 경우에는 이에 상당한 사항을 진술하여야 한다.”고 규정되어 있다.

그런데 제1, 2차 세계대전에 관한 내용을 볼 때 우리는 포로신문에 있어 다양한 방법(고문, 협박, 살해)등을 통해 적의 첩보를 취득하려는 경우를 알고 있다. 이러한 제1, 2차 세계대전의 폐해를 시

1)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존 루이스 개디스 지음, 박건영 옮김, 『새로 쓰는 냉전의 역사』 (사회평론, 2002)]
2) Clay Blair, *The Forgotten War: America in Korea 1950-1953*, New York: Doubleday, 1987.
3) Tessa Morris-Suzuki, *The Korean War in Asia-A Hidden History*, Rowman&Littlefield, 2018.
4) Sheila Miyoshi Jager, *Brothers at War: The Unending Conflict in Korea*, New York: Norton, 2013.
5) 학계에서 일반적으로 포로에 대한 정보 취득을 위해 질문하는 방법을 ‘심문’이라고 쓰고 있으나 이는 잘못된 용어 사용이다. 심문(審問, inquiry)은 대상자에게 하등의 통제를 가함이 없는 임의적인 질문을 의미한다. 반면에 신문(訊問, interrogation)은 신문자에 대하여 통제되는 조건하에서 직접 질문의 방법에 의하여 대상자로부터 첩보를 획득하기 위한 체계적인 노력을 뜻한다. 따라서 기존의 학계에서 통용되고 있는 포로심문은 포로신문으로 기술하는 것이 적절하다고 판단된다. 참고로 심문(尋問)은 주로 일본학계에서 사용하는 용어로 본래의 뜻은 ‘찾아가서 물어봄’이지만, 일본에서는 포로심문(捕虜尋問)이라는 용어로 사용하고 있다. 합동참모본부, 『합동·연합작전 군사용어사전』, 합동참모본부, 2003, 262쪽. 따라서 심문을 쓰는 경우는 일본 용어를 차용해서 쓰는 것이라고 볼 수 있다. 국가법령정보센터의 전쟁법에도 그대로 일본식 용어인 심문을 사용하고 있다.

정하고 국제적 인권보호 차원에서 마련된 것이 1949년 제네바협약이다. 하지만, 이후 6·25전쟁과 베트남전쟁, 최근의 이라크전쟁에서 알 수 있듯이 적의 포로에 대한 가혹한 인권유린 사례는 쉽게 찾아볼 수 있다.

6·25전쟁의 포로 연구는 지금까지 미국이나 공산국(북한 및 중국)의 포로정책⁶⁾, 포로대우와 같은 포로관리와 정전회담 직전의 포로교환⁷⁾, 반공포로석방과 그 영향⁸⁾, 중립국포로송환⁹⁾ 등에 초점이 맞추어져 왔다.

하지만 포로에 대한 개별적 연구나 포로수용소에서 면담 등 포로로부터 확보한 정보를 어떻게 정리하여 활용했는지, 그리고 포로의 진술에 대한 진위여부 판별문제 등 실제 포로관리로부터 얻어진 군사정보와 그 대책에 대해서는 거의 연구된 것이 없다.¹⁰⁾

본 연구는 6·25전쟁기 중공군 포로에 대한 포로신문에 있어서 바로 포로신문가(interrogator)와 이들에 의해 수집된 정보가 어떻게 활용되었는지에 대해 분석하고자 한다. 6·25전쟁기 북한 및 중공군 포로 가운데 본 연구는 우선 중공군 포로에 대한 신문가를 중심으로 기술하려고 한다. 이들 신문가는 크게 4가지 부류로 나뉘어 진다. 미 FEAF(Far East Air Force, 극동공군) 요원, ATIS 요원, 한국인 요원¹¹⁾, MIS(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군정보국)요원 등이다. 이 중 대부분을 차지하는 것은 ATIS요원이고 이들 가운데 대부분이 바로 일본계미국인 2세(Nisei, 니세이)이다.

모니카 김(Monica Kim)의 경우 자신의 저서에서 6·25전쟁에 참전하여 언어 능력을 발휘한 일본계 미국인을 4천 명이라고 기술하고 있으나¹²⁾, 당시 직접 참전한 니세이의 증언에 따르면 1천 명을

6) 「포로의 대우에 관한 1949년 8월 12일자 제네바협약」, 『제네바협약: 1949년 8월 12일』 (외무부, 1965); 국방군사연구소, 『한국전쟁의 포로』 (국방군사연구소, 1996); 김승태, 「6·25전란기 유엔군측의 포로정책과 기독교계의 포로선교」, 『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 제21호 (한국기독교역사학회, 2004); 조성훈, 『한국전쟁과 포로』 (선인, 2010); 김보영, 「유엔군의 포로정책」, 『이화사학연구』 제46집 (이화사학연구소, 2013).

7) 이상호, 「한국전쟁기 미군의 공산포로 ‘미국화교육」, 『역사와 현실』 제78호 (한국역사연구회, 2010); 최혜린, 「6·25전쟁기 미군의 포로 정책 전개 양상: 전범조사부와 민간정보교육국의 활동을 중심으로」, 『한국사론』 제63집 (서울대학교인문대학사학과, 2017).

8) 김학재, 「진압과 석방의 정치: 한국전쟁기 포로수용소와 국민형성」, 『제노사이드 연구』 제5호 (제노사이드 연구회, 2009); 김보영, 「한국전쟁 시기 이승만의 반공포로석방과 한미교섭」, 『이화사학연구』 제38집 (이화사학연구소, 2009); 김행복, 『반공포로 석방과 휴전협상』 (백년동안, 2015); 방준영, 「아이젠하워의 한미 상호방위조약 승인과정과 반공포로 석방」, 『한일군사문화연구』 제20호 (한일군사문화학회, 2015); 정찬대, 「광주상무대포로수용소 실태 현황과 포로석방 사건: ‘반공포로수용소’ 사례 연구」, 『역사연구』 제37호 (역사학연구소, 2019).

9) 이선우, 「한국전쟁기 중립국 선택 포로의 발생과 성격」, 『역사와현실』 제90호 (한국역사연구회, 2013); 박영실, 「정전협정 체결 후 비무장지대 반공포로수용소 발생사건」, 『아세아연구』 제58권 제4호 (고려대학교 아세아문제연구소, 2014); 김혜인, 「망명의 기록, 난민의 시간: 한국전쟁기 중립국행 포로 주영복의 수기를 중심으로」, 『상허학보』 48집 (상허학회, 2016); 정병준, 「중립을 위한 ‘반공포로’의 투쟁: 한국전쟁기 중립국행 포로 76인의 선택과 정체성」, 『이화사학연구』 제56집 (이화사학연구소, 2018).

10) 윤성준, 「한국전쟁기 북한의 점령정책과 조선인민의용군의 동원: 미군포로심문보고서를 중심으로」, 『한국근현대사연구』 제89집 (한국근현대사학회, 2019).

11) 한국인 요원 중에는 학생들로 구성된 정훈부대가 있었다. 북진 이후 북한지역의 선무를 위해 학생들로 제 772부대 및 제773부대가 편성되었다. 중공군의 대거 남침후 이들 가운데 제772부대는 경상도 지역을 맡게 되어 부산에 정훈국 본실을 설치하고 대민선무, 부대정훈, 공비토벌 등 다양한 활동을 시작했다. 30여 명이 선발되어 부산 광안리에서 포로신문관으로 두달 동안 활동하였다. 중앙일보사, 『민족의 증언』 2 (중앙일보사, 1983), 351~357쪽.

12) Monica Kim, *The Interrogation Rooms of the Korean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24.

넘지 않는 것으로 증언하고 있다.¹³⁾ 하지만 당시 자료를 통해 보면 약 2천 여명의 니세이들이 6·25 전쟁에 참여하여 활동한 것으로 파악된다. 이러한 포로신문을 통한 정보획득은 바로 다양한 보고서로 발간되어 전투부대에 배포되었고 활용되었다.

본 논문의 연구를 위해 맥아더기념관(MacArthur Archives)에 소장되어 있는 연합국번역통역국(ATIS)의 포로신문보고서(Interrogation Report)¹⁴⁾를 활용하였다.

II. 6·25전쟁기 ATIS와 포로신문보고서

아시아-태평양 전쟁이 치열하게 전개되던 1942년 9월 19일 남서태평양육군총사령부(GHQ/SWPA)의 지령에 의해 호주 브리즈번(Brisbane)에서는 ATIS가 창설되었다.

ATIS의 임무는 연합국간 및 업무 간에 있어서 필요한 통역번역서비스를 제공하고, 전투 중에 노획된 문서의 번역 및 분석, 포로에 대한 신문 및 조서 작성, 이러한 결과를 기관지(Bulletin), 회람(spot), 연구보고 등으로 인쇄 출판하여 관계기관에 배포하는 것이다. 아시아-태평양전쟁 동안 ATIS의 발간물의 양은 최대 200만 쪽에 달했다. 또한 ATIS는 추가적으로 일본군에 대한 항복권고문서를 작성하고 방송, 항복문서조인을 둘러싼 회합에서의 통역 등을 제공했다. 즉 ATIS의 임무에는 비밀감시, 암호해독, 독도법, 무선감청, 전투서열 분석, 포로 신문, 일기, 편지, 중요 기사, 적의 시체로부터 확보된 수집품으로부터 정보를 입수하는 것 등이 포함되어 있었다.¹⁵⁾

ATIS요원의 훈련은 크게 두 가지 방향에서 이루어졌다. 하나는 군사첩보어학교(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Language School, MISLS)를 설립하여 이곳에서 훈련하는 방식과 일반대학의 위탁과정을 두고 여기서 어학요원을 배출하는 방식이었다.

ATIS요원들은 샌프란시스코 프레시디오(Presidio)에 있는 군사첩보어학교에서 공부했다. 그들 대부분은 니세이로 미국시민권자들이었다. 1941년 11월 60명의 학생과 4명의 일본계교사로 구성된 군사첩보어학교가 설립되었다. 학생 가운데 2명만 백인이었고 나머지는 니세이였다. 1942년 5월에 45명이 졸업했는데, 백인은 졸업 후 소위로 임관되었지만, 니세이는 처음에는 트럭이나 지프운전수로 비(非)첩보부문에 배속되었다.¹⁶⁾

ATIS의 규모는 시기마다 달랐지만 1945년 말에 가장 규모가 컸을 때에는 2,667명이 구성원으로 있었다. 이 가운데 대부분의 어학요원(Linguists)은 하와이나 캘리포니아로부터 온 니세이들로 이들은 아시아-태평양 전쟁에 참전하여 180명 이상이 동성 무공훈장(Bronze Star)부터 수훈장

13) 이상호, 「한국전쟁기 연합국번역통역국과 북한문서의 노획」, 『역사와 현실』 통권109호 (한국역사연구회, 2018).

14) MacArthur Archives, RG 6, Records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FECOM), 1947~51.

15) Takemae Eiji, *Inside GHQ: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Its Legacy*, NY: Continuum, 2002.

16) 山本武利, 『日本兵捕虜は何をしゃべったか』, 文藝春秋, 2002, 25頁.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까지 받았다.

아시아태평양 전쟁기 ATIS는 29개의 유럽어와 아시아 언어를 취급했다. ATIS는 1945년 9월까지 적의 문건 및 포로신문조서 18,000건을 번역하고 16,000건을 출판했으며, 10,000명의 포로를 심사하여 779개의 신문보고서를 작성하였다.¹⁷⁾

또한 후방인 미국 본토에는 미국 육해군 합동신문반(Joint Interrogation Center)을 조직했다. 합동신문반은 캘리포니아의 바이런 핫스프링(Byron Hot Springs)에 위치하며 캠프 트레이시(Camp Tracy)로 알려져 있다. 캠프 트레이시는 1942년 12월에 개설되어 1943년 1월부터 1945년 7월까지 3,500여명의 일본군 포로에 대해 12,000건의 신문을 수행했다.¹⁸⁾ 제2차 세계대전 동안 미국에 있는 일본군 포로들은 전쟁 전 기간 동안 완벽히 비밀로 처리되었다. 2년 반 동안 3,500명 이상의 일본군 포로를 신문했고, 신문을 통해 6,500페이지로 구성된 1,700개의 신문보고서를 작성했다.

6·25전쟁이 발발하자 TIS¹⁹⁾는 1950년 7월 7일 한국전선에 배치할 ATIS전선부대(ADVATIS)의 조직을 서두르게 된다. 이들이 선발대로 파견되었고, 이후 ADVATIS의 조직은 확장되었다. ADVATIS는 일종의 전진기지 역할을 담당했다. 대구와 부산 동태를 주기지로 하며 주요 지역(서울, 인천)과 전투부대에 전방제대(ATIS Advanced Echelon)를 파견하였다. 즉 ADVATIS는 전선에 파견된 예하 부대인 전방제대(AE)를 통해 북한군 및 중공군 포로에 대한 신문, 각 파견대 및 사단 파견대에서 보내오는 북한 노획문서를 분류, 정리, 번역하여 전략정보, 전술정보 등을 분류하고 이를 도쿄의 ATIS본부로 이송하였다.

1950년 7월 15일 ADVATIS는 금천(Kumchon)지역에 주둔하고 있던 한국군 헌병대 2층 건물에 주둔했다. 이 날 ADVATIS는 신문보고서를 최초로 주한미군사령부 G-2에 보고했고, G-2는 미8군 사령부 하의 모든 신문 조직은 ADVATIS 부대장의 통제를 받을 것을 명령했다.²⁰⁾ 7월 17일 미8군 사령부와 ADVATIS 합동으로 신문센터(Interrogation center)를 수립하고, 한국군으로부터 인계받은 포로 10명에 대한 신문을 시작했다.²¹⁾

7월 16일 ADVATIS는 아주 중요한 문서를 입수할 수 있었다. 이는 1950년 7월 16일 대전지역에 있던 미 제24사단 21연대에 의해 노획된 북한 문서였는데, 이는 북한군 제4사단장인 이권무의 서명으로 예하 18, 16, 5연대에 6월 22일 발효된 정찰명령서였다.²²⁾ 이 문서와 함께 ADVATIS는 북한

17)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GHQ, SWPA"(1948. 7), RG 331, Allied Operational and Occupation Headquarters, World War II,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SCAP),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Public Safety Division, General File, 1946-50.

18) Alexander D. Corbin, *The History of Camp Tracy: Japanese WWII POWs and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Interrogation*, VA: Ziedon Press, 2009, p. 3.

19) 전쟁 발발과 함께 TIS의 명칭도 ATIS로 통칭되었다. 이는 미국이 유엔군이라는 연합군 형태로 6·25전쟁에 참전하였기 때문에 Allied라는 명칭을 사용한 것이다.

20) "Status of ADVATIS"(1950. 7. 17),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MIS(D/A) Intelligence Division, Translator & Interpreter Serv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47-50.

21) "Records of Events, Advanced Echelon"(1950. 7. 8~10),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22) "Request for Information"(1950. 9. 16),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의 남침을 증명할 수 있는 효과적인 증거 문서로 작전명령 1호를 입수하여, 제4사단 포병장교의 진술과 함께 이를 유엔에 제출할 특별보고서에 첨부시켰다. 이 작전명령 1호에는 잘 알려져 있듯이 제4사단이 38선 접경지역인 옥계리를 돌파하여 의정부, 서울 지역으로 진출하는 것으로 계획되어 있었다.²³⁾

인천상륙작전의 성공 이후 북한군 포로의 수와 노획된 문서의 수가 기하급수적으로 늘기 시작했다. ADVATIS는 제한된 인원으로 임무를 수행하기 위해 동분서주하였다. ADVATIS의 또 하나의 주요 임무는 북한군 포로에 대한 신문이었다.

중공군의 공세로 인해 전황이 급격하게 변하게 되자, 1950년 12월 1일 ADVATIS는 전방에 파견된 전방제대(AE)의 번역팀 및 포로 신문가들을 모두 후방으로 후퇴시켰다. ADVATIS는 부산 동래에 사령부를 두었고, 서울과 인천 지역에 배치되었던 산하 부대를 모두 대구로 이동시켰다.²⁴⁾ 12월 2일 현재까지 ADVATIS가 수행한 작업은 매우 방대하였다. 9만 5천명의 포로를 1차 심사했으며, 그 가운데 1760명의 포로들에 대한 신문을 수행하였고, 2788개의 신문보고서를 작성했다. 또한 문서 수집에 있어서는 18톤에 해당하는 노획문서를 정리, 평가, 번역하였다.²⁵⁾

이렇게 6·25전쟁기 ATIS는 ADVATIS를 파견하여 한국전선에서 포로신문, 주요문서의 번역 등을 통한 전략 및 전술정보를 수집하였다. 또한 당시 주한 미8군, 극동공군, 국무부 신문팀(State Department Interrogation Team, ORO)등 공산권 자료를 확보하려는 다양한 기구들의 활동을 조정하여 이들이 입수한 주요 문서들을 통합적으로 관리하여 선적번호를 부여하였고, 이를 안전하게 본토로 이송할 수 있었다.

이렇게 활약하던 ATIS는 1951년 2월 4일 제8238육군부대로 재조직되었으며, 12월 1일 극동군사령부 군정정보대(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 8238th Unit)로 재편되었다. 이후 MISG는 1952년 9월 1일 500군정보대(500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로 다시 개편되어, 6·25전쟁이 정전에 이르기까지 작전을 수행하였다.²⁶⁾

Ⅲ. 포로신문조서의 종류와 체제

ADVATIS는 전선에 파견된 예하 부대를 통해 북한군 및 중공군 포로에 대한 신문, 각 파견대 및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23)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North Korean Aggression"(1950. 10. 11),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24) "Status of ADVATIS"(1950. 12. 26),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25) "Message from Stark to Willoughby"(1950. 12. 2),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26) "Lineage and Battle Honors Intelligence Support Complement, 8238th AU", RG 338, Record of U. S. Army Operational, Tactical and Support Organizations.

사단 파견대에서 보내오는 북한 노획문서를 분류, 정리, 번역하여 전략첩보, 전술첩보 등을 분류하고 이를 도쿄의 ATIS본부로 이송하였다. ADVATIS는 처음에 극동공군의 담당자와 공동으로 신문했다. 결국 1950년 8월에 유엔군 아래 ADVA(UN)TIS가 한반도에 있어서 유엔군 참가하고 있는 육해공군 전부의 공동조직으로 문서와 신문의 중앙집권적 관리체제가 정비되었다.

포로의 신문은 인천에서 가능한 한 3단계의 신문을 실행했다. 긴급한 현안 작전을 위해 전략적 신문(tactical interrogation)이 우선되었고, 10월말에는 중공군의 포로 신문도 시작되었다.²⁷⁾

이와 같이 ATIS는 6·25전쟁기 북한군 및 중공군 포로에 대한 포로 신문 및 노획문서 확보를 통해 당시의 시대상을 이해할 수 있는 1차 사료를 집대성하였다. 그 집대성의 결정체가 바로 포로신문보고서이다.

포로신문보고서는 야전에서 공산군 포로(prisoners of war), 탈영병(deserter), 및 피난민(refugee) 들을 신문한 보고서를 통합 정보 형태로 재편집, 간행한 자료라고 할 수 있다. 6·25전쟁 발발 직후 미군은 포로신문보고서를 개별 보고서의 형태로 배포하다가, 좀 더 통합된 정보를 제공하기 위해 1950년 8월부터 책자형태로 발간하기 시작했다.

이 보고서들이 책자 형태로 발간된 것은 1950년 8월 25일부터 1951년 3월 30일까지 총 57권이다. 제1호에는 보고서 번호 600번부터 699번까지 100건씩 묶여서 간행되었는데, 이런 형태가 57호(1951년 3월 30일)까지 유지되었다. 책자는 생산되는 순서에 따라 일련번호가 붙여졌으며, 1-21호까지는 신문보고서 100건씩, 22-57호까지는 50건의 포로신문보고서가 1권으로 묶여서 간행되었다.²⁸⁾

[표 1] 맥아더기념관 소장 포로신문보고서 현황

보고서 번호	작성 시기	신문보고서 번호	총 매수	신문건수	비고
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 #1-15 North Korean Forces	1950.8.25~11.1	600-2099	4,529 매	1,500건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 #16-21 Enemy Forces	1950.11.8~12.21	2100-2699	1,599 매	600건	No. 17 결호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22-57 ²⁹⁾ Korean Operation	1951.1.8.-3.30	2700-4450	6,995 매	1,750건	No. 52, 53 결호
			13,123 매	3750건	

27) 土屋礼子, 「占領軍の翻訳通訳局(ATIS)によ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活動」, 『Intelligence』 第17号, 2017年 3月, 110~123項

28) MacArthur Archives, RG 6, Records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FECOM), 1947~51.

29) MacArthur Archives, RG 6, Records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FECOM), 1947~51.

이 가운데 중공군 포로에 대한 신문보고서는 1950년 11월 8일부터 작성된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 16의 보고서 시리즈인 〈Enemy Force〉부터 등장한다. 당연히 중공군의 전쟁 참여가 1950년 10월 19일 이후부터이므로 이때부터 나타난 것은 당연하다고 할 수 있다.

IV. 중공군 포로신문관과 획득정보

포로신문보고서에 등장하는 최초의 중공군 포로는 1950년 11월 8일에 작성된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 #16, Enemy Forces의 싱중산(生中山)이다.

[그림 1]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2122³⁰⁾

CONFIDENTIAL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2122 30 October 1950
 FIELD REPORT (164 - MISDI - 1165) 26 October 1950

PW NAME: SYNG, CHUNG SAN (生中山) (Chinese)
 RANK: Pvt
 ORGANIZATION: 40th CCF Army, 3rd Brigade (also called Branch Unit),
 60th Regt, 1st Bn, Transportation Co, 1st Flat, 1st Sqd.
 DUTIES: Ammo Bearer
 EDUCATION: None
 AGE: 29
 OCCUPATION: Laborer
 ADDRESS: SANDONG HUN, CHIHAN FU City (CENTRAL CHINA)
 (東 山 省 龍 南 所 城 龍)
 DATE & PLACE OF CAPTURE: 250700 K Oct 50 12 Km Northwest of PYONGYANG
 by ROK (Vic of UNSAN).
 INTERROGATOR: T.M.O.

[그림 1]은 포로신문보고서의 일부를 제시한 것이다. 보고서에 따르면 싱중산은 29세의 병사로 중공군 제40군 제3여단 제60연대 제1대대 수송중대 제1소대 제1분대원으로 1950년 10월 25일 오전 7시 북한 수도 평양의 북서 12km 떨어진 운산지역에서 한국군에 의해 체포되었다. 체포 직후인 10월 26일 야전에 있는 ATIS파견대로부터 신문을 받고(164 MISDI - 1165) 본대로 이동하여 10월 30일 ATIS 신문을 받은 것으로 확인된다. 여기 나오는 신문가(Interrogator)는 T.M.O 약자로 되어

30)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 No. 16(1950.11.8.)", MacArthur Archives, RG 6,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FECOM) 1947-51.

함(Hahm) 대위	1	리아마(Liyama)	2	윤주태 중위	1	히로츠 병장(Hirotsu)	22
하마사카(Hamasaka) 병장	62	카지와라(Kajiwara)	52			이마가와(Imagawa)	27
하마스(Hamasu) 상병	31	이(Lee) 병장	38			이토(Ito)	1
한(Han) 상병	3	맥리(Mcric)	1			달젤(J. A. Dalzell)*	14
핫토리(Hattori) 상병	21	모리(Mori) 병장	46			고가(Koga) 병장	18
하야시다(Hayashida)	62	나가오(Nagao) 군무원	44			맥키(McKee) 병장	11
홍(Hong) 상병	5	타케사코(Takesako)	31			미시나(Mishina)	22
호리시게(Horishige) 상병	69	웁스(Weems) 소령	1			미야모토(Miyamoto)	1
이노모토(Inomoto) 중사	46					미야타(Miyata) 병장	29
가네시로(Kaneshiro) 상병	2					무라나카(Muranaka) 중위	2
가토(Kato) 상병	3					나가이(Nagai) 병장	4
가와시미(Kawashima) 중사	3					나카지(Nakaji) 병장	21
미요시(Miyoshi) 상병	28					나카야마(Harold Nakayama) 병장	48
야마시로(Yamashiro) 일병	17					넌리(Nunley)와 가렛(Garrett) 중위*	9
						오미자(Omija) 병장	2
						오나(Onna) 병장	6
						사와다(Sawada) 이병	12
						시게쿠니(Shigekuni) 이병	7
						시마부쿠로(Shimabukuro) 병장	30
						시모지(Shimoji) 병장	1
						신(Shin) 병장	2
						수가(Suga)	6
						타지(Taji) 중사	3
						타케우치(Takeuchi) 일병	19
						다나카(Tanaka) 상병 19명	19
						다니구치(Taniguchi) 일병	3
						타노(Tanno) 상병	19
						츠루마키(Tsurumaki) 상병	12
						왈리(Walley) (미해군)	2
						야마다(Yamada) 병장	15
						야마시타(Yamashita)	6
						요네히로(Yonehiro) 중위	1
						요시다(Yoshida) 병장	7
합계	402	합계	251	합계	18	합계	448
총계 1119명 (443명의 경우 신문가의 이름이 명확하게 나타나지 않음)							

* 미군 탈출포로 신문

위 표를 통해 볼 때 신문가 가운데 니세이로 간주될 수 있는 인물들은 전체 신문가 70명 가운데 48명인 68%를 차지하고 있으며 전체 신문대상 포로의 81%에 해당하는 910명을 담당하고 있었다. 이를 통해 볼 때 당시 포로신문의 상당 부분을 일본계미국인 2세인 니세이가 담당하고 있음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포로신문을 통해 획득된 정보는 재분류 되어, 북한군과 중공군의 부대의 편성이나 규모, 지휘관계 등에 대한 상세한 보고서로 작성된다. 예를 들어 “ATIS Research Supplement Interrogation Reports (1950. 12. 15)”에는 다음과 같이 개별 포로신문을 통해 보고서를 작성하였다.

북한군 통신 North Korean Signal Communications
중공군 군수조달 및 북한인 훈련(CCF Procurement and Training of Korean Personnel)
북한군 제8사단(North Korean 8th Infantry Division)
북한군 제105탱크사단(North Korean 105th Tank Division)

한편 포로신문을 종합하여 ATIS 조사정보국(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ection)에서는 중공군 내부의 조선인 (North Korean in the CCF) 같은 내용의 발전 심화된 보고서를 생산해내기도 한다.³²⁾

포로신문과 함께 중공군으로부터 압수하거나 노획한 문서 등도 ATIS에 의해 체계적으로 번역되기 시작했다. 대표적으로는 맥아더 원수가 재임하던 1950년 6월부터 1951년 4월까지 작성된 문서군이다. TIS 적의문건(Enemy Documents)에는 보충자료(Supplement)가 포함되어 있다. 이 자료에는 적의 문건 가운데 전술적으로 매우 중요한 문서군을 전부 완역하여 회람하였다.

적의 문건 시리즈에서 최초로 확인되는 중국 측 자료는 1950년 11월 16일 발행된 제7집(Issue No. 7)에 나오는 1950년 8월 20일자 중국 스촨지역의 서부군구에서 김일성을 응원하는 편지이다 [문서번호 200714].³³⁾ 다음으로는 1950년 12월 6일 발행 제10집(Issue No. 10)의 사진 자료로 묵덴(현재의 심양)에서 찍은 1950. 7월 25일자 “중국해방군(Chinese Liberation Army) 제4야전군 제49야전포병대대 2중대”라는 캡션이 찍힌 사진이다[200879].³⁴⁾ 이어서 확인되는 자료는 1950년 12월 13일 발행된 제11집(Issue No. 11) 중공군 제66군의 운산지구 전투결과 총결 보고서[201371]이다.³⁵⁾

운산전투는 국군 제1사단이 1950년 10월 26일부터 11월 3일까지 구룡강 연안인 운산지역에서 중공군 제39군과 조우한 전투이다. 이 운산전투로 인해 중공군의 참전 사실이 공식적으로 확인되었다. 중공군은 이 전투에 대한 사후 전투 보고서를 1950년 11월 20일자로 작성하여 회람했다. 이를 국군 제1사단이 일주일도 지나지 않은 1950년 11월 26일 노획하였고, 이를 번역하여 적의문건으로 발간 배포한 것이다. 중공군은 운산전투가 끝난지 20일이 지나지 않은 시점에 이미 전투보고서를 작성했고, 이를 노획한 부대로부터 계통을 밟아 12월 11일 전달받은 ATIS는 2일만에 번역하여 발간 배포한 것이다.

이외에도 연길 출신의 중공군 김호길이 1947년 6월부터 1950년 3월까지 이동로를 작성한 일기 [201021]³⁶⁾, 중공군 소부대야간전투 자료[201961]³⁷⁾, 1951년 1월 24일에 작성된 중공군의 백운산

32) “Special Report No. 70”, RG 554, MIS Intelligence Division,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ox 19.

33)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3 - 미국동군사령부 연합군번역통역국(ATIS) 노획문서 시리즈 I』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2020), p. 225

34)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Enemy Documents” Issue No. 10 (1950. 12. 6),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1945 - 1960.

35)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3』, pp. 366-374.

36)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3』, pp. 504-505.

37)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4-미국동군사령부 연합군번역통역국(ATIS) 노획문서 시

일대의 전투명령서철[201949]³⁸⁾, 1951년 1월 9일 작성한 중공군 제38군의 제3차 전역 경험 총결 보고서[202028]³⁹⁾ 등이 있다

적의 문건 시리즈 이외에도 군사적으로 매우 중요한 전술문건은 보충문건(Supplement)으로 전문 번역으로 통해 발간 배포하기도 하였다. 1950년 12월 16일자로 배포된 문건은 4호 문건(No. 4)으로 1950년 8월 진주 부근에서 노획한 중국어로 쓰여진 문서로 지뢰 매설 방법 및 전략 등을 수록하고 있다.⁴⁰⁾ 이는 이미 1950년 8월 26일자 ‘현안번역(Current Translation)’ 제1호로 번역해서 배포되었으나 그 정보가치의 중요성으로 인해 보충문건으로 다시 재발간 배포하고 있다. 이 문건을 사용한 부대로 당시 진주 부근에서 활동한 북한군 제6사단(방호산)은 중국인민해방군 제165사단이 북한에 들어와 부대를 변경한 것으로 다수가 중공군의 전투 기술과 기재를 활용하고 있었음을 반증하고 있다고 평가할 수 있다.

또한 북한군 및 중공군 포로에 대한 신문 및 각종 문서를 수집 정리하여, 전략정보(Tactical Intelligence) 및 지리정보(Geographic Intelligence)로 분류 정리하기도 하였다. 이후 ATIS는 극동 군사령부 군정보대로 재편되었고, 다시 500군정보대로 개편되어 정전이 이루어질 때까지 작전을 수행하였다.

V. 결론

2023년에 출간된 펜실베이니아 대학의 이정식의 자서전에 따르면 그는 6·25전쟁에서 중공군 포로를 신문하는 미군의 중국어 통역관으로 활동했다고 밝혔다.⁴¹⁾ 스칼라피노와 함께 한국의 공산주의 운동사를 집대성한 그는 온양에 있는 국민방위군사관학교를 수료한 후 동래 온천 부근의 한 부대에서 근무했다고 밝혔는데 이 부대 이름을 ADVATIS라고 기술했다. 바로 ‘ATIS전선부대’였다. 이정식의 근무 경력이 어떠한지는 더 이상 1차 자료에서도 확인되지 않지만, 그가 인지하고 있던 중공군 포로신문은 바로 미군이 이를 통해 중공의 폭격 목표를 찾았던 것으로 추정했다.

ATIS관련 자료를 확인하다 보면 이정식의 주장과는 많이 다른 내용의 사실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유엔군은 포로신문과 일명 ‘적의문건’을 통해 중공군의 부대 규모, 편제, 지휘관의 구성, 지휘 체계 등 전쟁 전반에 걸친 적의 정보를 세밀하게 파악하고 있었다.

한때 1961년에 발간된 애플맨(Roy E. Appleman)의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라는 미 육군의 6·25전쟁 전사시리즈의 한 저서가 오류가 많다는 지적이 있었다. 이유는 그

리즈 II』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2020). pp. 86-93.

38)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4』, pp. 94-97.

39)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4』, pp. 146-161.

40)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4』, pp. 518~549.

41) 이정식, 『이정식 자서전』 (일조각, 2023), 285~286쪽.

책에서 밝힌 ‘중국인민지원군’의 사령관을 평덕화이(彭德懷)가 아닌 린바오(林彪)로 적는 실수를 저질렀다는 것 때문이었다. 하지만 이는 의도된 실수였을 확률이 높다. 왜냐하면 미국 정부는 ATIS에 대한 존재를 1974년에야 공개했고, 노획문서의 공개는 1977년에야 시작했기 때문이었다.

일본인 연구자들에 의하면 한반도에서 전쟁에 참전한 니세이 병사의 수를 2천 명에서 3천 명으로 추산하고 있다.⁴²⁾ 이 가운데 6·25전쟁에서 활약한 신문 및 번역, 통역을 위한 니세이의 수는 5백 명에서 1천 5백여 명으로 추산하고 있다. 따라서 미국의 경우 니세이를 통해 이들에 대한 신문을 감행했음을 추론할 수 있다.⁴³⁾

결국 북한군과 중공군에 대한 포로신문은 대부분 니세이에 의해 대부분 이루어졌고, 이는 전투부대가 필요로 하는 북한군 및 중공군의 전투서열, 지휘체계, 전투 수단 등 아주 중요한 정보를 유엔군에 전달함으로써 전쟁수행에 중요한 기여를 담당하였다.

42) 柳田由紀子, 앞의 책, pp. 218~219.

43) 柳田由紀子, 위의 책, p. 222.

ATIS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Korean War

Sang-ho Lee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MND)

I. Introduction

John L. Gaddis, a world-renowned scholar of Cold War history, argued in his book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tha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ubsequent release of new archival materials have provided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verarching structure and causes of the Cold War.¹ In this context, how has the Korean War—fought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been evaluated and interpreted? For a time, American scholars referred to it as the “Forgotten War.”² More recently, Professor Tessa Morris-Suzuki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as described it as the “Misremembered War.”³ It has also been referred to as an “Unending Conflict.”⁴

One of the least explored aspects of the Korean War is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analysis of captured documents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prisoners of war (POWs). Notably,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ATIS),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se tasks, has only recently begun. While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study on POWs themselves, the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nel who actually interacted with them have not yet been properly elucidated.

In any war, interrogating POWs is one of the first procedures.⁵ According to Article 17 of the Third Geneva Convention, “Every prisoner of war, when questioned on the subject, is bound to give only his surname, first names, and rank; date of birth; and army, regimental, personal, or serial number, or, failing this, equivalent information.”

However,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World War I and II show that enemy intelligence was often obtained through various coercive methods, including torture, intimidation, and even murder during the interrogation of POWs. The Geneva Convention of 1949 was established to address these evils and to protec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evertheless, as seen in the Korean War, the Vietnam War, and more recently the Iraq War,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enemy POWs have continued to occur.

¹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새로 쓰는 냉전의 역사), trans. Park Geon-yeong, Sahoipyongron (사회평론), 2002).

² Clay Blair, *The Forgotten War: America in Korea 1950–1953*, New York: Doubleday, 1987.

³ Tessa Morris-Suzuki, *The Korean War in Asia—A Hidden History*,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⁴ Sheila Miyoshi Jager, *Brothers at War: The Unending Conflict in Korea*, New York: Norton, 2013.

⁵ In Korean academic circles, the process of questioning POWs to obtain information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심문 (*sim-moon*; inquiry; 審問) in Korean. However, this terminology is inaccurate. 심문 refers to arbitrary questioning, typically conducted without systematic control over the subject. In contrast, 신문 (*sin-moon*; interrogation; 訊問) denotes a structured and controlled method of direct questioning, aimed at systematically elicit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subject. Therefore,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refer to what is often called 포로신문 (POW inquiry) in Korean academic circles as 포로신문 (POW interrogation). For reference, 尋問 (*jinmon*; inquiry) is a term primarily used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Its original meaning is “to go and ask,” but in Japan, it is used in compound form as 捕虜尋問 (POW inquiry). See: Joint Chiefs of Staff,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 for Joint and Combined Operations* (합동-연합작전 군사용어사전), 2003, p. 262. Therefore, the Korean use of 심문 (*sim-moon*) in this context seems to borrow from Japanese terminology. Notably, war-related laws published by the Korean Law Information Center also employ the Japanese-derived term 심문

Research on POWs during the Korean War has focused on prisoner management—such as POW policies⁶, and treat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ountries (North Korea and China)—prisoner exchanges prior to the armistice talks⁷, the release of anti-communist POWs and its implications⁸, and the repatriation of POWs to neutral countries.⁹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on military intelligence derived from actual POW manag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specifically, on how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individual investigations or interviews in POW camps was organized and utilized, and how the accuracy of POW statements was assessed.¹⁰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how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interrogators was utilized during the interrogation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Among North Korean and Chinese POWs, the focus was on the interrogators of Chinese prisoners. These interrogators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U.S. Far East Air Force (FEAF) agents, ATIS agents, Korean agents,¹¹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MIS) agents. The majority were ATIS agents, most of whom were Nisei, or second-generation Japanese Americans.

⁶ “The Geneva Convention of August 12, 1949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Geneva Convention: August 12, 194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65); National Defense Military Research Institute, *Prisoners of the Korean War* (National Defense Military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Kim Seung-tae, “The UN Forces’ Prisoner-of-War Policy and the Christian Community’s Missionary Work for POWs during the Korean War,” *Korea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Vol. 2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Korea, 2004); Cho Seong-hun, *The Korean War and Prisoners of War* (Seonin, 2010); Kim Bo-young, “The UN Forces’ Prisoner Policy,” *Ewha History Studies*, Vol. 46 (Ewha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⁷ Sang-ho Lee, “Americanization Education of Communist POWs by the U.S. Army during the Korean War,” *History and Reality*, Vol. 78 (Korean History Society, 2010); Choi Hye-rin, “Development of U.S. POW Policy during the Korean War: Focusing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War Crimes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Civilian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Bureau,” *Korean History*, Vol. 63 (Department of Korean History, College of Humanit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017).

⁸ Hak-jae Kim, “Politics of Suppression and Release: POW Camps and National Forma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Korean Journal of Genocide Studies*, Vol. 5 (Korean Association for Genocide Studies, 2009); Kim Bo-young, “President Rhee Syngman’s Release of Anti-Communist POWs and ROK-U.S.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Ewha History Studies*, Vol. 38 (Ewha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2009); Kim Haeng-bok, “Release of Anti-Communist POWs and Armistice Negotiations” (*Baeknyeondongan*, 2015); Bang Jun-young, “Eisenhower’s Approval Process of the ROK-U.S. Mutual Defense Treaty and the Release of Anti-Communist POWs,” *Korea-Japan Military Culture Studies*, Vol. 20 (Military Culture Association of Korea-Japan, 2015); Jeong Chan-dae, “Current Status of Gwangju Sangmudae Prison Camp and the Release of Prisoners Incident: A Case Study of the Anti-Communist Prison Camp,” *Historical Research*, No. 37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2019).

⁹ Seon-woo Le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rrange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Who Chose to Go to Neutral Countri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History and Reality*, Vol. 90 (Korean History Society, 2013); Park Yeong-sil, “The Incident at the DMZ Anti-Communist POW Camp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sia Studies*, Vol. 58, No. 4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Korea University, 2014); Kim Hye-in, “History of Exile, Time of Refuge: Focusing on the Self-Narrative of Joo Young-bok, a POW Bound for a Neutral Na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Sanghur Hakbo*, Vol. 48 (The Learned Society of Sanghur’s Literature, 2016); Jeong Byeong-jun, “Race to Neutrality: The Choices and Identities of 76 Anti-Communist Korean War POWs,” *Ewha History Studies*, Vol. 56 (Ewha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2018).

¹⁰ Sung-joon Yoon, “The Occupation Policy of North Korea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Korean People’s Volunteer Army during the Korean War: Focusing on U.S. Army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s,” *Korea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Studies*, Vol. 89 (The Association for Korea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2019).

¹¹ Among the Korean agents, there was a Troop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I&E) Unit composed of student volunteers. After the advance into North Korea, the 772nd and 773rd Units were formed with students to carry out pacifi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Following the large-scale intervention of Chinese forces, the 772nd Unit was reassigned to the Gyeongsang-do area, where it established a local TI&E office in Busan. From there, it conducted various operations, including public affairs, TI&E, and guerrilla suppression. Approximately 30 individuals from this unit were selected to serve as POW interrogators in Gwangan-ri, Busan, where they worked for two months. JoongAng Ilbo, *Testimony of the Nation*, Vol. 2 (JoongAng Ilbo, 1983), pp. 351–357.

In her book, Monica Kim states that 4,000 Japanese Americans participated in the Korean War and demonstrated their language skills.¹² However, according to testimonies from Nisei who served at the time, the number was likely no more than 1,000.¹³ Based on archival data from that period, it is estimated that approximately 2,000 Nisei took part in the war and were actively involved.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POW interrogations was compiled into various reports, which were distributed to combat units and utilized in the field.

For this study, interrogation reports prepared by ATIS and preserved in the MacArthur Archives were used.¹⁴

II. ATIS and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s during the Korean War

On September 19, 1942, in the midst of the Asia-Pacific War, ATIS was established in Brisbane, Australia,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South-West Pacific Area (GHQ/SWPA).

The mission of ATIS was to provide necessary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services among Allied forces and operations, translate and analyze documents captured in combat, interrogate POWs, and prepare interrogation reports. These findings were then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bulletins, spot reports, and research papers for distribution to relevant agencies. During the Asia-Pacific War (also known as the Pacific War), ATIS produced up to two million pages of publications. In addition, the unit prepared surrender leaflets for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nducted broadcasts, and provided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during meetings related to the signing of surrender documents. In other words, ATIS's mission include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rough secret surveillance, codebreaking, map reading, wireless signal interception, and analysis of enemy order of battle. Information was also obtained through the interrogation of POWs, and the examination of diaries, letters, critical documents, and items recovered from enemy casualties.¹⁵

The training of ATIS agents was conducted along two primary paths. One wa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Language School (MISLS), and the other was involved a commissioned course offered at a general college to develop language specialists.

ATIS agents received training at MISLS, located in the Presidio of San Francisco. Most of these trainees were Nisei—second-generation Japanese Americans and U.S. citizens. MISLS was founded in November 1941 with an initial class of 60 students and 4 Japanese American instructors. Of the 60 students, only two were Caucasian; the remainder were Nisei. In May 1942, 45 students graduated. Upon graduation, the white students were commissioned as second lieutenants, while the Nisei graduates were initially assigned to non-intelligence roles such as truck or jeep drivers.¹⁶

The size of ATIS varied over time, but at its peak in late 1945, it had 2,667 personnel. The majority of these linguists were Nisei from Hawaii or California who had served in the Asia-Pacific War. More

¹² Monica Kim, *The Interrogation Rooms of the Korean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24.

¹³ Sang-ho Lee, "Actions of the Allied Translator & Interpreter Sec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d the Capturing of North Korean Documents," *History and Reality*, Vol. 109 (Korean History Society, 2018).

¹⁴ MacArthur Archives, RG 6, Records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FECOM), 1947–1951.

¹⁵ Takemae Eiji, *Inside GHQ: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Its Legacy*, NY: Continuum, 2002.

¹⁶ 山本武利, 『日本兵捕虜は何をしやべったか』, 文藝春秋, 2002, 25頁.

than 180 of them received military honors, ranging from the Bronze Star to 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During the Asia-Pacific War, ATIS worked with 29 European and Asian languages. By September 1945, the unit had translated 18,000 enemy documents and interrogation reports, published 16,000 of them, and examined 10,000 POWs, result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779 interrogation reports.¹⁷

Moreover, in the rear, the U.S. mainland established the Joint Army-Navy Interrogation Center. This center, located in Byron Hot Springs, California, was known as Camp Tracy. It opened in December 1942 and conducted 12,000 interrogations of about 3,500 Japanese POWs between January 1943 and July 1945.¹⁸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existence of Japanese POWs in the U.S. was kept secret. Over two and a half years, more than 3,500 Japanese POWs were interrogated, resulting in 1,700 interrogation reports totaling 6,500 pages.

When the Korean War broke out,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TIS)¹⁹ quickly organized the Advanced ATIS (ADVATIS) for deployment to the Korean front on July 7, 1950. ADVATIS was dispatched as the advance party, and its structure was subsequently expanded. It functioned as a forward base, with Daegu and Dongnae (Busan) serving as the main hubs. From these bases, ADVATIS deployed ATIS advanced echelons (AEs) to key regions such as Seoul and Incheon, as well as to combat units. In other words, ADVATIS interrogated North Korean and Chinese POWs through its AEs—subordinate units assigned to front-line positions. It also classified, organized, and translated North Korean captured documents sent by various detachments and divisional elements, compiling both strategic and tactical information, which was then forwarded to the ATIS headquarters in Tokyo.

On July 15, 1950, ADVATIS was stationed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Korean Military Police building in Kumchon. On that day, ADVATIS submitted its first interrogation report to G-2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Headquarters (USFK Headquarters). In response, G-2 ordered that all interrogation units under the Eighth U.S. Army be place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ADVATIS commander.²⁰ On July 17, the Eighth U.S. Army and ADVATIS jointly established an interrogation center and began interrogating ten POWs who had been transferred from the Korean Army.²¹

On July 16, ADVATIS obtained a highly significant document. It was a North Korean military document captured by the 21st Regiment of the U.S. Army's 24th Division in the Daejeon area on July 16, 1950. The document was a reconnaissance order signed by Lee Kwon-moo, commander of the North Korean Army's 4th Division, and issued on June 22 to the 18th, 16th, and 5th Regiments.²² Along

¹⁷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GHQ, SWPA" (1948. 7), RG 331, Allied Operational and Occupation Headquarters, World War II,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SCAP),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Public Safety Division, General File, 1946-1950.

¹⁸ Alexander D. Corbin, *The History of Camp Tracy: Japanese WWII POWs and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Interrogation*, VA: Ziedon Press, 2009, pp. 3.

¹⁹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the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TIS) changed its name to the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ATIS). This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participating in the war as part of a United Nations Forces coalition, hence the term "Allied."

²⁰ "Status of ADVATIS" (Jul. 17, 1950),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MIS(D/A) Intelligence Division, Translator & Interpreter Serv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47-1950.

²¹ "Records of Events, Advanced Echelon"(Jul. 8-10, 1950),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²²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Sep. 16, 1950),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with this, ADVATIS also secured Operation Order No. 1, which served as critical evidence proving North Korea's premeditated invasion. This document, together with the testimony of the 4th Division's artillery officer, was attached to a special report prepared for sub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s widely known, Operation Order No. 1 detailed the 4th Division's plan to break through Okgye-ri—located along the 38th parallel—and advance toward Uijeongbu and Seoul.²³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the Incheon Landing Operation, the number of North Korean POWs and captured document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With limited personnel, ADVATIS was heavily engaged in fulfilling its mission. One of its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was the interrogation of North Korean POWs.

As the situation changed drastically due to the Chinese offensive, ADVATIS withdrew all AE translation teams and POW interrogators to the rear on December 1, 1950. The unit established its headquarters in Dongrae, Busan, and redeployed all subordinate units stationed in the Seoul and Incheon areas to Daegu.²⁴ As of December 2, ADVATIS was engaged in a wide range of operations. It conducted the initial screening of 95,000 POWs, interrogated 1,760 of them, and produced 2,788 interrogation reports. Additionally, it organized, evaluated, and translated 18 tons of captured documents.²⁵

As such, during the Korean War, ATIS deployed ADVATIS to the Korean front to collect strategic and tactical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interrogation of POW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key documents. In addition, it coordinated the activities of various organizations engaged in gathering intelligence on communist forces, such as the Eighth U.S. Army, the Far East Air Force,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Interrogation Team (ORO). ADVATIS managed the key documents obtained by these entities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assigned shipping numbers, and ensured their secure transport to the U.S. mainland.

ATIS, which had been operating actively in this capacity, was reorganized as the 8238th Army Unit on February 4, 1951, and later redesignated as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 (MISG; 8238th Unit) under the Far East Command on December 1 of the same year. Subsequently, on September 1, 1952, MISG was reorganized once more as the 500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 which continued its operations until the signing of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²⁶

III. Types and Structure of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s

ADVATIS conducted interrogations of North Korean and Chinese POWs through subordinate units deployed at the front lines. It also classified, organized, and translated captured North Korean documents submitted by each deployed unit and division, categorizing them into strategic and tactical

²³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North Korean Aggression" (Oct. 11, 1950),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²⁴ "Status of ADVATIS" (Dec. 26, 1950),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²⁵ "Message from Stark to Willoughby" (Dec. 2, 1950),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Q,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²⁶ "Lineage and Battle Honors Intelligence Support Complement, 8238th AU", RG 338, Record of U. S. Army Operational, Tactical and Support Organizations.

intelligence before transferring them to ATIS headquarters in Tokyo. Initially, ADVATIS conducted interrogation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Far East Air Force. In August 1950, a unified organization—ADVA(UN)TIS—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UN) Forces to centrally manage interrogation and document processing. This joint body integrated the efforts of the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units participating in the UN Forc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interrogation of POWs in Incheon was conducted in three stages. For urgent operations, strategic interrogations were prioritized. The interrogation of Chinese POWs began in late October.²⁷

Through these efforts, ATIS compiled primary historical sources—drawn from the interrogation of North Korean and Chinese POWs, as well as the acquisition of captured documents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se materials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period and culminated in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s.

These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s we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as integrated intelligence derived from the interrogation of communist POWs, deserters, and refugees in the field. Immediate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the U.S. military initially distributed these reports individually. However, starting in August 1950, they began publishing them in booklet form to provide more consolidated information.

A total of 57 interrogation report booklets were issued between August 25, 1950, and March 30, 1951. The first booklet included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s numbered 600 to 699, grouped in sets of 100. This format was maintained through the 57th issue, published on March 30, 1951. The booklets were sequentially numbered based on their order of production. Issues 1 through 21 contained 100 reports each, while issues 22 through 57 included 50 reports per volume.²⁸

Table 1. Status of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s in the MacArthur Archives

Issue Number	Date of Creation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 Number	Total Number of Pages	Number of Interrogations	Remarks
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 #1-15 North Korean Forces	Aug. 25 – Nov. 1, 1950	600–2099	4,529	1,500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 #16-21 Enemy Forces	Nov. 8 – Dec. 21, 1950	2100–2699	1,599	600	Missing issues: 17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ue#22-57 ²⁹ Korean Operation	Jan. 8 – Mar. 30, 1951	2700–4450	6,995	1,750	Missing issues: 52 and 53
Total			13,123	3750	

²⁷ 土屋礼子,「占領軍の翻訳通訳局 (ATIS) によ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活動」,『Intelligence』第17号,2017年 3月,110~123項

²⁸ MacArthur Archives, RG 6, Records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FECOM), 1947–1951.

²⁹ MacArthur Archives, RG 6, Records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FECOM), 1947–1951.

[그림 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2737³¹

CONFIDENTIAL

ATIS INTERROGATIONS REPORT NO. 2737

23 December 1950

FIELD REPORT (ADVATIS - 1246)

17 December 1950

1. PERSONAL DETAILS:

PW NAME: LIU, Ping Chang (劉炳璋)
 RANK: Capt (大尉)
 AGE: 26
 DUTY: Regt Staff Officer (8-3)
 UNIT: 66th Army, 197th Div, 590th Regt
 EDUCATION: Central Military Academy, SIAN SHANSI, 1942 - 1946
 OCCUPATION: Professional Soldier
 PLACE OF CAPTURE: T'AECH'ON (萊川) Area
 DATE OF CAPTURE: 25 Nov 50
 PLACE OF BIRTH: CHINA, SHANTUNG-SHENG, TAIAN-HSIEN, TAWENKOU
 (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
 HOME ADDRESS: Same as above
 INTERROGATOR: 1st Lt KIM (ATIS)

Table 2 below summarizes the affiliations of the interrogators who questioned POWs during that period. Of them, ATIS interrogators accounted for 28% of the 1,562 POWs, followed by US Far East Air Force interrogators (16%), Korean military personnel (1.1%), and others (28.6%). It is worth noting, however, that most individuals classified as “Others” were likely ATIS agents, as the status of ATIS personnel at the time was often recorded as “Special Agent.”

Table 2. Status of POW Interrogators by Affiliation in POW Interrogation Reports

Affiliation	ATIS		FEAF		ROK Army		Others	
	Sergeant Ahn	45	Campbell	8	1LT Park, Byung-wook	1	Staff Sergeant Avison	33
	First Lieutenant (1LT) Buck	2	Hamilton	4	1LT Ahn, Eok-soo	4	CPT Har and 1LT Underwood	13
	Sergeant First Class (SFC) Fukushima	2	Honda	24	1LT Oh, Se-hoon	12	Sergeant Nakayama	1
	Captain (CPT) Hahm	1	Liyama	2	1LT Yoon, Joo-tae	1	Sergeant Hirotsu	22
	Sergeant Hamasaka	62	Kajiwara	52			Imagawa	27
	Specialist (SPC) Hamasu	31	Sergeant Lee	38			Ito	1
	SPC Han	3	Meri	1			J. A. Dalzell*	14
	SPC Hattori	21	Sergeant Mori	46			Sergeant Koga	18
	Hayashida	62	Civilian military employee Nagao	44			Sergeant McKee	11
	SPC Hong	5	Takesako	31			Mishina	22
	SPC Horishige	69	Major Weems	1			Miyamoto	1

³¹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Issie No. 22 (Jan. 8, 1951)”. MacArthur Archives, RG 6,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FECOM) 1947-1951.

SFC Inomoto	46					Sergeant Miyata	29
SPC Kaneshiro	2					1LT Muranaka	2
SPC Kato	3					Sergeant Nagai	4
SFC Kawashima	3					Sergeant Nakaji	21
SPC Miyoshi	28					Sergeant Harold Nakayama	48
Private First Class (PFC) Yamashiro	17					Nunley and 1LT Garrett*	9
						Sergeant Omija	2
						Sergeant Onna	6
						Private Sawada	12
						Private Shigekuni	7
						Sergeant Shimabukuro	30
						Sergeant Shimoji	1
						Sergeant Shin	2
						Suga	6
						SFC Taji	3
						PFC Takeuchi	19
						SPC Tanaka	19
						PFC Taniguchi	3
						SPC Tanno	19
						SPC Tsurumaki	12
						Walley (US navy)	2
						Sergeant Yamada	15
						Yamashita	6
						2LT Yonehiro	1
						Sergeant Yoshida	7
Subtotal	402	Subtotal	251	Subtotal 1	18	Subtotal	448
Total: 1,119 POWs (For 443 POWs, the names of their interrogators are not clearly recorded.)							

* Debriefing and interrogation of U.S. POWs escaped from enemy forces

As shown in the table above, 48 out of 70 interrogators—approximately 68 percent—appear to have been Nisei, or second-generation Japanese Americans. These Nisei interrogators were responsible for questioning 910 prisoners of war, accounting for 81 percent of all interrogated POWs. This indicates that a substantial majority of the POW interrog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conducted by Nisei personnel.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the interrogation of POWs was reclassified and compiled into detailed reports concerning the organization, size, and command structure of North Korean and Chinese military units. For example, the *ATIS Research Supplement Interrogation Reports* (Dec. 15, 1950) includes the following reports based on individual POW interrogations:

North Korean Signal Communications
CCF Procurement and Training of Korean Personnel

North Korean 8th Infantry Division
North Korean 105th Tank Division

Meanwhile, the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ection of ATIS compiles intelligence from POW interrogations to produce more detailed analytical reports on topics such as the presence of North Koreans within CCF.³²

In addition to POW interrogations, documents seized from CCF also began to be systematically translated by ATI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is th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produced between June 1950 and April 1951, during General MacArthur's tenure. The *TIS Enemy Documents* series includes supplements, among which all tactically significant documents were fully translated and circulated.

The earliest CCF document identified in the *Enemy Documents* series is a letter of support for Kim Il-sung from the Western Military Region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dated August 20, 1950. This letter appears in Issue No. 7, published on November 16, 1950 (Document No. 200714).³³ The next document is a photograph featured in Issue No. 10, published on December 6, 1950, with the caption: "2nd Company, 49th Field Artillery Battalion, 4th Field Arm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he formal designation of CCF)." The photo was taken in Mukden (present-day Shenyang) on July 25, 1950 (Document No. 200879).³⁴ The next identified document is the *Unsan District Battle Results Summary Report* from the CCF 66th Army, included in Issue No. 11, published on December 13, 1950 (Document No. 201371).³⁵

The Battle of Unsan, which took place along the Kuryong River from October 26 to November 3, 1950, was fought between the 1st Divis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ROK) Army and the 39th Arm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CCF). This engagement marked the first official confirmation of CCF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 On November 20, 1950, the CCF produced and circulated a post-battle report detailing their account of the battle. The ROK 1st Division obtained this report less than a week later, on November 26, 1950. It was subsequently translat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as part of the *Enemy Documents* series. In other words, the CCF produced a battle report less than 20 days after the Battle of Unsan. ATIS received the document through an intelligence channel from the ROK unit on December 11, and completed its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within just two days.

In addition, the *Enemy Documents* series included several notable materials: a diary written by Kim Ho-gil, a CCF soldier from Yanji, detailing his movements from June 1947 to March 1950 (Document No. 201021);³⁶ night combat data from a small CCF unit (Document No. 201961);³⁷ a CCF combat

³² "Special Report No. 70," RG 554, MIS Intelligence Division,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ox 19.

³³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MND, *Korean War Archives Series*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3 – *Captured Enemy Documents Series I Analyzed by the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ATIS), Far East Command*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MND, 2020), pp. 225

³⁴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Enemy Documents" Issue No. 10 (Dec. 6, 1950), RG 554, Records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1945 – 1960.

³⁵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MND, *Korean War Archives Series*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3, pp. 366-374.

³⁶ *Ibid.*, pp. 504–505.

³⁷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MND, *Korean War Archives Series* (한국전쟁자료총서) 74–*Captured Enemy Documents Series II Analyzed by the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 (ATIS), Far East Command*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MND, 2020). pp. 86–93.

order file for the Baekun Mountain area dated January 24, 1951 (Document No. 201949);³⁸ and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CF 38th Army during the Third Campaign (also known as Third Phase Offensive), dated January 9, 1951 (Document No. 202028).³⁹

In addition to the *Enemy Documents* series, tactically significant military documents were also professionally translat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as supplements. Document No. 4, distributed on December 16, 1950, was originally a Chinese-language document captured near Jinju in August 1950. It detailed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mine-laying.⁴⁰ Although it had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and released as *Current Translation* No. 1 on August 26, 1950, it was republished as a supplement due to the high value of its informational content. At the time, the document was used by the 6th Division of the North Korean Army, which was commanded by Banghosan and operating near Jinju. The widespread use of PLA combat tactics and equipment within the division suggests that the 165th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entered North Korea and reorganized the 6th Division's units.

Moreover, ATIS interrogated North Korean and Chinese POWs,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various documents, and classified them as either tactical or geographic intelligence. It was later reorganized as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 under the Far East Command, and subsequently became the 500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 continuing its operations until the armistice.

V.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autobiography of Jeong-sik Lee,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ublished in 2023, he served as a Chinese interpreter for the U.S. military during the Korean War, interrogating CCF POWs.⁴¹ Lee, who co-authored *Communism in Korea* with Robert Anthony Scalapino, stated that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National Defense Military Academy (*Gukmin Bangwigun Sagwan Hakgyo*; 국민방위군사관학교) in Onyang, he was assigned to a unit near Oncheon, Dongnae, Busan. He referred to this unit as “ADVATIS.” It was specifically the “ATIS Frontline Unit.” Although Lee's service history can no longer be verified through primary sources, he assumed that the interrogation of CCF POWs was used by the U.S. military to identify bombing targets in Communist China.

However, a review of materials related to ATIS reveals a narrative that diverges significantly from Lee's assertions. Through the interrogation of POWs and the analysis of captured documents—known collectively as the *Enemy Documents* series—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gathered extensive and detailed intelligence throughout the war. This included data on the size and organization of CCF units,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leadership, and their overall command structure.

There was once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accuracy of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by Roy E. Appleman, published in 1961 as part of the U.S. Army's Korean War Chronicles series. One

³⁸ *Ibid.*, pp. 94–97.

³⁹ *Ibid.*, pp. 146–161.

⁴⁰ *Ibid.*, pp. 518–549.

⁴¹ Jeong-Sik Lee (이정식), *Autobiography of Jeong-Sik Lee (이정식 자서전)* (Seoul: Iljogak, 2023), pp. 285–286.

notable error cited w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Lin Biao (林彪)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Army, rather than Peng Dehuai (彭德懷). However, this was most likely a deliberate misidentification. At the time, the existence of ATIS had not yet been publicly acknowledged by the U.S. government—it was only disclosed in 1974—and captured documents were not released until 1977.

Japanese researchers estimate that between 2,000 and 3,000 Nisei soldiers served in the Korean War.⁴² Of those, approximately 500 to 1,500 a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involved in interrogati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rol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ikely relied on Nisei soldiers to conduct interrogations of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 POWs.⁴³

Ultimately, most of the interrogations of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 POWs in the Korean War were conducted by Nisei soldiers. Thi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war effort by providing United Nations (UN) forces with critical information essential to frontline combat units, such as the North Korean Army and the CCF's battle orders, command structures, and combat means.

⁴² 柳田由紀子, *op. cit.*, pp. 218–219.

⁴³ 柳田由紀子, *op. cit.*, pp. 222.